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15年

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

解学恭：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新闻立法之路

芬兰政府这样管理高等教育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一家言
1 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 …… 袁伟时
4 “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 …… 于一夫
6 巨贪产生的制度反思 …… 汪玉凯
亲历记
9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 陶斯亮
16 反右前后的北京政法学院 …… 王卫民
19 亲历各党各派争取宪政的斗争 …… 王 健
23 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 …… 李根清
春秋笔
25 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 …… 庞国义
29 新闻立法之路 …… 孙旭培
32 一桩刑事案件的背后 …… 陈宗立
39 彭德怀与国防科技建设 …… 滕叙兖
往事录
44 《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中 …… 余焕椿
49 《创业》风波 …… 华 克
人物志
55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 …… 冯亚光
59 张仲翰与新疆开发 …… 纪 新
故纸堆
63 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 解学恭
访谈录
71 我和邓力群的交往 …… 于浩成 口述 史义军 整理
调查记
76 发生在南阳的“电报事件” …… 赵宗礼
品书斋
80 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及其结局 …… 吕克军
海外事
86 芬兰政府这样管理高等教育 …… 阎忻民
90 一场改变美国历史的游行 …… 李南央
编读窗
93 谁是《毛泽东论鲁迅》的记录、整理者? …… 汪大波
85 我读过曾彦修的“三万言书” …… 邓伟志
94 工宣队在清华还干了什么? …… 朱祖成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杜润生 李 锐 何 方 曾彦修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方 实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江 平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德华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郭道晖 资中筠
展 江 陶斯亮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杨继绳(常务副主任)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总 编 辑 杨继绳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王彦君 冯立三 丁 东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社 长 杜导正
副 社 长 杨继绳(常务) 徐庆全 李 晨
秘 书 长 杜明明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主 任 孔 屏
办 公 室 主 任 王海印

本刊创刊人:杜导正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 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本期: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王彦君 校对 乐 彤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

○　袁伟时

1999年3月15日，中国修改《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第一款，法治成了宪法的内容。可是，在中国，纸面的东西要转化为现实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主要阻力就是“不能放弃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十多年来，周永康掌握政法大权，以维稳和反对颜色革命为借口，践踏法治，留下许多劣迹。

更令中国在世界蒙羞的是：2013—2014年间，一些人明目张胆丑化和妖魔化宪政。在各界有识之士义正词严驳斥下，反宪政的马前卒原形毕露；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采纳了宪法至上和实行的观点。

不过，“人是思想的囚徒”。要落实这些共识，必须认真清理某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点。肆虐已久、危害很深的阶级斗争论尤其值得人们关注。

历史的回顾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卷入将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践的旋涡，这场近一百年的理论和实践纷争至今尚未止息。把一部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简单化为两个阶级的胜败史，没有几个人会信服，不值得再费时间讨论。让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开始，简要回溯历史，看看把这一理论推至极端的恶果吧。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讲阶级斗争，也讲阶级调和。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依据。这个文件规定构成“人民”的四大阶级（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消灭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如果把帝国主义也当作一个阶级，那就是七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而它同时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并享有各项政治权利。讲的是四大阶级合作和利益调和。

不过，在同一年3月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的报告）中却规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在当时的语汇中，一以贯之的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其中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又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确定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为国内的基本矛盾，不但《共同纲领》规定的四大阶级共赢的条款日后被弃如敝屣，处理其他社会问题也毛病百出。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部分错误都出于侵害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此习惯性地给后者涂上各种阶级色彩）。共和国成立前夕，犯此类错误的端倪已见。1947年11月30日，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提出：“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将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沈志华编：《中苏关系档案》）

这种极端主张，连斯大林也不赞同。他在1948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复信中提出：“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的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

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财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同上）

这些劝告中方听不进去，并且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七大通过的纲领《论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全都置诸脑后。掌握全国政权后十多年间，领导人一意孤行，加速废除各个领域的私有制，并肆意界定阶级标准，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队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制造了连绵不断的斗争。

令人豁然开朗的新论断

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告别这些错误，告别用阶级斗争观察一切、分析一切的极端理论，回归建设现代社会的正常轨道。

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做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概括。不幸，在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互相呼应为改革开放开路的同时，也有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作茧自缚，不但没有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甚至与时代格格不入，理论思维仍然滞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个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

这些都是老话。作者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居然旧调重弹？所以说这个论断有代表性，在于数以千万计的现任和前任党政官员在各种场合都曾反复经受这个理论的熏陶，其影响遍及全社会。按理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变化很大，过时的理论应该逐步消退，却偏偏有人一再大肆张扬。旧意识形态的顽强，令人吃惊！

这个阶级斗争论错在哪里呢？

先从时代讲起。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消灭资产阶级，推进世界革命，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进入20世纪，列宁更确认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世界正处于通过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所谓两个主义的生死博弈正是这些论述的极端和简单化的表述。不过，与原教旨主义者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中央对时代已有新认识。80年代初，接纳了何方等人的建议，“到1982年，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何方自述》第423～424页）。明确否定了战争与革命年代的论断。

随着对时代认识的变化，再以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国际和国内问题，必然陷入非常荒唐的境地。

今日世界，国际纷争不断，实质是国家利益的矛盾。纷争的缘由很多，包括中日、中越、中印等国的领土争端在内，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博弈的影子。不过，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下，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以中外关系为例，从东南亚到欧洲，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宣布双方是战略合作伙伴。就拿影响巨大的中美关系来说吧，双方领导人说法不时有变，但实际内容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最大市场和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地，而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军事和政治领域，双方矛盾较多，美国佬的冷战思维未净，常有一些中方难以接受的举措；而中国的一些行动也是美方很难理解的。至于军事力量加强、调动以及进行间谍活动，早已是多数国家的常态，中美也不例外。再以两大阶级生死博弈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中美关系，与事实相距太远，必然危害两国的根本利益。

再看国内状况。这里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博弈的战场呢？

中资或外资私营企业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如果把国有企业划为社会主义，它正企盼前者进入，杂交成为混合经济，哪里有什么生死博弈？无论国企、私企，都有劳资利益的矛盾、纠纷乃至冲突，但是，双方追求的都是共赢而非你死我

活。任何企业,劳资双方都是命运共同体,只要一方活不下去,另一方的利益必然受损。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两个决议是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吸收现代思想、现代文化的成果。这里也没有两个阶级、两种主义生死博弈的影子。时至21世纪,仍然高唱阶级斗争颂,是令人吃惊的食古不化的原教旨主义,如果被采纳,必将给市场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恶果。

政治思想领域也不例外

是不是政治、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有那样的生死博弈呢?

这就涉及法治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冲突了。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这些都是法治的基本常识。可是,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只要认定某人或某一群体是阶级敌人,就要坚决斗争,乃至用暴力镇压,至于对具体人的处理方案,则属于策略范围了。

反右和文革就是履行阶级斗争论的范本。它们号称“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领袖的片言只语或某个官员的指示就是法律,毫无平等可言,溯及既往“翻老底”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状态下,法定的公民权利被阶级标准取代,任何人随时可以沦为囚犯。其实质是权力至上,权力在手的人们可以随意审判公民的思想、观点、言论,确定对象的阶级属性,从而任意整人,顺昌逆亡,乃至肆意剥夺别人的自由和生命。党的中央全会确立法治国家目标就是总结历史教训,防止这样的局面重演。

至于学术和思想文化,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官员闯进这个领域指手画脚,实质是以自己可怜的水平去压制学术文化,是以权力侵犯学术、侵犯公民权利的不法行为。其深远影响是培植奴性,让中国人从小学会察言观色,谨小慎微。压制创造力,戕害生机,莫此为甚!

自由和法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要实行法治,就要告别阶级斗争偏执症。各类人群,各个阶级和阶层有矛盾,但主导方面是各方有共同利益,罔顾法律另立标准,制造敌人,只能误国殃民。公民自由权利,载于宪法,任何人无权践踏。史鉴昭昭,千万别重蹈覆辙!

一句话:法治和阶级斗争论无法并存。判断是否违法、犯罪只能以法律为标准,公民可以做法不禁止的任何事情;这是法治ABC,阶级标准不容置喙。可是,党政官员多年学习的就是阶级斗争理论,陈旧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风波迭起的深层原因。中国理应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大国,并由此成为资金和人才会聚的中心。现实状况却令人忧心。有民调显示:中国60%的中产阶级已经移民或打算移民。这一群体是现代社会稳定的支柱。而只要留心自己身边这一群体的动态,许多人在寻求别国的护照或绿卡作为护身符,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是多年来斗争不断的恶果,不能实行鸵鸟政策对此视而不见。为国家和公民的前途和利益着想,应该痛下决心,清理错误理论和限制权力并行,真正让宪法和法律至上在中国生根,从而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奠立牢固的基础。■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四个决不”的提法不妥

○ 于一夫

2015年新年伊始，我国若干大学有人提出“四个决不”：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听到“四不”要求后，有人立即响应，扬言“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不听话的教师要“坚决清除，予以严惩”！如此密切互动，剑拔弩张，使一些大学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许多教师捏着一把冷汗，不知事态将会如何发展。

开除解决不了是非之争

上述“四个决不”除了不允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课堂上蔓延一条外，其他三条都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西方价值观念，就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源自西方，并非中国的特产，诚如一句名言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建党以来，始终把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历届党章的明确规定，何以能将西方价值观念一概否定？决不允许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岂不是连马克思主义也要封禁？至于什么是“攻击诽谤”、“抹黑”以及“不良情绪”等，也很难界定。文革中用得最滥的罪名，就是《公安六条》所规定的“恶毒攻击罪”，由此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如今又重新捡起“攻击诽谤”等莫须有的罪名，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恐惧。“四个决不”中有的“决不”本身逻辑混乱，政策界限不清，极容易混淆是非，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难操作。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了恩格斯与杜林的一件往事。

杜林是德国的一位学者，曾任柏林大学讲师，虽已八旬高龄，却自命不凡，声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针对他的谬论，恩格斯花费了将近3年时间去啃这个“酸果”，写出《反杜林论》一书，对杜林的理论做了系统的批判。未想到该书出版后柏林大学竟将杜林开除，引起恩格斯的愤慨。他认为，杜林仅是马克思的论敌，只是学术之争，怎能粗暴地将一位学者开除呢？——这便是发生在140年前的一段公案。如今，假如恩格斯在天之灵得知中国有些大学竟然出现“四个决不”，想必对这种做法也会同样表示不能容忍。

40年前的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借用恩格斯批评柏林大学撤杜林职一事为例证，提出文革以来制定的某些政策应该调整，他说：“《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回看当今，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竟又提出“四个决不”，还有人要对不听话者采取砸掉其饭碗的惩罚措施。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同邓小平倡导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相冲突，实在不妥当。

争鸣才能探索真理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传道、授业、解惑，高等院校更担负着探索真理与传播真理的重任，而真理只有通过各种学术流派和各种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争鸣才能确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早在50年前就提出了“双百方针”，强调学

术上的百家争鸣和艺术上的百花齐放是科学发展与艺术繁荣的正确途径。真理不能以长官意志做定论，任何人都没有裁断理论是非并判定某一观点为谬误的权力，更不能垄断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者，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出现某些失误在所难免，因而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能苛求教师的每一句话都完全正确。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每一句话都正确，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即使有人发表了错误观点，也只能采用说服的方式，充分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心平气和的讨论与争鸣，以理服人，并应允许对方申辩，而不能采取粗暴的手段硬行压服。高压的结果是压而不服，只会激化矛盾；继续强行施压，会迫使大家都不敢说话，造成全民噤声、万马齐喑的局面，那才是最可怕的。

这里不妨再引几段我党领袖关于如何对待不同意见的论述，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陈云警告：“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

——毛泽东说得更形象：“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他还引用霸王别姬的典故来教育干部，说：有些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让人讲话，倒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可惜毛泽东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发扬民主，以致犯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和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诚为叹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让人们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

这4位领导人的话，都是经验之谈，也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因此，正确的态度和做法应当是：不怕争论，不惧挑战，在宪法范围内发扬和维护学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相信通过平等的讨论与争鸣，能够战胜歪理邪说和驳倒错误观点，那才是真正具有自信心的表现。

教改要保护教师的积极性

教育界有明白人。人们都还记得，在2011年“两会”期间，针对有人提出“高等教育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多引入外资”的论调，业内人士当即回应说：“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这个充满自信的表态，曾经赢得广泛认同。4年过后，却有人把一些教师的不中听的言论视为洪水猛兽，散布了“四个决不”，表现得如此缺乏自信，难道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假如说那些话的是独当一面的高官，毁坏的可是整个教育。

综上，“四个决不”的宣示，总体上看不符合时代潮流，有违当前中央倡导的“全民创新”，与我国教育界前辈推崇的“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原则相对照，显然是巨大的倒退。目前我国高校在国际上的排名偏低，原因固然有许多，但学术思想缺乏活力，理论研究缺乏交锋，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要提高教育质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鼓励高校教师在宪法的框架内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似这般这也不许，那也不许，只会抑制教师的创新精神。如果硬要推行，必将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鉴于此，建议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能够认真听取有识之士的诤言，避免失误。当前的任务，不是把具有独立见解的教师赶下讲台，而应当是稳定教师队伍，集中精力搞好教育改革，进一步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以求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水平并富有创见的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作者为法学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　机：13611159388

电　话：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支付宝汇款账号：13611159388

巨贪产生的制度反思

○ 汪玉凯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侵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严重的危害。中国虽然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体制缺陷是中国腐败蔓延的重要源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了顺应民心,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也取得了重要成效,短短两年多时间,共抓出一百名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其中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这样国家级的大老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我国的腐败很难靠一些突击性的惩治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整体判断腐败的成因,对我们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笔者的理解,我国存在的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应引起高度重视。其理由是:

第一,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已超出了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的问题,而带有明显的泛化趋势。这种趋势,与我国所处的社会与体制“双重转型”的历史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阵痛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人们急于求富的心态,以及由此萌发的强劲的利益驱动,使社会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失范以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诱发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铤而走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导致权力、社会的腐败。这种当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经历,似乎正在我国重演。

从体制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过渡期。尽管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初步确立,但要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功能完全消失,还需要一个过程。在双轨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市场主体的重组,贫富差距的拉大,法律规范的欠缺以及法制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滞后,道德约束功能的下降,也会诱发那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钻体制转换的空子,通过各种途径,利用种种手段侵吞、攫取国家或他人的财富,使权力、社会腐败的问题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当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同处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候,必将使上述问题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当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迫切需要我们的政府以及社会各种管理主体不断加强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管理时,而管理层由于腐败的干扰,权力行使中的某些失控,又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出现政府行为扭曲以及经营管理层中少数人腐化堕落等大面积的不廉洁行为。腐败现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涣散了公职人员的责任感,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正在动摇国家的政权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曾采取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制定有关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等,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政策性的规范体系,因缺乏体制上的保证与依托,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复杂局面下,也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们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忽视了另一面;这方面的问题堵住,那方面的问题又出现。有些腐败现象如权钱交易、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都有愈演愈烈之势,案值的数额也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翻新多样,如

窝案、塌方式腐败等。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腐败，表现为权力行使的非理性腐败，实质上带有某种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措施，势必威胁政权，动摇乃至涣散民众对党和国家信任的根基，社会长治久安将只是一厢情愿。

为了真正达到治本的目的，实现中央提出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除了继续加紧惩治腐败，狠抓一批大案要案并予以严惩，抓好治标的反腐败斗争外，还要下决心从体制上动手，并以此作为突破口，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与行政体制。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必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等进行必要的改革和调整。改革和调整的整体思路是：一方面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现行的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中有关抑制腐败的各个重要环节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发现最薄弱的环节，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另一方面，这种改革和调整应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行使国家各种权力、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前提下进行。在具体实施上，仍应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策略。

从体制上抑制腐败，首先要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如果离开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或者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不能达成某种共识，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和调整，还是重大政策的制定，都会由于缺少必要的基础而最终难以实施。笔者认为，要从源头上清除腐败，从体制层面来看，关键要解决以下三个对全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问题。

1.要不要构筑用权力制约权力的体系？

自从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的论点以来，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种理论的潜在思想基础是，在权力的行使和运用上，首先把制度安排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不是说在权力行使的实践中，对权力行使者个人的觉悟和品格一概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是对个人的信任必须建立在制度约束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即使一个权力拥有者在权力的运用中，出现了非理性人格变异，或权力滥用，也会有足够的制度力量加以纠正，以保证公共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在一些西方国家，虽然权力制衡的目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其权力制衡的具体方式，也有许多消极的东西，然而它在维护其政治统治、规范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用方面，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权力制约机制和形式，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需要分析的是，在我国，人们究竟是否真正接受了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或者说这种制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从表面上看，包括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者个人在内，也都认为应该建立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和制度，至少从形式上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制约制度的存在：国家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人民群众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及司法权的制约。但在实践中，人们却是另一种感受：许多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形同虚设，许多制约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以至于一些握有权柄的腐败分子如成克杰、程维高、刘方仁、田凤山等，在滥用权力的过程中几乎畅通无阻，且官职还在继续提升。这就提醒我们：在对待用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是认识上有问题，还是制度上有问题，或者两者兼有？如果我们的反腐败，首先不能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或者找出存在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要想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就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很难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从观念到实践，普遍树立用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和制度体系，是我国从源头上清除腐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监督权力的权力苍白无力甚至常常实际上缺位的局面。

2.要不要促进权力结构的分化和整合？

一种体制具备不具备抑制腐败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抑制腐败的能力，关键取决于这种体制中权力结构的功能分化和运行的整合。在一些政治、行政体制较为完善的国家，由于构成宪政体制基本框架的权力结构的分化和整合达

到了比较理想的程度，因此，宪政秩序本身对权力的行使和运用，就有较强的纠错功能，从而可以有效地防范公共权力的腐败。这里所说的权力结构的分化，是指在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中，一般有明确的分工，各权力主体各司其职，并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国家权力处于某种平衡的状态。这就是说，权力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不同权力机关的功能的分化，只有这种分化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才能更好地发挥该组织在权力行使和运用中的作用。而权力结构的整合，则是指国家权力运行的统一和协调。在一个国家，权力结构的分化固然重要，但是权力结构分化的结果如果造成权力运行的紊乱，或者不同权力行使机关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合作，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权力结构的整合，其目标主要是增强各权力行使机关之间的协同功能，而防止它们之间的相互掣肘和对立。

用上述分析框架来观察当代西方国家的权力结构，可以发现，在普遍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其权力结构的功能分化无疑是相当充分的，但权力结构的内在整合却往往不足。这种状况对抑制公共权力的腐败，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从整个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则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是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关键所在。

当然，在分析权力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的关系时，有一点十分重要：国家权力的整合必须建立在权力结构充分分化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后者而一味地去强调权力结构的整合，或权力运行的协调统一，就难以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并可能为公共权力的腐败提供制度上的空间。我国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历史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某些体制性腐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我国权力结构的分化不充分，监督体系不到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现象的存在又严重地影响着对公共权力行使和运用的有效监督。按照我国的宪政体制，国家权力分别由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和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来行使。这些不同的机关所担负的职责，宪法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这些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职责，明确分工，各司其职。这说明，我国宪政体制本身要求国家权力结构必须充分分化，在此基础上，才强调国家权力结构的协调和统一，如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等。但在实践中，宪政体制所体现出的上述要求，往往被过分的权力结构的整合所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协调与统一，却忽视了权力结构本身的功能分化。而权力结构功能不能充分分化，不仅会直接影响各权力行使机关权力的有效行使，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宪政体制本身应该具备的纠错功能。以监督为例，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对各级党政机关行使的权力实施监督的具体规定，应该说并不算少，有些规定甚至反复再三制定。但实施的效果不佳。这种现象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从体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实质上是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不充分的必然后果。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从国家权力结构的功能分化和权力运行的整合这一根本问题上加以解决，体制性腐败的现象就很难从源头上得到扼制。

3.要不要建立严格的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机制?

领导干部在选拔任命的过程中以及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后最终向谁负责？这个看起来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与公共权力的腐败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按照我国的宪政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宗旨，所有的党政领导干部，不管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说到底是要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是直接由人民赋予的。因此，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应该是每一个领导者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样的描述，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也是我们美好的愿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美好的目标模式，在体制运作中却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实现机制。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不是简单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机制。

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似乎都没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体制中缺乏约束领导者对人民利益负责的实现责任机制，关键在于民众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对本来应该向人民负责的领导者，拥有真正的

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 陶斯亮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际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友”“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从左至右：范曾、李南友、刘再复、于浩成、刘宾雁夫人朱虹、方励之、文怀沙、理由、刘宾雁、陶斯亮、边宝华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儿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厕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

选择权，或者只有形式上的选择权。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责任机制的变形和扭曲：即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领导者都会把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口号挂在口头上，而实际上，他们的真正责任机制，是千方百计地向直接拥有决定他们职务高低、去留的上级机关负责。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以及领导者责任机制的严重扭曲，不仅助长了少数腐败分子滥用权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是近年来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这就告诉我们，从体制上改革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把党政领导干部被扭曲了的责任机制纠正过来，就成为从体制上清除腐败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作者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之话不多，显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是“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没有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奇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高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态。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们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慨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国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 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领导人身上。2. 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3. 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

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往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我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招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映了统战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高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被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定、宋堃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

阎明复(前排左)与习仲勋在一起

子彭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励之政治资本。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方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术。""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

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国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说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评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人，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块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产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世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潮），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会听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与当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样认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不会搞什么组织，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的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一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

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的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的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潮、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背景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有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我，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海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

方励之到美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的。如果抱着“我要统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我对我是“搞政治的”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反右前后的北京政法学院

○ 王卫民

(一)

我是1955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学习的。我们这一届是本科生第二届,以前招的是专科生和短期培训的在职干部。

学院的教职员工,大致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党的老干部,以党委书记刘镜西为首,包括郭迪、刘昂、徐敬之、赵吉贤、鲁直等;另一部分是以院长钱端升为代表的老教授,如雷洁琼、严景耀、吴恩裕、曾炳钧、戴克光、黄觉非等,以及一批中青年教学骨干。大部分老教授是不让开课的,他们的任务是学习(思想改造),只有严景耀教授给我们上过"资产阶级国家法",吴恩裕教授给我们上过"西方政治学说史"。据说,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连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钱院长也没有宣讲的机会,我校向师生宣讲宪法的任务是由党委副书记郭迪担当的。整个学校的领导权都牢牢地掌握在院党委手中。钱院长想调进一个人,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学校人事处也未予重视。

当时虽然还没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口号,但是整个北京政法学院都充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氛围,每一门课的学习方法都离不开"阶级分析"。记得我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院团委称我们将来是掌握"刀把子"的人,对此我颇感得意。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党外人士讲授法学课程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党内文件,因而不容易领会党的政策,而课堂上的主要内容是讲政策。加上考虑到如果将来从事"刀把子"工作,没有党票就更不行,所以那时学生们都积极要求入党。

与全国一样,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全面贯彻学苏联"一边倒"的方针。那一年,学校聘请了两名苏联专家:楚贡诺夫(刑法)和克依里洛娃(民法)做院长顾向。无论是教学制度、教学方法、教材或者考试方法唯苏联马首是瞻。我们年级共16个班,分两个大班上课,小班进行课堂讨论(这对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很有好处)。考试采用口试,每位学生抽取一张题签(一般出两道题),给一定时间准备后,学生口答,主考老师质疑并当场评定成绩。成绩分为优等、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5个等级。有一门课叫"马列主义基础",讲的就是联共(布)党史。"国家与法权理论"用的是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材。维辛斯基被认为是法学界最高的理论权威,当时把属于政治学范畴的国家学说和法学放在一起讲。把法律简单地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教条几十年不变,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给学生上课时还离不开这个框框,多么可悲的僵化!

当时担任教学任务的主角是中青年教师。由于多年没有评定职称,这些教师中有讲师,也有助教,统称为教员。像杜汝楫、程筱鹤这些资历较深的,也只是讲师,宁汉林、潘华仿、孙丙珠他们还只是助教。许多青年教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张子培老师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老革命、老党员,曾担任过院党委副书记,后担任刑诉法教研室主任,讲课很有见地。当时法学界有两大争论点:一是无罪推定原则;二是法的继承性。张子培老师是批无罪推定原则的领军人物,记得当时他还在刊物上发表过影响很大的著作:《驳"无罪推定"》和《驳资产阶级"无罪推定"原则》。后来听说在文革中,张老师表现得也比较"左",这就不奇怪了。许多主张"无罪推定"和认为法律有继承性的学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不乏其人。

（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一个多月后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一开始，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畅开心扉，向党提意见。多数意见是“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但也有个别大字报，语言刻薄，带有人身攻击性质。有一张可能是教工贴的大字报，揭露学校一些党员干部的个人隐私，说他们进城后，抛弃糟糠之妻，另觅新欢，还斥之为“党棍”。

当年6月30日至7月21日，钱端升院长赴科伦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并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出访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同学们都无比敬重。我们知道，他24岁就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内知名大学当教授。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士，在国民参政会上，钱先生是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之一。解放前夕，他拒绝友人挽留，毅然返回祖国，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钱端升教授的表现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他肩负社会上14个重要职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反右前最后一个职务是1956年6月8日成立的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的副会长。

钱端升院长非常关心学生。我们刚入学时，钱院长亲自到学生宿舍看望我们。还有一次，下午有钱院长做报告，院行政通知我们提前一小时进会场。他知道后非常不满，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让师生等候这么长时间，批评了组织者。

“鸣放”高潮时，钱院长正好在国外，所以他发表的言论并不多。但是政法界反右的烈火一经燃起，钱院长就首当其冲，被当作“章罗联盟”在政法界的一员大将。综合批判的内容，大体有这么几点：1. 攻击党的领导，污蔑学院党委和上级领导存在宗派主义，他身为院长，但有职无权。2. 否定院系调整，建议由人大、北大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组成所谓“大法学院”，由他任副校长兼院长。其实质是否定党的领导。3. 抨击学院培养的毕业生大多数学非所用。4. 笼络学生，煽动学生对党和社会的不满。有一位名叫章文岳的学生，极有才干，他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父与子》，受到作家秦兆阳（后也划为右派）的赏识。章文岳给钱院长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对社会某些现象的不满。钱院长在复信中，教导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也成了一大罪状。我是从贴在学院联合楼入口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这些内容的。

1957年，作者在北京政法学院宿舍阅读

说实在的，我们真是不理解，钱院长的这些言论怎么能同“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上钩？一位一贯追求进步和光明、德高望重的学者，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共老手”！钱院长和罗隆基等人从科伦坡访问归来，在昆明做短暂逗留。报载，罗隆基当时十分紧张，急忙与北京的浦熙修通电话，探摸形势，而钱院长抵京后一直未上班（表示要熟悉一下国内形势）。1957年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学校用车把他从家中接（当时还未叫“揪”）到学校礼堂，责令他向师生交代问题。钱院长眼眶湿润，叙说他对党的不满：他积极要求入党，但政法界当时只吸收了周鲠生一人。首次交代，钱院长被主持会的学生会主席斥责为“不老实”。

在教工中，先后有一批人，其中包括一些骨干教师，被划为右派。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宁

汉林、余叔通、王革也在此列。老师们的“右派言论”无非是对院党委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的一些偏差和学校工作中的一些不足提出批评，而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鲜有评论。当时学校弥漫着紧张、恐怖的气氛，原先宁汉林老师给我们上刑法课，后因打成右派被撤换，由余叔通接任。没过几天，余老师也被揪了出来，只好再换他人。

学生中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在各班党支部领导下，揪出了一大批“右派分子”。有的班还揪出“反党小集团”。有一些思想活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自由论坛”，结果多数人被打成右派。说实在的，学生们主要锋芒是批判已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论”，其余也只是对学校工作的批评。

右派分子的罪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是，“党”的外延十分宽泛：学校党委是“党”，学生党支部是“党”，甚至于一个支部书记、一个党员也是“党”。有的班级党员班长与支部书记闹矛盾，班长因此被打成“党内右派分子”。因为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另一个问题是对右派分子的定性远不如对犯罪分子定罪那么严格。有的高级民主人士，虽也有与“右派言论”相似的言论，但是有中央的保护照样可以过关。政治上考量与历史渊源的作用非常大。

这里不排除某些掌权者利用“反右”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我所在的班级只划了一名右派，他是一名调干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文工团的。由于自认为年轻有为，学习不错，又擅长文艺，所以比较骄傲，群众关系不好，在团支部日记（由团员轮流记写）上把一些团干部和党员比喻为“苍蝇”“蚊子”。他的缺点和错误是明显的，但是硬把他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是很牵强和可笑嘛！我们有一些同学对此都有类似的看法，很快党支部就组织我们讨论“对右派分子为什么恨不起来”的问题。大家只好从立场、阶级感情等方面检讨自己。

北京政法学院参加反右斗争的1923人，共划了右派分子176人，比例为9.2%（以上数字引自《甲子华章——中国政法大学校史》）。这些人，包括批斗他们的广大群众，都是从向党交心开始，以被“阳谋”所害告终。

（三）

反右斗争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教学都停止了，每天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进入1958年，反右斗争进入补课和组织处理的阶段。3月3日，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刘镜西做关于“反对浪费，反对保守”的双反运动的动员报告。这仍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但性质区别于反右斗争，主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采取的方式也还是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但是从用词上看是界限分明的：对右派是“揪”，而对“双反”用的是“火烧”“拔白旗”。

“双反”在学生中主要是批判“白专道路”、批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进入后期是整改阶段，学院着手修订长期的教学计划，学生制订“红专规划”。

“双反”运动中，学院逐步恢复了教学活动。但是，当时强调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出现两大显著变化：

一是重政治轻法律。在教学中大力主张“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我还在院内刊物《政法教学》上写了一篇阐述政策与法律辩证关系的短文，坚定地认为政策高于法律。学院安排法学的课程很少，多数是邀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做报告。罗瑞卿、郑绍文、谭政、黄华、甘泗淇、申健都为我们上过课。后来听说，有的领导主张政法学院要办成党校性质。而在实际上，法律虚无主义已在师生心目中扎下了根，政法学院与党校已经没有多大区别。

二是大幅度增加体力劳动的时间。除了平时的爱国卫生清洁、积肥、除四害，我们班级还去十三陵工地修水库10天，去丰台车站修筑驼峰工程20天，去密云大炼钢铁25天。在10个月的时间内，参加了近两个月的体力劳动。

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政治运动和学习生活，把我们大多数人都铸造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毕业后都愿服从分配，到边疆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遗憾的是，专业知识学得太少了。■

（作者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亲历各党各派争取宪政的斗争

○ 王 健

民盟主张宪政,反对一党专政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掀开新的一页。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派叶剑英代表中共向南京的国民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上庐山跟蒋介石谈判,提出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约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9月,宣言发表,国民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提出《抗战建国纲领》。经讨论,各方面都希望国民党实现民主宪政,最后制定了抗战时期的全国共同纲领。根据纲领,组成国民参政会。

1939年9月,在第四次参政会上,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提出国民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推选若干参政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宪法,并于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当时共产党、民主党派参政员和国民党参政员形成两派,展开激烈争辩。一方面认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结束党治,认为不必要实施宪政。双方申述自己的理由,展开舌战,难以收场。

是年10月,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等12人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决定组织民众团体协助推进民主宪政运动。他们先后召开了8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决定成立协助促进会,推选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章伯钧、史良等25人为促进会常委会委员;沈钧儒亲往桂林向各界人士推进宪政运动;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出版了《宪政运动论文集》;章伯钧与张友渔(法学家)、柳湜(共产党)、沙千里(救国会)等7人合写了《五五宪草》一书,尖锐批评国民党1936年的五五宪法草案;罗隆基、钱端升、张君劢向第五次国民参政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并向大会做了说明。与此同时,成都、桂林、上海、延安等地纷纷响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民主党派的报刊《国民公论》发表《抗战与宪政》一文,认为两者不可分,"只有实行宪政才能推进民主、坚持抗战"。

1942年我到昆明,为上大学找到李公朴,先后帮助他开办书店和出版社。李公朴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曾经应沈钧儒之邀筹备成立民盟。出版社的主编是张光年(即诗人光未然,共产党员)。我一面上大学一面做李公朴的助手,并由李介绍加入了中国人民救国会。

李公朴、张曼筠夫妇在昆明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迫于民主形势的压力通过决议，宣告准备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针对这种敷衍举动，民盟主席张澜直言告蒋介石，应立即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同月，张澜发表论文《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弊害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深入剖析，深刻阐述了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国民党对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加以阻止破坏——派人大闹重庆民主人士举行的宪政座谈会；利用其喉舌《中央日报》大肆造谣；动用国家权力对宪政运动做出种种限制。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党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中共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随之掀起高潮。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一党专政。四川、南京几所大学2000余人举行国是会议，一致要求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昆明，民盟省支部联合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法大学在省主席龙云(民盟秘密盟员)默许和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于10月10日聚集昆华女中操场，召开5000余人大会。会上，民盟罗隆基，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李公朴、吴晗，云大教授楚图南，相继发表演说。后由闻一多宣读大会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会后群众大游行，高呼："成立联合政府！""保卫大西南！"这是在云南国统区第一次民主运动。12月15日，纪念云南起义29周年，民盟又组织几个大学和文化界举行纪念大会。大会由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主持，李公朴为总指挥。会上先请几位护国将军、元勋、护国起义者发表演讲，吴晗发言的主题为"以历史眼光看现实"。最后由闻一多宣布大会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会后，数千人举行游行，呼声震撼了山城。我作为大学生参加了这两个大会。

民主力量在反专制大旗之下集结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做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但国民党阻挠报纸发行。我们出版社有可靠的印刷厂，我设法找来了《新华日报》，印刷厂接到报纸后在门外贴了一张"家有喜事暂停业三天"的启事，用3天赶印出32000册，一部分在学校发行，另一部分送滇南进步书店，广为宣传。

右起：张光年、李公朴、赵沨

这一年，昆明大中学生、职业青年、新闻记者及盟国友人共6000余人在云大操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6周年大会。闻一多、潘光旦、潘大逵(云南大学教授)、吴晗等教授出席，吴晗、潘大逵做演讲。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学生们在移动，闻一多大声疾呼："这是天洗兵，不怯懦的走近来！"群众稳住了，大会顺利进行。会后在小雨中举行了万人大

游行。人们高呼："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闻一多始终走在队伍当中。游行群众激情难以抑制，又走回会场，闻一多即席讲话："五四过去26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五四还要科学，不过，没有民主不可能发展科学。所以我要再三要民主。"

抗战胜利后剃掉胡须的闻一多

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欣喜若狂。闻一多很快剃掉了胡须，李公朴一夜难眠，写了一首诗：《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告诫人们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是民主和平还没有真正到来。当时我和张光年同住一室，晚上他从外面庆祝回来很快就睡了。我兴奋得不想睡，找出一块大石章，用铅笔刀刻了4个阳文大字"民主和平"。我以为和平民主就要实现了。

同年9月，李公朴和几位民盟中央委员赴重庆参加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蒋介石一面备战，一面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考虑到战后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毛泽东毅然飞往重庆。国共谈判43天，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同意召开由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正式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个方面的代表：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共38人。经过22天的激烈争辩，达成5项协议。会议期间，中共和民盟曾有协议，在重大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达成一致，互相配合。

2月10日，重庆各界数千人举行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竟有一群特务上讲台捣乱，大打出手，总指挥李公朴受重伤，郭沫若等人也被打伤，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政协决议墨迹未干，即遭蒋介石撕毁。

同年11月25日晚，在西南联大广场6000多学生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诉求举行时事晚会。会议请钱端升教授演讲"中国政治之认识"。钱教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演讲未毕，校外枪声四起，当地驻军包围了会场。师生们保持镇静，继续由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演讲，至10时散会。但此时各处出口均被封住，大家从几条小路逃出包围圈。为抗议国民党破坏会议，4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连夜开会决定联合罢课。次日成立"罢课联合委员会"，领导全市大中学生罢课运动。几天后，12月1日，国民党军队闯进联大乱扔手榴弹，4名师生应声倒在血泊里，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12·1"惨案。在中共领导下，联大师生跟反动当局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初步成果。12月27日宣布复课，继续开展深入持久的斗争。在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支持学生的最前列。

亲历"李闻血案"

1946年2月，重庆发生"较场口血案"，李公朴流血过多住院疗养。出院后与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聘请知名学者讲课，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办。5月间，李公朴回昆明，国民党特务满街横行，在墙上贴满污蔑诽谤李公朴、闻一多的大字报。社会传闻国民党开出了黑名单，李、闻的名字均在前列，而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照常活动。他们二人同留在昆明的民盟领导人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7人决定从6月26日到28日召开3次招待会，分别与党、政、军、社会各界、新闻记者见面，公开阐明民盟的主张和立场，以正视听，受到与会人士的欢迎。

7月，昆明局势更加险恶，李、闻家经常有特务监视。李夫人常劝李先生尽量少去活动，公朴先生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11日晚饭后，公朴先生偕夫人出去办事，9时许在回家的小路上，特务从背后开枪，李公朴当即倒地。李夫人大喊："救人啊！"路上有云南大学学生闻声赶来，找来帆布床，将李先生急送附近云大医院抢救。我和李夫

人、李先生之子李国友一直守在病房。先生口吐鲜血，时昏时醒。直至12日凌晨，只见先生一阵回光返照，先骂特务：“卑鄙！无耻！”接着说：“为了民主，为了民主！”吐出最后一口血，停止了呼吸。

12日清晨6时，闻先生赶来，流着泪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李夫人劝他：外面风声险恶，不要出来了。他说：“公朴为民主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

4天后，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殉难报告会。闻先生家人劝他不要去参加，他坚持要去，最后说好参加而不讲话。来到会场时，已坐满千余人。李夫人报告未完已泣不成声，特务们乘机起哄，闻先生实在忍耐不住了，拍案而起，发表长篇讲话。“反动派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出来！”“广大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去！”这竟是闻先生最后一次演说！

大会结束，闻先生在学生们护送下回家休息。下午又同楚图南一起召开记者会。会后闻先生的大儿子来接，父子走在宿舍大门口，突然两边枪声大作，闻先生当即倒地殒命。其子扑在父亲身上也身中数枪，幸未击中要害，急送医院抢救。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

同年10月，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李闻大会，五六千人参加。大会由宋庆龄领衔，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和各界知名人士组成主席团。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主持，发言的有潘公展（国民党）、郭沫若。邓颖超代为宣读周恩来的祭文，文曰：“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在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最后是罗隆基即席讲话。他说：“民主是坐牢、流血、牺牲而得的。”“潘公展先生说我们究竟要英美的还是苏联的民主，我可以代表我的同志答复，他们要的是老百姓能活命，能自由，能过人的生活。老百姓不能活、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民主的。”“杀死一个人并不是杀死他们追求的信仰，因此，可以杀死他们两位，而不能杀死民主。”讲到此，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同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一党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和谈宣告失败。当时，我特去访问了民盟中央常委——70多岁的沈钧儒老先生。我问他，和谈停止后，民盟应该做些什么？沈老答道：“民盟担负着时代的任务，就是团结与扩大这个民主运动。”谈到“中立性”问题时，老先生说：我们是“第三方面”“中间立场”，但是斗争实践的结果，“中”是不存在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比如所谓中间立场的民社党，张君劢投靠了国民党，罗隆基左转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多数所谓“中间”的民主党派，是和共产党采取一致行动的。

宪政运动大现光芒

1947年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强迫民盟自动解散，张澜被软禁在其寓所。沈钧儒、章伯钧先后化装秘密赴香港。1948年1月，他们以民盟常务的身份召开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解散，并通过《政治报告》和宣言，号召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彻底摧毁反动的南京独裁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这时，中共的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在“五一”发布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通电响应“五一号召”。当时中共在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先后安排各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秘密赴内地东北解放区。潘汉年给我的任务是带邹韬奋和李公朴家属以及萨空了的两个女儿，经天津去华北解放区。到解放区后我进入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邹韬奋夫人和女儿留在北平，其他人也各有安排。

1949年2月，平津先后解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人士陆续来到北平。我是在3月25日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进入北平的。沈钧儒找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点名要我做他的秘书。于是李维汉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商议，同意我做沈老的政治秘书，我便随沈老住进北京饭店。5月以后，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沈老（下转第48页）

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

○ 李根清

十年文革是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猖獗的年代。1966年底至1971年秋，我在林彪办公室担任保密员，亲眼目睹了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的情景。

给毛泽东送上“四个伟大”的头衔，有个演变、定型的过程。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发表讲话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这是从林彪嘴里第一次完整地喊出“四个伟大”的口号。

这篇讲话的著作权不属于林彪。同他在天安门上发表的其他讲话一样，讲话稿是由中央文革起草、毛泽东最后审定的，林彪只不过是照着念一遍。

在“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四个头衔中，有据可查属于林彪送的有两个，一个是“统帅”——1966年8月8日，林彪接见刚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你们是作战员。”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的稿子中第一次使用了“毛主席是统帅”的提法。林彪送毛泽东的另一个头衔是“舵手”——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说，不承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最后把“导师”“领袖”“统帅”“舵手”按固定顺序凑在一起，并分别冠以“伟大”，则是中央文革“笔杆子”们所为。其中，陈伯达提出的有三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陈伯达主持会议，他一开头就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隔了一天，8月20日，陈伯达主管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又加了一个“伟大的统帅”，凑齐了“四个伟大”，并且顺序从导师开始排列。社论说：“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8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口号，在“四个伟大”后面加了“万岁”二字。

1967年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请求林彪题写“四个伟大”，说准备镌刻在该校即将落成的毛泽东大型塑像的基座上。五一节前一天上午，叶群到秘书办公室问道：“都是哪里要求题词呀？你们快点准备一下，今天首长身体不错，可以题词。”

我连忙找出笔墨纸砚，和秘书小郭、小于一起来到林彪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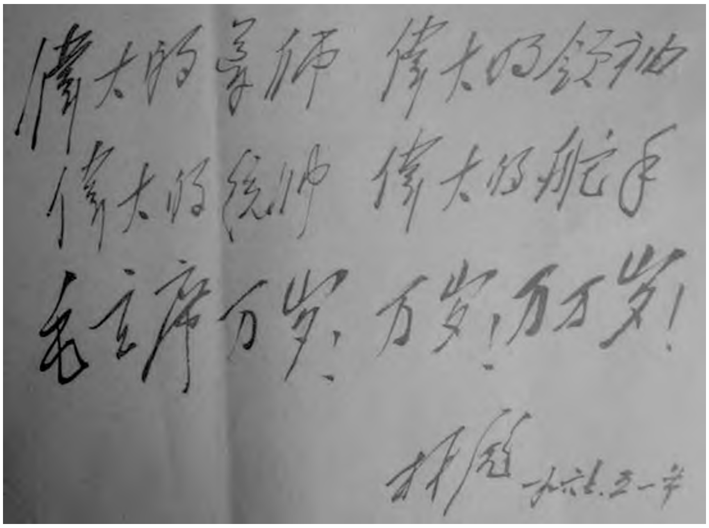
“都是哪里呀？”林彪问。

“有北京军区《战友报》、清华大学蒯大富……”郭秘书回答。

林彪听到蒯大富的名字，本来正在挑选毛笔的手立刻缩了回来，正色道：“给蒯大富写什么？！”

叶群一看林彪变了脸，马上凑到林彪身边，用她特有的语调慢慢劝说林彪道：“清华大学建了一尊主席塑像，有三层楼那么高，汉白玉的，光基座就有两米多高，大理石镶面，这是多好的事呀！他们想在基座上刻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说，他们这个要求你能不满足吗？”

林彪还有些迟疑，但也没有再说什么，挑选了一支毛笔准备题词。我把宣纸铺在林彪座位前面的茶几上，把刚刚研好的墨放在茶几一端，又把林彪选好的毛笔在清水中泡开递给他，他便动手写起来。先写了“战友报”三个字，看看还可以，便不再重写。然后又在另一张纸上题写了“四个伟大”，写完便放下笔，靠在沙发上休息。



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刊登在《人民日报》1967年5月1日第一版

叶群看了“四个伟大”，嫌字写得小了，瘦了，就劝林彪再写一张。那天林彪精神头的确不错，就换了一支毛笔重写了一幅，这便是后来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的题词。

叶群把林彪的题词拿起来，轻轻晃动着对在场的秘书说：“首长这个题词很重要，很有意义。首长是题给全党的、全军的、全国的，不是题给蒯大富的。你们不要送给蒯大富，不能让蒯大富沾光。你们把它送到解放军报社去，让他们五一见报。可以打个电话给蒯大富，告诉他用报纸上公布的题词。”

按照叶群吩咐，我和于秘书一起来到解放军报社，把林彪的题词交给他们，并转告了叶群的意见。我俩等到他们把题词制版以后，带回两张复印件给叶群看，后来一直保存在档案里。

1967年5月1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林彪题词。随后几天，其他报刊纷纷转载。

不久，毛泽东的反应传到毛家湾。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登出的题词，对身边的人说：“谁封我这四个官啊？什么万岁，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我死了，你们要吃大亏。”

没有听说林彪有何反应。当时没有人拿毛泽东的这个告诫当一回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急剧升温的个人崇拜到1967年上半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跳忠字舞、唱语录歌、佩戴毛主席头像纪念章、建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大型塑像、手捧“红宝书”站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已经风靡神州大地，人们都发自内心地喊毛主席万岁，谁也不觉得“四个伟大”不好。

1967年7月初，北京军区请示在军区大院广场建造毛泽东全身塑像。这是军队请示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第一家。林彪把他们的请示转呈毛泽东，毛泽东7月5日批示：“此类事件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于是，周恩来主持会议于7月13日做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制止塑像风。但是，那时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份文件阻挡不住在全社会疯狂涌起的“三忠于”“四无限”的浪潮，塑像风依然在各地盛行开来，毛泽东身穿军大衣，挥动巨手，接见红卫兵的大型全身塑像在全国各地的广场上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每尊塑像无不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镌刻在基座上。

有一次，毛泽东既诙谐又无奈地说，数九寒天，你们都睡觉了，还让我站在那里站岗放哨，多么残忍哪！他还对浪费大量资源制造像章之风不满地说：“还我飞机。”

个人迷信泛滥，形而上学盛行，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物。林彪题写“四个伟大”，推波助澜，难辞其咎。■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40元。另：

2011年合订本为简装一册，定价110元。

2012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2013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免付邮资，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咨询电话：010-68532048、68539058

邮寄地址：见本杂志目录页。

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

○　庞国义

重庆人民都知道解放碑，它是山城的中央商务区，就像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一样，以繁华、热闹闻名于世。可是当代许多人都不知晓，在这片宏伟大厦的过去，解放碑建筑的位置上，曾经是抗战胜利纪功碑，而再往前这里矗立的是“精神堡垒”。

从“精神堡垒”到抗战胜利纪功碑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坚持全民抗战。

抗战期间，日寇对战时首都重庆长期实施战略轰炸，袭击对象包括重要的政治中枢机关，还有经济、产业重地，并直接空袭无辜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以达到他们挫败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的。为了反击日寇侵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树立长期抗战的斗争精神，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吴国桢提出，在日机轰炸最厉害的地带，建立一个能体现长期抗战的“精神堡垒”（见《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世界书局印行），告诫民众勿忘日寇的残暴，树立同仇敌忾精神，坚定对日长期抗战的信念。

1941年12月30日，在重庆市区都邮街广场（即现在的渝中区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几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一个曾经因炸弹爆炸形成的大弹坑上，建成了一座碑形建筑，取名为“精神堡垒”，意指坚决抗战的精神丰碑。它渐次成为陪都各界及中枢当局举行庆典、集会、宣传的场所。

堡垒为一炮楼形状的木结构建筑，按照市制单位计算高为7丈7尺，寓意“七七”抗战。建筑外表涂成黑色，以防日机轰炸。柱底朝民族路方向有“精神堡垒”4个字，其余三方，分别写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顶部设置一口大瓷缸，内贮棉条燃油，遇有重大集会，即点火助威，烈焰熊熊，表明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决心，昭示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浩然正气。

1941年建成的“精神堡垒”

堡垒顶端有旗杆，每至清晨午夜，要举行隆重的升降旗仪式，一队队警察和士兵整齐列队，向旗杆上飘扬的国旗举手敬礼。此时，乐队鼓乐齐鸣，车马行人止步驻足，注目为礼，激发着澎湃的民族豪情。

千里迢迢从沦陷区进入重庆的抗战将士和中国难民，看见“精神堡垒”，无不倍感亲切。从重庆出发执行抗战任务的人员，在“精神堡垒”前宣誓赴任，增添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山城人民铿锵誓言：宁可家破人亡、血肉横飞，也绝不屈服，与日寇抗争到底的意志永恒，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堡垒”。《大公报》推崇它象征“中华民族为一坚强战斗体”，宣示着陪都重庆和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顽强精神。

随着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越来越高，

吴国桢，1939—1942年任重庆市市长

位列世界四强。1942年10月10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精神堡垒”向世人宣布：美英两国自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害主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喜讯传出，全国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群情欢腾，士气大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立刻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精神堡垒”周围盛况空前，重庆市民、军人、官员、盟军朋友自发集会游行，数十万人聚集在“精神堡垒”和较场口广场，鞭炮鼓乐齐鸣，欢声口号不绝，人人脸上淌着喜悦的泪水。著名影星金山、赵丹等也在人群之中，在胜利狂欢中，赵丹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在地上打滚，撞坏公信拍卖行的橱窗玻璃，留下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疤”。入夜，万家灯火一片辉煌，4盏水银灯把“精神堡垒”照射得雪亮，摄影记者抢下无数珍贵镜头，人群通宵达旦狂欢，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9月上旬才结束。

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张笃伦于1946年10月9日，在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上提出并决定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功碑由重庆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设计，天府营造厂承造。耗资2.17亿元，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十分坚固，即使在10米内投掷500磅炸弹亦无法摧毁，用16英寸平射炮亦不能射穿碑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

纪功碑于1946年12月动工，1947年8月落成，八角柱形，外饰浮雕，碑高27.5米，内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方位仪和瞭望台。

碑的正面，面向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7个镏金大字，落款书写：“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碑座有石碑8面，铭刻国民政府明文规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国民政府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写的碑文；还有张笃伦市长和市参议会的题词；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墙壁上。

在原“精神堡垒”旧址建造抗战胜利纪功碑，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建筑，提醒国人，8年抗战的殊死拼搏之不易！重庆作为陪都为抗战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可贵！中华民族得来百年抵御外敌胜利之伟大！

正如张笃伦市长所说：“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了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当我们重庆遭受残暴轰炸的时候，美故总统罗斯福曾赠卷轴，向陪都市民表示敬意和慰问。1944年5月17日，罗氏亲笔书写道：‘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

有关恢复纪功碑的讨论

重庆解放后的首届国庆节，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原来所有碑文全部铲除，内外另行装饰一新。由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将军题字，将碑名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解放碑现为重庆主城的中心，成为重大集会、重大节日庆典之地及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

之一。

可以理解当年的重庆市领导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历史使然。国共两党的较量，政权的更迭，新的胜利掩盖了旧的历史痕迹，感慨之余也留下莫名遗憾。

堂堂抗战陪都，没有了中国唯一的一座全国抗战胜利纪功碑，再也看不到“胜利走廊”刻有罗斯福总统赠予重庆的卷轴译文，8面碑石壁上国民政府确定重庆为陪都的颁令全文，以及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从此后，随着岁月流逝，一段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忆被抹掉了，一个民族伟大英勇、艰苦卓绝的记忆被抹掉了，重庆人民曾经奋起抗战的心灵镌刻也被抹掉了，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记忆的空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市政协委员会和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恢复纪功碑的原貌。近年来网友要求恢复原名的呼声也十分强烈。

支持恢复纪功碑原貌的理由如下：

（一）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纪功碑是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丰碑，具有思想性和重要性。

（二）国共合作抗战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基础，纪功碑记录的有国民党的抗战，也有共产党的抗战，是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当前海峡两岸需要沟通感情和加强合作的纽带，具有现实性。

（三）重庆是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融入世界潮流，加强文化交流，具有国际性。

（四）它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五）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不阉割历史，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具有政治性和历史性。

1950年改称人民解放纪念碑

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话题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纪功碑不但从实物形体上遭到湮灭，而且从表现内容上也遭到非议。抗战胜利纪功碑及“精神堡垒”之所以被低调处理，是因为它与国民政府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挂上了钩，碑上写有国民精神总动员的3个目标，被认为是国民党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产物。

其实，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具体体现。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誓词》《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中，始终贯穿坚持“抗日”“救国”等内容，这在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全国情绪动荡的情况下，对于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增强全民抗战力量，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在抗战特殊背景条件下，国民精神总动员的3个目标，“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也是为着坚持抗战，直至夺取最后胜利而制定，这是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共同呼声。正如《纲领》所说：“非提高吾全国国民坚强不屈之精神，不足以克服艰危，而打破敌人精神制胜之毒计”，“若国民对此不能体会而力行，或体会不真切，力行不一致，则国族危机，必将增重，制胜克敌，将益艰难。故抗战前途，国族命运，成败安危，实均系于国民精神总动员之一举也！”（见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延安解放社，1939年5月15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对揭露、痛斥不关心抗战前途，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等劣根性卓有成效，对促进民族觉醒，唤起民众抗战作用十分显著。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实现国民精神总动员大会上，对这3个目标进行了充分肯定和精辟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们国家的独立，妨碍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要打倒它。一切汉奸卖国贼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我们也要打倒它。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要达到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就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起来，这就要实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蒋委员长所号召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1939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以下简称《告全党同志书》）（《解放》周刊第71期，延安解放社，1939年5月15日）对此做了充分肯定，《告全党同志书》中开篇即说：“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并结合实际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容做了新的解释和有益改造，同时就如何开展这一运动在党内党外都做出了明确部署。最后，《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同志及各界先进人士、全国青年做到不辞辛劳，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中共《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提出要把精神总动员变成群众运动，坚持抗战到底。重庆各界、各团体向民众发出了“实行精神总动员”的号召（见《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知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陶行知等主编的《国讯》旬刊发表署名文章称：“毫无疑义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这一运动将成为鼓奋吾们民族精神的一服良剂，它必然是歼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一股主力。”（见孟起：《怎样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国讯》第202期1939年4月15日）

不顾历史事实，贬低或歪曲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不恰当的，由此而向鼓舞民众抗战，值得全国人民特别是重庆人民骄傲的“精神堡垒”抹黑是不明智的。

当然，处于政党利益需要，国民党在贯彻执行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掺入了己党私货，搞什么“防共、限共、溶共”，这是要揭露的。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次指示（见刘益涛：《十年纪事——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4月），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抗日的，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我们要经过这一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支持、运用和发展其中积极的东西，对其抗日方面予以支持，批评其中包含的缺点，对其反共反人民方面予以抵制，揭露其压制人民抗日力量的企图，使这一动员成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要求民主的武器。

据此，我们怀念“精神堡垒”的功绩和光荣，同时希望给抗战胜利纪功碑正名，恢复原来的名称，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作者为重庆市文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华源书阁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uaYuanShuGeCultureCommunicationCo., Ltd.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0050480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千元出书　赠送交流
回忆自传　家谱族谱
单书套餐　免费发行
丛书套餐　全国代理
A类：丛书号出版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赠送最低1000元
服务热线：010—56223866　56223877
公司邮箱：huayuanshuge@163.com
公司网址：(华源出版网）www.hychuban.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A座206室

新闻立法之路

○ 孙旭培

1984年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启动制定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报告（邓小平说它“一个字也不能改”），要求“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分别过去了31年和28年，新闻法没有出台。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提出粗浅的看法。

阻力来自认识误区

尽管知识界，特别是广大新闻从业者，盼望新闻法早日出台，但确有阻力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同认识误区。

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立法不热心，认为在目前体制之下，搞不出开明的新闻法，如果搞出一个恶法，还不如不搞。因为过去最多说我违背了宣传纪律，现在就变成违法。由于新闻法草案，哪怕在很小范围内都没有公开过，这些人都没有看过新闻法草案，基本上是想当然的猜测。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新闻法草案，新闻自由度确实不高，但绝不是“恶法”，实行后会使新闻自由度有所提高。例如，在报道内容的规定上，实行的是“负面清单”的办法。通常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随意的、非程序的干预就不易做到。所以，自由空间还是明显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对新闻立法不抱希望，认为在每天对新闻媒体下指示的环境下，任何开明的新闻立法都不可能实现，不如寄希望于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在特定时机冲一冲，也许会出现新的局面。再加上研究新闻立法的成果面世困难，重要学术刊物都被打招呼不发表研究新闻立法的论文。于是，做新闻立法研究的人成了凤毛麟角。

起关键作用的阻力，来自一部分有权力的人，他们对新闻立法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陈云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钟沛璋：《政治文明与新闻立法》，《领导文萃》2003年第12期）这以后，新闻出版立法就偃旗息鼓了。毋庸讳言，在宣传系统，有个很大的否定新闻立法的群体，他们乐于每天从内部渠道给媒体发号施令。

那些恐惧新闻自由的人，把1949年以前那种一边办报呼吁推翻政府当局，一边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同时掌握两杆子，视为新闻自由的常态。实际上，那是因为当时是乱世，革命力量当然是合法、非法手段齐用；还因为世人对自由做了绝对主义的理解，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而不受限制。而上述做法和想法，在任何实行新闻自由的文明国家都是不允许和行不通的。早在17世纪，西方人就已形成共识：“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自由只服从法律。”（伏尔泰）“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洛克）19世纪的马克思更是说，“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可见，新闻自由是不能违背宪法、新闻法和其他法律的。这样的新闻立法何惧之有呢？

新闻法不出台的消极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个领域都有显著的发展、进步，并通过立法巩固这种进步，又为新的发展开辟道路。唯独新闻传播领域至今没有立法。事实证明，新闻自由度过低，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最突出的是面对腐败蔓延媒体无所作为。我国一边是官员腐败日甚，一边是高度防范媒体揭露腐败，这已成了常态。2002年尉健行曾指

出,1993年至1997年是我国经济犯罪案件的高发期。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开始搞市场经济,却要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实际上是取消了舆论监督。1998年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大讲舆论监督,甚至提出“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以《焦点访谈》为标志的舆论监督活跃了一个时期,后来宣传部门却要求《焦点访谈》也要“正面宣传为主”。2005年,宣传部门要求废除“跨地区监督”,广电部门还为此发了文件。《南方周末》为“跨地区监督”已做过10多年的努力,到这时也无法进行下去了。机关报、台失去监督功能,有个反面的例子为证。大肆受贿、准备带情妇出国的胡长清,临死前哀叹:“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新闻界好容易冲出一个“跨地区监督”,却被严厉禁止,使得贪官们暗中窃喜。后来,维稳成了阻碍媒体反腐的借口。

我国几十万新闻工作者,本是专业的新闻调查研究人员,本可以充当专业的反腐败巡视员。可在“维稳”的压力下,几乎所有司局级以上的贪官,没有一个是由记者通过报刊和广播电视揭露出来的。著名的案例,新闻人罗昌平揭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一案,并不是在罗从业的报刊上,而是以一个网友的身份,通过微博举报的。可见,对于从发现线索入手,深挖高官腐败加以报道,新闻工作者基本上是无事可做,只是在司法机关、纪检机关惩处以后,去发“死老虎”的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像我国这样浪费新闻资源。

其次,媒体起不到“看门狗”的作用,对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不敢发出警报,至多是浅尝辄止。我国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媒体却不敢公开向决策层及时输送强烈信息,不利于国家微调税收和分配政策;不让媒体向全社会发送警号,就形不成缩小基尼系数的社会动力。党政部门“三公”问题、各地建豪华政府大厦、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太大,早已是怨声载道,媒体却反应不力。像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做法,本是举世公认的防治腐败的好方法之一,如果我国媒体20世纪90年代初就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宣传,财产公开制度可能早就出台了。

没有法治提高新闻自由度,人治就会出来压制新闻应有的功能。我们的新闻名义上是党治,但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人治,少数领导者凭自己的感觉,对新闻媒体发号施令。有些宣传部门,在普法时期却要媒体不要说“公民”“纳税人”,而要说“人民”。在强拆现象到处发生的年代,不要报道“民告官”。依法寻求公平的路走不通,岂不是听任公民暴力抗拆?这些禁令有多少理性可言?但是通常要求你不要问这些禁令是谁下的,下这些禁令的理由是什么,更加叫人口服心不服。有些地方在网络上屏蔽本地区的负面信息,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报载为此还发生过网络警察贿赂网络警察的奇闻。这种管理方式在当今世界上很罕见。更重要的是,有禁令却无解禁,让媒体报道的路越走越窄。

在网络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高效、海量、互动的新业态,无论在传播事实信息还是意见信息上,竞争力都明显弱于新媒体。再加上被管得严,自由度远低于新媒体,在受众心中迅速边缘化,除了少数大电视台以外,越来越陷于困境。只有通过新闻立法,才能使它们接近新媒体的自由度。

在渐进发展上达成新闻立法的共识

摆出了对新闻立法的不同看法,不难发现,对于新闻立法主要可分为两种态度:一部分人强调自由度高标准立法,一部分人希望基本维持原状。民主离不开妥协,能不能找到保障适度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呢?

持第一种态度的人,应该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自由度也不完全一样,即使自由度高的国家,在批评问题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尺度。英国媒体可以批评王室,但不批评女王(这是一种习惯,或称习惯法);法国《出版自由法》规定,“侮辱共和国总统”要受惩罚(不过很难见到这类案例)。但美国全无这个限制,在美国批评总统远比批评老板安全。可见一味强调高标准,也不容易找到标准。

再说,我们需要有多重声音,但太高的新闻自由度,容易引起过大的噪音,激发民粹主义和“为反对而反对”的做秀政治,使民主政治走向低

效政治。这些也许可以看作民主政治的必要代价，但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改革任务艰巨，须有较高的政治效率，所以不宜去招致这些困扰。

持第二种态度的人，应该认识到，党在夺取政权前不断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而奋斗，吸引和动员了人民，可稳固掌权60多年后还不立法保障新闻出版自由，而是对新闻出版“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这就会被视为不守政治伦理。自由、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我国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立法，都强调法治，新闻领域不实行法治说不通，不能服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有些人硬要留下新闻这一领域，不执行这一要求呢？无论采用“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的不实陈述，还是“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的敷衍说辞，都应付不了人民代表不断提出的新闻立法或舆论监督立法的提案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管你对新闻自由有多么高的期盼，也不管你多么担心新闻变革引起的噪音，企图“以不变应万变”，中国的现实都需要新闻发生一定的变革。在两种态度之间能否折中一下，制定保障适度的新闻自由的新闻法呢？中国新闻法也许需要多次修改，以逐步提高新闻自由度。这或许能成为建立共识的最大公约数。3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启示我们，许多改革都很难一步到位，而靠不断地“挤门缝”。“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思维方式，不适应新闻立法。

对新闻法内容增补的3个建议

我国新闻法草案在20世纪80年代起草过3个。到1989年末，由新闻出版署牵头起草的草案，也已改了10多稿，虽然仍不甚理想，但可以作为修改的基础，可以在民主法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国情原则、渐进原则指导下修改。

有感于新闻法草案对一些重要内容的缺失，我提出以下3项建议：

其一，应有对创办报纸的规定。原草案采取不提报纸创办的做法，这影响了新闻法的完整性与规范性，需要加上此项规定。从原则上说，法律要保证公民办报的自由权利，我认为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办一两家民办报纸，无可非议。考虑到渐进发展，作为第一部新闻法，对此可以回避，但可规定，在现有报纸中，除了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和省市党委机关报以外，其他报纸，特别是都市报，可改为国有而具备民办形式的公共报纸。其特点是：具有法人资格，无主管单位，非营利性，自主经营运作。创办时由国家提供基本条件，同时接受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基金会等捐资助办。公共报纸接受国务院新闻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新闻评议会的监督，其负责人由新闻评议会在申请者中评选产生。公共报纸由出版单位直接对宪法和法律负责，即常说的，“记者对事实负责，报纸对法律负责”。

其二，要有关于对领导人的批评的规定。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建议新闻法规定：“对各级领导人的批评，由国家新闻管理部门根据渐进发展原则，制定实施细则，报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批准。”可考虑在实施细则中规定：新闻法实施之初，媒体批评可以开放到厅、局级领导人及以下；实施满3年，媒体批评开放到副省、部级领导人及以下；实施满6年，媒体批评开放到省、部级领导人及以下；实施满9年，媒体批评开放到副国级领导人及以下。正国级领导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不受媒体公开批评。作为第一部新闻法，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就很不错了。

其三，创办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评议会。现在各级党委宣传部几乎每天向媒体发出不能发表、必须发表、怎样发表等各种指示，由于他们单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许多看法与新闻业界、社会各界很不一致，日久天长矛盾积累，损害和谐关系，实际上也损害宣传部门自身的威信。发达国家严格禁止行政干预媒体，而实行法律加自律的办法。但我国在法律与自律这二者中间，空当很大，想完全没有政府和执政党的作用，目前是不现实的。

建议借鉴一些国家新闻理事会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构成和功能上都更加中国化的新闻评议会，党政官员可以参加进去。新闻评议会可由党政官员、社会各界专家、新闻界人士各占1/3组成。这样，党政官员可以

一桩刑事案件的背后

○ 陈宗立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大院内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杨小民故意杀人案。彼时，我是《光明日报》驻青海记者。由于此案在省高院错判而又久拖不改，群众反映强烈，因此中央决定派出“中央赴青海处理杨小民杀人案调查组”，后又决定派出“中央赴青海处理杨案有关责任者工作组”予以解决。力度之大，为新中国历史所仅见。

案情

杀人者杨小民（其父杨国英当时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男，汉族，时年25岁，1970年参加工作，被捕前系青海铝制品厂工人。被害人王强，男，汉族，时年17岁，待业。杨小民与被害人王强同住省委家属院内，1979年2月26日上午9时，杨去挑水，正值王强出门倒水，因水溅到杨的裤子上，二人发生口角。次日9时许，杨小民再遇王强，二人再次发生口角。杨小民立即回家戴上口罩、墨镜、卫生帽，持5寸藏刀，闯入王强卧室行凶，接连朝王的腰、背、胸部猛戳数刀。王一面求饶呼救，一面扑向门口，挣扎夺门逃命。杨小民却堵门拦截，继续猛刺，直到邻居赶来敲门杨才被迫停手。王强全身被刺伤14处，多处深抵内脏，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晨5时死亡。案发后，西宁市城中区公安分局将杨小民依法逮捕。杨

带着自己的报道要求参加会议，听取新闻评议会其他成员的意见，在协商的基础上投票。紧急时也可以使用视频会议或电邮投票的方法。在网络时代，新闻完全不报是行不通的，往往只是在后续报道中如何拿捏分寸，需要协商。

新闻评议会的职能、构成，必须在新闻法中加以规定，才有依法行使职能的权威。具体操作规程可由实施细则规定。

新闻法草案修改与新闻法研究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柳斌杰说，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内有望提交审议。这个消息令新闻工作者和知识界感到鼓舞。新闻立法由人大主导是合理的，建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督导新闻立法。

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新闻法草案，毕竟距今20多年了，现在必须有认真的修改。虽然这20多年，网络传播发展极快，但想把它改成也适合互联网各种业态在内的大众传播法，会继续延误新闻法的出台。在我国制定新闻法，重点在于传播内容的管控，就这一点而言，新闻法的“负面清单”（禁止刊登的内容）和“权利清单”（新闻自由权具体化），照样可以适用网络媒体。总之，保证新闻法早日出台是目的。

与此同时，要加强新闻法的研究。我国研究新闻立法的成果历来不多，但还是有的。比如，牛静的博士论文《论新闻自由权的具体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送审稿）〉的研究与建议》（已用《媒体权利的保障与约束研究》的书名出版），从分析立法内容到试拟条文，都很有价值。进行国际比较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因此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应改变几乎不资助新闻法研究的现象。新闻法的研究，不是只为当前的新闻立法服务，还要为以后的修订新闻法服务；不仅要有助于立法，还要有助于司法，所以要长期进行。■

（作者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被捕后态度嚣张，一进看守所就说："我不怕，我爸爸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他管保卫，有办法。"

此案经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杨小民犯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经区委审查同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城中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报经西宁市委审核同意。1979年10月3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杨小民杀人案上报省高院复核。省高院决定改判死缓，报省委审批。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省高院改判杨小民死缓的意见。

乔明甫

一审宣判后，被害人家属不服，上诉并到处告状。我作为《光明日报》驻青海的记者，从开始就听到群众批评青海省委的声音，认为司法不公，以权压法，包庇杀人犯。被害人的父母、姐姐到处告状，变卖家具，在西宁闹市区大街上和省委、省政府大门前演讲、控诉3天，出示被害人的血衣，围观群众数万人，有上千人签名、赞助，支持家属上访。省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被害人家属向代表、委员们下跪哭诉，散发申诉材料，引起多数人的同情和强烈不满。

所有这些，都打动不了官僚们的铁石心肠。

写"内参"呼吁

出于新闻记者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我与同站的记者李蔚，后又有《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参与，从1983年到1985年，先后3次写成"内参"向中央反映。第一次"内参"题目为《青海省委副秘书长杨国英之子杨小民——故意杀人重罪轻判群众强烈不满》。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导正在该文上批示道："卢云同志（时任记者部主任），能否公开报道呢？我倾向于改改，公开报。实在可恶。"后经我执笔修改，题为：《青海省委副秘书长杨××之子杨小民故意杀人案，重罪轻判，为何拖了近6年还得不到解决？》。此稿由马沛文副总编审定，经总编室打出小样后送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即"中指委"）审阅。很快有批示回来："请转告导正同志，中指委办公室副主任郝盛琦同志看了你报陈宗立写的青海省杨小民杀人案的报道，不同意公开见报。因为我们已派人调查，此事正在解决中，如果公开报道，有可能打乱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产生不良后果。"当时《光明日报》的值班副总编姚锡华批示道："请告马沛文同志，编委会意见，按中指委意见办。"

时隔不久，我们写了第二份"内参"：《杨小民案值得深究——建议中纪委直接派工作组查处此案》，及第三份"内参"：《对纠正青海省一桩死罪轻判大错案的述评》。

中央派调查组

《光明日报》的几次"内参"终于引起了中央最高层的重视。1984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道：徇私枉法，官官相护，封建家族关系。应当坚决查处。胡启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薄一波（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丕显（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郑天翔（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领导人也分别做出了批示，指出：此案的处理关系到党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不可等闲视之，应按法律程序改判杨小民以死刑，并责成中纪委会同中组部等有关部门查明在此案错判中起主要作用的几个领导干部的责任，分别情况，做出严肃处理。

遵照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时任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指委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决定，由中指委办公室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志组成"中央调查组"（后又有中纪委、中组部参与），组长由中组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乔明甫担任，成员有李子川、展旗、芦云亭、张耀、王铸、梁潮平、袁朴等15人。

1985年1月至2月，乔明甫率领中央调查组到青海调查。此时正值青海高原最冷季节，高原缺氧，年逾古稀的乔明甫冒着严寒和高原反应，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

由于我们《光明日报》连续发过"内参"，调查组首先找我谈话（此时李蔚已调京工作）。那天清晨，我骑自行车来到调查组驻地——胜利公园（即青海省委招待所）。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调查组成员、副部级干部张耀接待了我，我详细汇报了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经过、群众反映，以及我通过大量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张耀带我去见中央调查组乔明甫组长。只见在另一个房间内乔明甫同志正躺着输液、输氧——因高原反应、气候寒冷，患了严重的感冒。我见他身材高挑、消瘦，面色苍白，但情绪饱满。他对我说："十分抱歉，我只能半躺着和你说话啦！你是记者，敢于直言，主持正义，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值得肯定。"

中央调查组在这次赴青海调查期间，不少人都有高原反应，调查组成员、中组部干部王铸就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调查结果

1985年1月至2月，调查组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杨小民杀人案做了深入调查，先后查阅了有关案卷，走访了被害人家属和有关人员，向包括《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驻青海记者了解情况；听取了时任省委书记赵海峰、省长黄静波、省顾委主任张国声等主要领导人的意见（1979年2月杨案发生及其错判时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第二书记梁步庭已先后调离，原任省委书记赵海峰此时担任一把手）；还到监狱了解了杨小民的表现。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终于查清了案件真相，并写出了长达8500字的《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写道：此案经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杨小民犯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罪大恶极，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城中区委、西宁市委、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核同意，于1979年10月3日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决定改判死缓，并报省委审批。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是谭启龙，第二书记为梁步庭，书记为赵海峰。而杀人凶手杨小民的父亲杨国英此时正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又升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主任。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了省法院改判杨小民死缓的意见。由此，不难看出故意杀人犯杨小民是怎样被包庇的。

调查报告指出，省法院的改判决定和省委的复核是错误的，对错案迟迟不能纠正更是错误的，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宣判以后，由于被害人家属不停地申诉，新闻媒体的监督，《光明日报》、新华社先后发"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省高院复议，但经过近5年，青海方面找各种理由，硬是顶着、拖着不改。

调查报告还说，针对被害者家属告状，省委派人找家属谈话说："省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了，再告就是告省委，告最高法院。"还说到中央申诉也无用。但被害者家属表示：如果不纠正此案，将要拿着被害人的血衣，到北京天安门前控诉。

调查报告还列举了当时省委一系列令人怒不可遏的做法：1. 被害人家属到处申诉，指控杨国英和省高级法院院长杨树芳官官相护。杨国英怕死者家属复仇，就利用职权，从机要交通站索取手枪一支，子弹30发，揣在腰里。2. 正当社会上反映强烈的时候，省委对杨国英的职务却一提再提，1982年1月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提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1983年3月又提升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3. 在杨小民由死刑改为死缓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或起重要作用的有关人员，一个个先后都升了官，杨树芳于1981年9月，省委常委讨论推荐由省高级法院院长提为副省长；杨德山于1983年1月，省委常委决定由审判员提升为省高级法院副院长；韩德明于1982年5月，省委常委会批准由审判员提升为民和县县长，1983年7月又提升为海东地区副专员。

由于省委、省高院未能纠正错案，致使群众更加气愤，指控省高院执法不公，批评省委是非不分。

调查报告最后写道：调查结束以后，中指委

1985年7月30日青海省万人公判大会会场

办公室约请中央政法委、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建议：1.杨小民案作为特殊案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重新改判死刑，立即执行。2.严肃处理在此案错判中起主要和重要作用的人员。尤其是杨树芳、孙文合、杨德山等，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已提拔重用的应做出相应处理。同时予以通报，以挽回影响，教育干部。省委应总结经验教训，赵海峰应做出认真检查并给予必要的处理。3.对杨案办理过程中秉公执法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调查组《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于1985年5月20日上报中央后，受到了高度重视，6月13日，中央书记处第212次会议讨论了杨小民杀人案，认为：此案搞了5年之久，青海省的群众意见很大，要尽快解决。有些地方搞封建主义、家族关系、官官相护，应引起严重注意。在这个案子的错判和长期未予纠正的问题上，青海省委一些领导同志是有责任的。对那些在此案中徇私枉法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严肃处理。

中央做出决定

1985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厅字〔1985〕228号文件，向青海省委转发了《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同意《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请认真贯彻执行。"通知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此案非常重视，胡耀邦同志在调查组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郑天翔同志的三条意见是很对的。必须以严肃的态度维护法律的尊严，给那些徇私枉法的人应有的处分，以此来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胡启立、习仲勋、薄一波、陈丕显同志也分别做了批示，指出：此案的处理关系到党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不可等闲视之，应按法律程序改判杨小民以死刑，并责成中纪委会同中组部等有关部门查明在此案错判中起主要作用的几个领导干部的责任，分别情况，做出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而又被提拔重用的人，应重新调整他们的工作。

1985年7月10日、11日，中指委委员黄镇（文化部原部长）、中指委办公室副主任郝盛琦、最高法院副院长祝铭山、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冯锦汶，在青海省委1985年第29次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指示，指出：杨小民案拖了5年之久，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央十分重视，意见很明确，实际上主要是两条，一是按照法律程序改判杨小民死刑；二是对此案中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并指出，在此案错判和迟迟不纠正的过程中，省高院负有直接责任，省委负有严重的责任。

正值此时，1985年7月下旬，中央调整了青海省领导班子，赵海峰不再担任省委书记（一把手），他是杨小民故意杀人案从发生到错判、再到长期不纠正的主要责任者。而从案发到1980年错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第二书记梁步庭已于1982年、1983年先后调离。青海石油局原局长、党委原书记尹克升先是被赵海峰推荐、提拔为常务副省长，这时已升任省委书记（一把手）。1985年7月下旬青海省召开了六届三次人代会，宋瑞祥当选为省长。在杨案问题上主持正义的老同志张国声（原省顾委主任）、黄静波（原省长）同时离休。

在中央和中央工作组的督察下，1985年7月30日，青海省在西宁火车站广场公开万人公判大会，将杨小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死刑。这天，西宁市数万人走上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呼法律的胜利，正义战胜权力，人们说：杨小民这个现代“高衙内”总算伏法了！

第二天，被害者的父亲王水代表全家给《光明日报》青海记者站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不畏权势仗义执言”；另有群众送的锦旗，上面写着“人民的喉舌　法制的卫士”。作家肖复兴经过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弱女子告状记》，刊于《报告文学》杂志；《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孟晓云采访我，并写出了报告文学《民心》，刊于《啄木鸟》杂志。

杨小民故意杀人案惊动了中央，震动了全国。邓小平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扯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谭启龙、梁步庭、赵海峰——原讲话刊于1986年内部简报《中办通报》上的点名，《邓选》公开出版时删去——作者注）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中顾委常务副主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1985年9月24日在中指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青海省前几年发生了一起重大杀人案，罪犯叫杨小民。他的父亲当时是省委办公厅的副主任，由于官官相护，徇私枉法，这个本应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却被庇护达5年之久，先是判为死刑缓期执行，后又改为无期徒刑。被害人家属一直告状，群众很不满意，最后还是中央派出调查组查清事实后，今年7月30日才依法把杨小民杀了。为什么这么大的案件中央报刊上没有登？因为有关责任者还在继续查。”（摘自1985年10月24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发的《整党通报》）

中央派工作组

与此同时，1985年7月中旬，由乔明甫任组长的中指委、中纪委、中组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五部门组成的“中央赴青海处理杨案有关责任者工作组”到达青海（注：“工作组”不同于以前的“中央调查组”）。乔明甫这次二进青海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中央〔1985〕228号文件的指示，一是督促青海省委按法律程序重新判处故意杀人犯杨小民死刑；二是进一步查处在杨小民案死罪轻判中有关责任者。这次乔明甫等人从7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工作了3个月，做了大量调研、查证，先后调查了243人，取得了351份材料，最后形成了《关于杨小民错判案有关责任者的错误事实、性质及处理意见的报告》。

故意杀人犯杨小民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在此期间，在中央工作组驻地及老同志张国声、黄静波家中，我有幸多次见到了乔明甫，他引用陈云的话说，“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

“中央赴青海处理杨案有关责任者工作组”在《关于杨小民错判案有关责任者的错误事实、性质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以下简称“处理意见的报告”）中说：“到10月上旬止，经3个月的工作，案情基本查清。

事实证明:中央对杨案所确定的方针、措施都是正确的。7月30日,已依照法律程序,重新判处了故意杀人犯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这一坚决果断的公开改判,维护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尊严,挽回了给党在群众中一度造成的不良影响,得到了青海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群众反映说:共产党还是共产党。”

“现已基本查清了有关责任者,包括省委原书记赵海峰,省法院原院长杨树芳,省法院刑庭原副庭长孙文合,案发时的省法院院长杨西林,省法院原副院长郑仲良等8个同志的一些主要错误事实和责任。”“省委原书记赵海峰(十二届中央委员,现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是此案久拖不纠的责任者。”

“处理意见的报告”最后建议:“给予赵海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给予杨树芳、孙文合二人开除党籍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并建议中央按其错误性质及危害,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又分别对杨西林、郑仲良、杨德山、韩德明、杨子蔚给予处分。此外,前任省委书记谭启龙、梁步庭同志对杨案错判和长期不纠,负有责任。建议中央责成他们做出检查并给予适当处理。

我手头仍保留着一份“电话记录”:时间是1985年8月8日20时,来电话人是薄一波(由秘书董宏代讲),接电话人是乔明甫,记录如下:“薄一波同志指示,明甫同志:看了张耀同志(中央工作组成员)8月5日工作报告和刘枫同志(青海省委副书记)8月4日电话记录,都反映了一些重要情况,群众反映强烈,对中央维护法律尊严,纠正错案,表示热烈拥护;对省委决定和尹克升讲话,表示一定程度的满意。但必须注意到群众更强烈的反映。枪毙杨小民,杨案并未了结。群众在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关心此事,看省委能否打破关系网(官官相护),对有关责任者能否做出公正处理。因此下一步工作重点:一、在于对那些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人,尽速调查清楚,依法处理。不管谁,徇私枉法,都要法办。省委不管前任后任,有错必纠,绳之以党纪,以正国法、以正党风、以平民怨。这个意见我上次电话已讲过了,能否贯彻下去,关键在于省委态度。二、要坚决查清杨案有关责任者。对触及法律的人,不管官大官小,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纠正错案,才能打开解决青海问题的突破口。省委在此案中的责任不能回避,待把问题彻底查清,对有关责任者做出严肃处理后,再大张旗鼓地宣传。现在群众对此有疑问,就因为问题尚未查清。中央工作组应同新省委密切合作,大力支持新省委,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务期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如人员不够,巡视员小组也参加。”(董宏说,以上是一波同志根据书记处谈话的精神,提出的意见。最近书记处开了两天会)

有人不服

1985年12月1日,中央接到“中央赴青海处理杨案有关责任者工作组”“处理意见的报告”后,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全国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同志的委托,由中顾委常务副主任、全国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从1985年12月6日开始到年底,连续举行办公会议,研究对杨案有关责任者的处理问题。到会的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和“中央赴青海处理杨案有关责任者工作组”组长乔明甫、副组长李子川及15名工作组成员。青海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尹克升、副书记宦角才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正人等8人。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前后共召开了5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出席了每次会议。通知到会的记者仅有《光明日报》一家。会场气氛始终严肃认真,薄一波同志多次讲话,每次讲话,他都联系党的优良传统,启发青海省委负责人正确认识错误,总结教训。但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等不同意中央工作组关于对杨案有关责任者的处理意见,认为处理过重,他态度蛮横,甚至指责中央工作组。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乔明甫义正词严,批评尹克升等人的错误言论和蛮横态度。工作组成员张耀眼见尹克升等的恶劣而顽固的态度,气得直拍桌子,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辞世。中央为纯洁青海省的党风,前后共献出了两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宝贵生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张耀的去世刊发了报道。

中央对于处理杨案错判有关责任者的会议直开到1986年元旦前夕，暂告一段落。而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等返回青海时，趾高气扬，以胜利者自居，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尹克升甚至私下里散布说“薄一波老糊涂了”，对中央工作组也到处散布诋毁的言论。

有人反攻倒算

由于新任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等的顽固抵制，致使中央工作组关于对杨小民错判案有关责任者的处理意见，无法落实。反复拖延后才对主要责任者青海省委原书记赵海峰等人给了很轻的处分。

更有甚者，以尹克升为首的青海省委少数人，对我反攻倒算，打击迫害，令人发指。早在杨小民案发生之初，青海省委就设置种种障碍，阻止记者采访，省内媒体噤若寒蝉。对我们《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并连续发“内参”，他们更是恨之入骨，将记者站设在省委的办公室强行撬开，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对记者更是进行人身攻击，以至于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

到了1987年5月，青海省召开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在5月6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震动了青海、惊动了中央的杨小民杀人案，中央曾两次派工作组来青海调查处理，中办〔1985〕228号文件指出杨案的性质是“徇私枉法、官官相护”，杀人犯杨小民虽于1985年7月30日被处决，但包庇杨案的有关责任者，到底有没有处理？如何处理的？我请求向记者及人大代表正式公布。大会发言人不予回答，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加以搪塞。

我对青海省委的严重问题，坚持斗争，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那些年，找我上访的人络绎不绝，在我办公室、家里，甚至在大街上，常有人向我反映问题，或申诉冤案。我当然不是“包青天”，不能一一处理，但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连续公开报道，或内部反映。例如，由新任省委书记尹克升在担任青海石油局党委书记期间，一手制造的王生福大冤案就是一例。王生福原是青海石油局西部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是尹克升的部下，由于敢于直言，得罪了尹克升，被污陷“有受贿行为，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建议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被判刑2年。王不服，坚持上诉，经重审宣判无罪。但时任省委书记的尹克升支持青海石油局迟迟不予落实，逼得他家破人亡（父亲、妻子受牵连含恨而死），过着乞讨流浪的生活。

王生福多次找我反映，下跪哭诉。我向《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做了汇报，他全力支持，乘火车专程从北京到西宁，与我到王生福冤案发生地——柴达木最西端的冷湖，实地调查采访，写出了6万字的长文《法与权、正与邪的一场大搏斗——评述某省残酷迫害无辜干部王生福的大冤案》（载于1988年第9期上海《法律咨询》杂志），揭露当地官员制造冤案，以权代法的严重问题。

不料，此文却又冒犯了青海省委主要领导的“威权”。他们以中共青海省委青发〔1988〕16号文件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要求中央处理马沛文、陈宗立两名记者。该文件称这篇文章“利用已经做了处理的王生福案，采取虚构、捏造和歪曲事实的手法，编造谎言，制造动乱，攻击省委，丑化党的领导”；并派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等4名干部，拿着这份文件，亲赴中央告状。与此同时，省委又组织多人写批判文章，整理“陈宗立的单行材料”，并召开中央驻青海和省内新闻媒体负责人40多人的批判会，对我进行围攻、批斗。不久《光明日报》青海记者站就被强行撤销，我被开除党籍，取消记者资格，等待进一步处理。

万般无奈之下，我于1988年10月逃往北京，找到了乔明甫。他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他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得到了他的鼓励和支持，他说“坚持真理不容易，与腐败做斗争更不容易”，希望我挺住，同时他让我写一份书面申诉材料，由他转交薄一波。

由于乔明甫的支持，加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徐光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广电部部长、河南省委书记）、副总编辑王晨（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主持正义，在我被取消记者资格、开除党籍两年多以后，1992年又调我到《光明日报》甘肃记者站工作。■

（作者为《光明日报》驻青海、甘肃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彭德怀与国防科技建设

○ 滕叙兖

1952年7月，3个月前才从朝鲜战场回国治病的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受命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繁重的工作中，他须臾不敢忘怀的是加快部队现代化建设。

全力支持陈赓创建哈军工

实现部队现代化的突破口在哪里？1952年6月的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回答了这一问题：创办军事科技院校，加速为部队培养军事工程师。中共中央决定在哈尔滨创办一所综合型多军兵种的国防科技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军工，俗称哈军工），为此把代理彭德怀司令员职务的陈赓从朝鲜前线调回来。6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中南海与陈赓面谈，授命他担当哈军工的院长兼政治委员，负责把这所大学办起来。在朝鲜战火未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教人才奇缺，国防经费紧张，陈赓白手起家筹办哈军工，困难可想而知。解决各种办学难题，他一是找周恩来，二是找彭德怀。

彭德怀1952年下半年从全军选拔第一期调干学员和助教，军委一声令下，全军上下雷厉风行，1300余人在几个月内全部抵达哈军工报到。彭德怀特别重视学员的综合素质，要求哈军工严格把好招生关。当时哈军工把彭德怀的大侄子彭起超招来了，彭德怀为此批评陈赓，“你们把他招来，就破坏了学院的招生制度”，“为了他一个人，降低了整个招生标准”。彭德怀认为侄子不够高中学历，他要陈赓马上退人。陈赓等他消气后，才说明此事原由。彭德怀最后交代说：“让彭起超试读一下，成绩不行就送回原部队。”（任学文：《哈军工》，红旗出版社1993年）

1953年5月，在中央军委的一次例会上，根据陈赓的要求，专门讨论了军工第二期招生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一所新办的大学，步子不宜迈得过大。另外，军工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亦应有个长远规划，这样才好把招生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5月15日，彭德怀亲笔起草报告，呈军委主席毛泽东。报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去年秋招生一期学员982名，该院要求今年再抽调1200名……要办好这样大的工程学院，确实困难很多，在我国历史上尚系创举。学校需要的各种器械装备极多，能够担任教授的人才有限，以及目前我国财力情况，等等，都无充分保证。故在军委例会上经过研究，需将该院提出的每年收生数字适当减少。会后又经张宗逊同志约集有关部门具体讨论，估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全军最低需要3200名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拟定该校每年毕业800名学员。

毛泽东当天看到了这份报告，迅即做了“同意”的批示。（《关于军事工程学院今后每年毕业学员人数计划》，哈军工史料，1953年）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终于停战，28日上午彭德怀代表中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8月初，彭德怀离开朝鲜回国，在沈阳稍事休息后于8月6日，带一名警卫参谋，乘普通客车来到哈尔滨，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哈军工。中午食堂已经没有什么吃的，陈赓从隔壁政治部副主任张衍家要了点小干鱼，陪彭总吃了个便饭。

下午，彭德怀听院党委汇报工作。4点钟，他提出要去看看教授们，于是几辆吉普车直奔市内斜纹二道街。陈赓把刚下班的老教授们都喊出来，大家在楼下饭厅里欢迎彭老总。彭总逐一与老教授握手，最后他大声地向大家说：“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功劳大家都有一份。为了国防现代化建设，毛主席和党中央下决心办这所大学，办学校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专家，有知识。你们为了国防建设，从全国各地来到哈尔滨，克服许多困难，我很感谢你们！”

第二天上午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彭总看完基建工地，就去与苏联顾问们见面。之后巡视刚刚建立的10个基础课教授会，了解教员的工作情况，特别对培养助教问题做了指示。

在参观文庙图书馆的时候，陈赓说："彭总啊，我们办学，外文科技图书资料可是万万少不得的，我想通过外交部，从国外购买一批，军委要支持啊。"

彭德怀点点头说："可以嘛，你决定就是啦。"

下午，在王字楼小礼堂，彭德怀同团以上干部见了面，陈赓说："很多同志没有见过彭总，都想看看彭总。"彭德怀不准为他拍照，说："我这个人长得难看，有什么好照的？"陈赓说："大家想听听最近的消息。"彭德怀说："我要讲的主要是现代化建设。"

在干部们热烈的掌声中，彭总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以这样劣势的装备，同最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是很困难的，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办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光喊'万岁'是不行的。毛主席派陈赓同志来哈尔滨创办军工学院，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们现在能在军工学院工作，应感到光荣。老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积累办学校的经验，才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当天傍晚，彭德怀离开哈尔滨。他是第一位走进哈军工的中央首长，成为哈军工开学前夕的一大喜讯。（任学文：《永远的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

把钱三强请到家里

进入原子能时代后，彭德怀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立于大国之林。1954年秋，苏联要举行一次原子弹爆炸后的实兵对抗大型军事演习，苏方邀请中国派军事参观团观摩演习。为了这次出访，8月20日彭总特别把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请到中南海永福堂的家里并谦逊地说："今天拜师求学，老师请进。"

钱三强就从原子弹、氢弹的原理和构造讲起，彭德怀认真做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彭德怀最后问："中国要搞原子弹，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钱三强说："生产原子弹的原料，反应堆比气体扩散方法省力。我曾在1953年向国家计委提议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用以开展核科学实验研究，培养人才，为今后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做技术上的准备。望彭总再给催促一下。"

彭德怀说，我支持你的意见，要向中央反映，争取早建。（《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

9月10日，以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参观团赴苏参观原子弹军演，在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向彭德怀赠送一把仿制飞行员投掷原子弹的金钥匙。大家争相传看的时候，陈赓大将瞥一眼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

彭笑道："你是军工院长，你可以组织研制嘛，咱们还是自己干吧！"（《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回到北京后，9月28日，彭总对主管计委的李富春说，趁苏联党政代表团来北京会谈，一定要把请苏联帮助建造试验性原子反应堆的问题提出来，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反应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

1955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上年度军事工作时，提出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武器。

1955年5月，彭德怀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可以看看他们的核潜艇。但苏联海军两次借口推托，这对彭德怀是个不小的刺激，更坚定了他独立自主发展本国核武器生产的信念。

彭总一直关心核反应堆的建设，1957年6月15日，天还没亮，彭德怀就到反应堆建设工地视察。技术人员把他领到一个水泥浇铸的筒形建筑前，说："这就是原子反应堆的心脏部分。"彭总说："技术上的事，我是外行。我只说两件事：一是对废料、废液一定要严格处置，绝不要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一定要加强防护，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这次参观，彭总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这是个好的开端。有了它，以后

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火箭、导弹和核潜艇，再也不用去看人家的了！”

抱病约见钱学森

1955年10月8日，旅美科学家钱学森回到祖国。陈赓一直关注钱学森回国后的动向，他向彭德怀建议：“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和教授，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再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彭总十分赞成，说：“这个意见很好，如中央同意即可安排。”

11月25日，陈赓凌晨从北京飞回哈尔滨，全程陪同钱学森参观哈军工，钱学森对中国自行研制火箭充满信心，这给陈赓和哈军工的教授们很大的鼓舞。

陈赓回到北京，立即向彭德怀汇报，彭总很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尽快会见钱学森。不久，陈赓陪同钱学森到北京医院去见正在住院治病的彭总。

一见面，彭德怀就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落座后，他开门见山地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请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去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他试探地问钱：“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打300公里到500公里，这都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你估计需要多长时间能造出来？”

钱学森略做思考，问道：“这种短程导弹以什么为目标呢？”

彭德怀说：“我们时时受到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的武力威胁，所以当前急需的是解决防空导弹和对付海上目标的导弹。”

钱学森告诉彭总，以现在的技术基础，如果研制300公里到500公里射程的近程导弹，在机构和发动机方面，两年内可望解决。关键是把导弹打出去后能把它控制住的那套东西，也就是自动控制技术，恐怕短时间难以突破。彭赞同说：“是的，是的，如果导弹打出去像无头苍蝇乱飞一气，还怎么消灭敌人！”

钱学森又把自动控制原理深入浅出地做了讲解，彭德怀听得入神，又问：“那么，这个自动控制几年可以搞出来？”

钱学森回答：“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立一些地面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时间嘛，美国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彭总马上向陈赓交代：“我们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意儿。你安排钱先生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讲讲课，让大家都开阔眼界，长长见识。”（《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11月）

是年12月底，钱学森先在中南海向政府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做了一场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报告。1956年元旦后，他又在总政排练场为军队将帅们做了3场关于火箭导弹技术的演讲。1956年的春节，钱学森伏案疾书，完成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2月27日，《意见书》呈送到周恩来的案头。第二天，周恩来批示：“印发军委各委员和黄克诚。”彭德怀看后说：“这件事情，军队不仅可以出人，而且可以出钱。”

重视任新民等3人的报告

1955年，时任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教授同金家骏、周曼殊两教员一起，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我国发展导弹与火箭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的途径等，做了较详细的论证。在陈赓院长的授意下，他们完成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上报稿，于11月由学院党委报陈赓并转中央军委。彭德怀和黄克诚很重视这份报告，给予很高的评价。彭立即委派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中将邀请钱学森一起详细分析研究任新民3人的建议，并进行了有关的调查研究，万毅整理出《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交军委讨论。

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讨论万毅的报告。彭总在会上说：“同意向中央提出报告。我们要解决火箭防

1958年9月2日彭德怀视察哈军工,在实习工厂与学员谈话

的军委会议上,他响应周恩来"军队要起模范作用"的讲话说:"搞导弹是要花很多钱,但花钱再多也一定要搞,军队在这方面有所准备,可以拿出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在聂荣臻的主持下,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0月8日正式成立。事先航委秘书长安东少将请彭总出席五院成立大会,彭当时正和来京的八大军区领导约谈,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说:"有聂总去讲话就行了。请你转告五院的同志们,中央的方针很明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搞科研和打仗不同,打仗靠勇敢,战前动员:消灭某某敌军,消灭多少人,打下某某地,干部带头冲锋,常是打胜仗。但这一套不适于科研,科研有它的规律,要一点一滴,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能突破。军工产品关系人命和战斗成败,不能急躁粗糙,要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坚持科学态度,踏踏实实,安心埋头。可以告诉他们:五年搞不出名堂不批评,十年搞不出来也不摘牌子。"

空、海上发射火箭等问题,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

这是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首次专题讨论关于研制火箭和导弹武器的问题。(谭邦治:《任新民院士传记》,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

为成立国防部五院铺路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回忆父亲的《山高水长》一书里写道:钱学森上书《意见书》后,中国的导弹研究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了向军委扩大会议做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父亲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彭德怀全力支持病体初愈的聂荣臻出山主持国防科研工作。4月13日,党中央任命聂荣臻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在当天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再次强调:"首先火箭必须搞,一是防空火箭,第二步再搞导弹(有原子弹头的)。"在5月26日

彭德怀这一段精辟的谈话,体现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对艰巨的国防科研规律的清醒认识。但在庐山会议后竟然成为他的"罪状"。(《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1958年5月24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军队要继续整编裁减,军费要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5%至14.2%,原子弹导弹需拿出六七十亿元,但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搞。

6月,国家立项研制核潜艇,7月22日,彭德怀说,苏联与我们合作中在军事技术上总留一手,他研究新的,给我们旧的,我们非自己办不可,不能只靠老大哥。

大跃进中再次视察哈军工

1958年8月31日晨,参加完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彭总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结伴,乘火车到了哈尔滨。

时隔5年,彭总又来到哈尔滨视察,他的主要目标不是看大炼钢铁,而是肩负重大国防科研使命

的哈军工，所以他第二天就搬进哈军工的招待所。

9月2日上午，彭德怀先去看学校的实习工厂，听说装甲兵系师生试制成功松花江8型拖拉机，他高兴地说："你们能试制拖拉机，以后就可以试制坦克车了嘛！"

他又步行走到空军系大楼，听取系主任唐铎少将和教员们汇报全系正在设计的新型歼击机的情况。他仔细听完飞机的结构、战术性能、火力配置等情况后，与教员们讨论起技术问题来。彭总说："你们一定要把这种飞机设计出来，加强我们空军的力量。"

听唐铎说二期学员正在5楼上搞设计，彭德怀非要上楼看看，他一口气上到5楼设计室，走到设计台看学员画图，又拿起一份学员的设计方案看，并把重点项目记在小本子上，他关注研究项目的军民两用问题，又叮嘱大家注意身体，苦战不要把身体搞坏了。

从风洞实验室出来，彭总边走边对唐铎说："新式歼击机的设计要抓紧，动员全院的力量，培养出一支设计队伍。院党委有责任使各个系相互了解，系党委要使各专业之间互相了解，保密只是对付敌人的。"他突然停下来，"还有一条，"他小声说，"歼击机的设计，要对苏联人严格保密。"

下午3点半，彭总来到炮兵系大楼，重点看最近半年来搞出的一些新设计，尤其对增程弹、远程火箭炮感兴趣。他站在黑板前，指着火箭炮的设计图纸，详细询问设计原理和技术难度，并与教员一起讨论。坐在下面的学员都暗暗佩服，彭老总真是行家，他知道那么多技术术语。

9月3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央电话，毛泽东要他速到北戴河开会。他对学院领导说，你们学院我还没有看完，开完会我再回来继续看。

9月7日上午9时，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彭总又来到哈军工，继续视察。8日全天，他都在海军系参观，看新设计和新创造，在水池实验室一站就是两个钟头，仔细看教员和实验员操作。在讲师柳克俊的计算机研制组，他像发现宝贝似的摸着自己人设计的第一台军用计算机，爱不释手。

10日晨7时，院系领导陪同彭总乘汽艇来到呼兰河的一个荒岛，那是海军系顾懋祥教授的科研小分队驻地。他要亲眼看看水翼艇的试验。他乘上一只水翼艇，在试验河面航行了两圈，回到帐篷，对顾懋祥说："不错，水翼艇很快，可以在海上打游击，以小打大，很适合我国的战略方针。你们这种不怕吃苦、忘我工作的精神很好！希望大家在紧张的劳动中还应该注意适当地休息，要劳逸结合啊。"又说，"你们的科研项目很重要，搞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从失败到成功是客观规律，只有不怕失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返程途中，彭德怀在松花江桥附近停了一个小时，观看一种能浮在水面上的气垫船，第一次机器没有调好，试验教员急得满头流汗。彭总安慰道："别着急，慢慢来！"机器很快调整好，只听"轰"的一声，这艘两吨重的自航船模在松花江上开动了，加速后船身从水面浮起，最后越滩登陆成功。彭看得出神，称赞道："这对今后解放台湾，克服登陆作战的困难，意义重大啊！"

11日上午7时半，彭德怀到化学、机械、物理等教授会参观，重点看了从烟灰中提炼半导体原料锗的过程。10点开始，彭和40位新老教师座谈，他特别请与会的17位老教授发言，说最想听老教授的意见。下午，军号响过，各单位人员迅速在军人俱乐部正门集合，等待元帅的接见。3点钟，在谢有法政委和刘居英副院长的陪同下，彭老总身穿军装，微笑着健步走上俱乐部的舞台，坐在一张旧办公桌后边，给全院人员做了两个小时报告。

13日是彭德怀在哈尔滨视察的最后一天，他去三大动力区参观电机厂、锅炉厂和汽轮机厂。下午3点整，从哈尔滨飞往齐齐哈尔，走进莽莽大草原，视察常规武器试验基地。

9月21日，彭德怀返回北京。10月7日，他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视察军事工程学院等单位工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彭德怀高度评价了哈军工，表达了对加速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真知灼见。(《国防科技大学史料汇编》，1996年)

不幸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蒙难，从此远离政治中枢。但是作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对"两弹一星"始终牵挂于心。1964年10月，他从广播里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1970年4月，又听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身为囚徒的老元帅两度流下热泪。■

(作者为传记作家，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中

○ 余焕椿

《人民日报》回归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恢复了党中央机关报地位，华国锋找胡绩伟谈话，让他回《人民日报》，收复失地。这时的胡绩伟，已决心放弃他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新闻工作，安安稳稳地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做研究工作。面对党的最高领袖，他不能直接拒绝，只能找借口，说自己没有能力，谢绝回《人民日报》。华国锋说：“难道你不如那个草包？”“草包”指的是“四人帮”时期领导《人民日报》的鲁瑛。他被华国锋这句话激回了《人民日报》。

经历十年文革，胡绩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变得更实际，更主张独立思考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再是那个非常听话的胡绩伟了。”他提出：《人民日报》性质不能变，但面孔可以变，应该变得更加亲近人民。并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既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党性、人民性是一致的，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人民高于一切。

这个人民性观点，一直遭到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反对，甚至上纲到“自由化”，但却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3月，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胡绩伟头一次比较清晰地讲出了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采取支持态度，他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没有党性。从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这给胡绩伟很大鼓舞，使他能够放开手脚在《人民日报》大胆尝试改革，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报道。

1977年10月开始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3月26日开始真理标准讨论；1980年10月中旬反对特殊化，以及与此同时开展舆论监督，等等，无不显示出胡耀邦的见解和胆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四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在此期间，经他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有文字记录的就有100多篇。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回归人民，声誉很高，深受读者信任和欢迎。报纸发行量达640万份，为历史最高水平。财政上很快做到完全自给，并开始向国家每年上缴一二百万元的利润，以后达到1000多万，最高时达2000万。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也承认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办得最好的时期”。

“中兴伟业，人心为上”

历史已进入新春时期，但“两个凡是”阴霾仍笼罩一切。这个时候需要一位有胆识，敢于担当的人来打开局面，这个人是谁呢？答曰：胡耀邦。20世纪70到80年代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组部部长、中宣部部长直至党的总书记。当中宣部部长之前，他和胡绩伟并非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只是志同道合的挚友。

胡绩伟为何自愿接受胡耀邦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部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安排？有两个因素：一是文革末期，他们都处于被监管状态，只是到协和医院看病才暂时摆脱监管，两人就利用这短暂机会，在候诊的长椅上交流思想，讨论时政和前途。二人开诚布公，思想完全一致，终于有了后来行动上的默契。二是在胡绩伟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领导者，他对理论工作和文字宣传的重视无人能及。

胡绩伟得知“四人帮”粉碎的消息，立即去看望胡耀邦，耀邦兴奋地说，他已经得知消息，叶帅

派人来看他，他给叶帅带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并向胡绩伟细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胡绩伟对"人心"两字大为赞赏，并认为恢复《人民日报》在读者中的信誉，也要重视人心，从恢复人们的精神家园开始。真是心有灵犀。不久，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他们才建立起正式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1988年8月在烟台。左起：胡绩伟、胡耀邦、秦川

拨乱反正　两大战役

在"两个凡是"还很猖獗的时候，胡耀邦不指望什么"指示"和文件，他相信只有实践才能驳倒"两个凡是"，把局面打开。他到党校不久，在布置准备党史讲授提纲时，明确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一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并且批评了一切从文件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的工作方法。他同时组织力量写文章，筹办《理论动态》，为理论上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做准备。

《人民日报》非常重视《理论动态》，因为它是拨乱反正的一面旗帜，又是胡耀邦亲自编辑、出题和定稿的，《人民日报》理所当然要同它保持密切关系，协同作战。多篇重要文章都是《理论动态》先登，《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像《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重要文章，按惯例应该用《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但胡耀邦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避免文章送审时遭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扣压，于是创造了一个"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以示与党报编辑部文章有区别。让《光明日报》先登，《人民日报》转载，上面查下来，就可以减轻《人民日报》的责任。可见胡耀邦当时处境之艰难，用心之良苦，替《人民日报》想得多么周到！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党校三位年轻人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是胡耀邦精心组织的一系列有关干部问题文章的第一篇。文章针对当时组织部门一些做干部工作的人，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认识不足，甚至有抵触情绪的情况写的。胡耀邦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改变我们同"两个凡是"的力量对比。他倾心打造，反复改了十几次，并同胡绩伟商定登一个整版。胡绩伟把版面清样送给他，催过多次，他却引而不发。等到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才决定发表。胡绩伟才明白，原来他是在等待时机，以求文章产生最佳效果。

文章一发表，两种反应都十分强烈。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许多人写信给编辑部，表示支持和拥护，一个月内，就收到1万多封信函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信件可装两麻袋。一个读者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也有人不高兴。汪东兴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曾经发问：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理由还是"两个凡是"。当时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听了广播这篇文章的摘要后恶狠狠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就扔进了纸篓，还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一大批老同志纷纷揭发郭玉峰的问题，《人民日报》编成《情况汇编》，送给了叶剑英和宣传口的耿飙。不久，郭玉峰便离开了中组部，接任人正是胡耀邦。

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部长后，把组织工作和宣

传工作紧紧结合起来，迎来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全新局面。继《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之后，《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多次讲话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多篇评论，极大地推进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1978年9月，中央办公厅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时任中办副主任的张耀祠坚持要将它从文件中删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删除文字，却删除不了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真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实事求是地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

随后，真正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人民日报》在陶铸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平反前，编写了他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刘少奇平反前，内参刊登了王光美在狱中写的材料，吹了一股刘少奇的千古奇冤就要平反昭雪的清新之风。

1978年9月，为数十万右派分子摘帽。中央组织部等5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55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胡耀邦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新闻《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人民日报》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12月中旬，彭德怀、陶铸和薄一波“61人案”同时平反。中央、北京和全国各地，先后为彭真、刘仁、贺龙、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陆定一、习仲勋、谭震林、罗瑞卿、萧克、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谭政、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平反。

12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2000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陶铸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

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宣传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宣布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文革前17年，中宣部是党的比较得力的思想工作部门，“阎王殿”的说法应予纠正，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一律平反，档案材料中这类错误记载全部清理销毁。紧接着“旧文化部”“总政阎王殿”等一些部门也相继平了反。

制止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胡耀邦从1977年3月任党校常务副校长起，到1987年1月被逼辞职下台，不到10年时间里，在艰难环境下，率先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保护知识分子，把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可谓历尽艰辛！《人民日报》的同志大都记得，耀邦在听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汇报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的种种阻力时，他那样慷慨悲歌：“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不为之动容？没有料到的是，竟然有人真的要将他往“油锅”里推。

那是1981年因《苦恋》问题引起的危机。这年初，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白桦的《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在内部审查放映后，受到严厉的批评。

1981年4月20日，一家大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将《苦恋》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知识界和各方面人士的疑惧。《人民日报》不赞成这种做法。胡乔木一再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批评文章，编委多数不同意，主张自己写说理强的文章，但文章迟迟没有写出来，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对白桦的《苦恋》以及白桦本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然后在全国开展批判。胡耀邦不同意，说我们决不轻易把一个作品说成毒草，也决不给一个作家戴什么帽子。不能动不动就采取过去的那套做法。5月17日，胡耀邦与文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更应特别注意；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文章不要全国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是不健康的，有

胡绩伟在2004年《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 徐庆全摄

害的；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用几句话把这件事冷却下来，不要再批判了，过一段时间再说。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对批《苦恋》中“左”的做法从正面做了批评。此文是周扬根据胡耀邦讲话精神撰写的。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世界各大通讯社发出消息，说“中共迅速平息了一场新的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

邓小平也同意胡耀邦“冷一下”的意见，说“我赞成”，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叶文福在北师大讲了一篇话，二是乌鲁木齐市文联筹备组召集人丁一石的“大鸣大放”。这两件事，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认为“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1957年一般右派言论的水平”，“这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自由化”。

7月17日，中共六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找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思想战线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提出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邓小平着重谈了《苦恋》，他说，“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接着，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讨论邓小平7月17日的讲话，解决“涣散软弱的状态”，强调“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但不要搞运动”，事实上还是搞成了运动，给某部作品，某个部门，某一个人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7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宣传部门负责人会上批评《人民日报》。当天下午，胡绩伟召开编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讲话，准备对“涣散软弱”问题做检查。8月中下旬，编委扩大会先后开了9次，学习、讨论贯彻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精神，承认在《苦恋》上有缺点有错误，有片面性，甚至有无组织无纪律问题，但没有人承认“搞自由化”。这样，《人民日报》感到戴在头上的“自由化”的罪名被加重了。

唐因、唐达成合写的《〈苦恋〉的错误倾向》和白桦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后，《苦恋》问题表面上算画上了句号。可由此引起的“涣散软弱的状态”问题，却深深困扰着思想文化界，困扰着《人民日报》和胡耀邦本人。1984年《人民日报》改组，胡耀邦下台，不能不说与这次危机有关。

几天后，编辑部传来邓小平的话。秦川获悉，中央最高层开了一次会，会上有人对胡耀邦的工作和在一些地方的讲话提出了批评。秦问：“小平同志讲了什么?”答曰：小平同志没有讲话，只说了“胡赵格局不能变”“到此为止”。这样就打掉了有人趁反对城市改革之机倒胡，企图破掉“胡赵格局”的算盘。《人民日报》也暂时渡过了难关。

距离这个谈话不到一个月，胡乔木、邓力群又抓住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批人道主义和异化，目的是通过批周扬、批王若水、批秦川，达到制服《人民日报》的目的。他们以此为契机，搞了一场“清污”运动，除了人道主义和异化外，把胡绩伟的党性和人民性也包括了进去，后来又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到军队，影响到宗教。

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8月，秦川列席中央高层一次会议，中央领导人对“清污”的忧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会上，万里说，“农村不搞‘清污’”；方毅说，“科技战线不搞‘清污’”。胡乔木没有发言。邓力群对农村雇工问题的看法，遭到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的反对。但是，邓力群并未向宣传系统透露这次会上对“清污”显示出的总的基本精神。

“清污”仍在发展，有的地方甚至“清”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服装、发型、跳舞等等。这种势头，使各方面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不安，他们自然而然地想起反右和文革。

11月14日，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清污”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第二天，胡启立向《人民日报》通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胡启立说：“有两点已经电告各省市，同时告《人民日报》知道：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要严格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污染’主要指文艺、理论战线的问题，不能什么都说成‘精神污染’。最近有些报刊把经济工作中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批评了，这么搞下去，就干扰了经济的搞活，也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不要3个月就搞乱了。”

邓力群不得不出来纠正他们自己造成的混乱和过火。闹腾了28天的“清污”运动，至此画上了句号。这中间，胡耀邦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平稳地处理了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经过这次危机，《人民日报》已被戴上“自由化”帽子，领导班子随时都面临被改组的可能。令报社高层忧虑的并不是他们自身命运如何，而是这种危机显示着高层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不一致。表面上是批评指责《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冲着胡耀邦来的。

1983年2月，胡乔木在胡绩伟、秦川、王若水面前批评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也是以批评《人民日报》为由批胡耀邦。这次的批评已不再含蓄隐蔽，而是公开化了。

1983年2月16日上午，胡乔木以《人民日报》一份改进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做谈话的开头和结尾，对胡绩伟、秦川、王若水谈话，实质内容是指责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批评他为推动城市改革，把农村承包制推向城市，推广到一切部门，而且给胡耀邦扣了一顶大帽子，说他违背了十二大精神，“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责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

后来，胡乔木说：“胡耀邦同志对胡绩伟、王若水是包庇、支持的。胡绩伟同志提出辞职，书记处讨论一致同意，同时对胡绩伟同志领导《人民日报》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和邓力群同志到《人民日报》把书记处提出的批评宣布了，对胡绩伟、王若水的错误讲了一篇话。胡耀邦同志非常反对，认为不应该去讲，辞职就很好了嘛！这是一种回避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

这种指责，使《人民日报》的同志感到震惊：一个政治局委员在自己下属面前，能这样做吗?！■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上接第22页）一直忙于参加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21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正式开幕，会期10天，通过了《政协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最后，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实现了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沈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被委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沈老感慨地说：“我一生从事宪法运动，不知费了多少心血，今天才见到真正的人民宪法。”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宪法草案的公布而欢呼》。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宪法光荣地公布于世了。

那时我想，从新中国开始就不会再有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宪政运动了。■

（作者原为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创业》风波

○ 华 克

1975年春节至9月间，一部表现石油会战的电影故事片《创业》从公映到被禁演，成为当年邓小平全面整顿中发生的一个突出事件。我作为当时该片主创成员与《创业》蒙难的亲历者，对40年前遭到江青训斥引发的沉重感迄今难以消散。

震惊国人的禁演

《创业》影片还未开拍，当时的文化组(即后来的文化部)负责人于会咏、刘庆棠在审看剧本之后，便传出告诫："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一定要拍好，拍出水平，不可掉以轻心！"

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派出我这个年轻的副导演奔赴大庆，深入生活，组织剧本创作。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钻井队板房整理素材，忽然值班员跑来，说长影厂领导有要事找我通话。在电话里听到老厂长苏云告诉我，最近江青对大庆题材的电影创作有了指示，厂里决定让我赶快回去。得此消息，我喜出望外。虽说我们创作组对会战功臣已访谈了上百名，各类资料已累积300多万字，可是，像大庆会战的大题材，如果没有权威的创意指导来引领创作，只怕难于进行概括与塑造典型。如今既然江青发话，大概有门儿了！

回到长影会议室一看，顿时一愣：到场的不仅有曾被打成"黑笔杆"的编剧张天民，挨过批斗的导演于彦夫，还有摄影师、美术师以及服、化、道人员多名，一个强有力的摄制组俨然已组成。主持开会的，是先前的长影军代表、而后的厂革委会主任。他一开场便传达江青指示，原话是："大庆红旗是毛主席树的，王铁人是站得住的。《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很好(指其载报告文学《王铁人的故事》)，可以这个材料作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最后还有一句："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所谓"这是江青同志抓的重点片"，其源概出于此。

《创业》第四次修改的声画合成样片文化部已审过，1975年1月31日报送钓鱼台。王洪文看后批示："总的感觉这部片子拍得是好的，拟同意上演。请春桥、江青、文元同志看。"张、姚看后都点了头，画了圈。后台老板江青据说近日感冒，不看了，请会咏定。不过，圈还是画了。这就等于说：影片通过，她已认可。

很快长影接到通知，为庆祝四届人大胜利召开与欢度春节，文化部决定《创业》作为重点影片在春节期间上映，并向国外发行。于是全厂职工日夜加班，赶印拷贝，抢时间向全国发送。

2月4日，中国电影公司向全国各地发出"彩色故事片《创业》宣传要点"，根据高端审查意见列了5条，评价甚高。

2月9日，新华社发出电讯稿称赞影片。

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消息，报道优秀影片《创业》即将在全国上映。同日该报第四版刊出5幅剧照和大幅广告。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电影《创业》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正式上映。观众看后反应之强烈，盛况空前，给长影创作者带来了欢笑，给石油创业者们送来了温暖。

然而，《创业》在全国上映后的第三天，长影突然接到中国电影公司不带任何解释的通知："影片《创业》停印拷贝，停止宣传，停止向国外发行。"三停！与此同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各地电影发行公司也接到通知：《创业》停止评介，剧照追回，给所有单位和所

有人来了个“冷不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影以苏云为代表的领导们急得团团转，全厂上下如坠五里雾中。为尽快得到消息，只好四处打听。好不容易从北京一个渠道探来了实情：是江青在春节看了《创业》，她看后很生气，喽啰们见势不妙，赶快下令停映！

荒唐透顶的罪名

江青对《创业》发难，简直荒唐得离谱。据张天民讲，江青初见《创业》送审报件时，还没有工夫和心情看影片。此时的她，正在为四届人大组阁失败而恼怒，为毛主席批评她搞“四人帮”而沮丧。在心烦意乱之下，既然看到帮内要员已审查画圈，并且还有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赞扬，想必此片还不错，因而也就难得来一个高抬贵手，放《创业》过关。天民还告诉我，另一方面，江青对《人民日报》用大幅版面赞扬《创业》很窝火，她就是在这时调看影片发泄不满的。真实情况是，江青第一次看片还没看完，就气得拍案而起，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后来怒气难消再次看片，越看越生气，忍不住连连叫喊：“这不是艺术问题，是政治问题！”更扬言：“要组织人座谈，写文章，要批判！”

问题在哪里？批判什么呢？一开始，江青把她捕风捉影的所谓发现，让喽啰去猜谜，弄得文化部的人蒙头转向。于会咏如五雷轰顶，刘庆棠六神无主。其实，江青这时只是在卖关子，她发现的“问题”，无非是淤积在胸的怨气和怒气，找到了《创业》这个出气口。至于如何借此发难，因为没抓住什么把柄，她先拿大帽子吓人，制造一番紧张气氛。随后，从一位在军界“放火烧荒”的武秀才那里得到一份分析材料，炮制出来了关于电影《创业》的10条“意见”。

江青在四届人大组阁中夺权未遂，受到重创，她所记恨的余秋里、康世恩，不仅没有被她打倒，如今还被委以重任（余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康为石油化工部部长），并且有周恩来的呵护，还有死对头邓小平的撑腰，她恶气填胸，急不可耐地对《创业》挥刀乱砍，把讴歌周挺杉、华程形象，诬为给余秋里、康世恩树碑立传，进而称该片“是以写真人真事赞颂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在抛出10点意见之前，他们先采用逼供法，一而再、再而三迫使剧组揭问题，写检查。剧组明知他们是要“自供材料”，干脆来个软磨硬泡。近两个月，想钓的鱼一直没上钩。眼看再拖不行，于是在当年4月3日，一道金牌，把吉林省领导和长影人员调到了北京。在纪律森严的氛围中，刘庆棠宣读了以文化部核心组名义发出的“关于电影《创业》创作的10条意见”。至此，江青对《创业》做了正式宣判。

物极必反。《创业》蒙难，一下子把张秀才逼急了。平常看张天民文质彬彬，但事关影片《创业》的命运，他不甘心服软。不过，他此时一直猫在北京，两个月不见踪影。忽而7月中旬我在厂里碰见他正跟别人谈笑风生，颇感惊讶，于是我问他：“喂，张兄，你心情好些吗？”他顺手拉我到路边，悄声告诉我：“华克，你等着，再过几天，最多不出半个月，会有大好消息传来！”我忙问：“是有关《创业》的事吗？快透露透露！”他笑而不答，转身走了。果然只过了7天，一声惊雷在长影大院爆响！毛泽东7月25日对电影《创业》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

多日后，天民才向我透露上书内情——正是在邓小平关注文艺界动态、启动整顿的时刻，由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等跟他秘密联系，把告状信送到了中南海。

突如其来的召见

1975年9月14日午夜，我在睡梦中听见敲门声。来人匆匆把我接到苏厂长家里，与先到的几位剧组成员一起聆听老厂长刚从省委开会回来的传达，即：省委通知《创业》组主创人员15日跟随省委王淮湘书记飞往北京，具体任务到京后再告详情。于是我们一行9人怀着神秘兮兮的揣测，在翌日抵京后被送往京西宾馆，同从大港赶来的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会合，据说是等候中央首长接见。大家闷等了大半天，谁也没猜出接见者是邓小平，还是江青。直到晚上7点钟王淮湘把我们召到房间，告诉我们：“江青同志现在

山西参加农业学大寨会议。她要我们到大寨去，可能有重要指示。具体什么情况，没有对省委讲，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到大寨后，首长问到什么，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总之，要认识到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对文艺革命的促进。”

至此，悬念虽被解开，但又不明白：江青沉寂了好几个月，这时突然现身大寨，把我们叫来到底是为什么？夜深人静，苏云和张天民一直在揣摩：“她此时召见我们，难说给什么好果儿，肯定凶多吉少！”

江青与长影《创业》组合影，前排左2为张天民，右1为作者华克。后排从右至左：苏云、于彦夫、王淮湘、江青

9月16日午后5时许，长影人被领进了中国国际旅行社大寨分社。我们在院子里碰见了一群熟悉面孔：北影导演成荫，剧作家孙谦，著名演员张平等。老同行见面，大家握手言欢，但对是来开会，还是被接见，均不得要领。活跃的张平是老“东影”（东北电影制片厂），他向老友们透露：这次被召来的人，除了《创业》剧组，还有北影《山花》摄制组（拍大寨题材）；另有诗人张永枚，北大教授林庚，以及文化部录制昆曲的上海演员们，少说五六十人。他问于彦夫：“伙计，知道是怎么叫你们来的吗？”老于摇摇头。张平说：“前天江青正吃饭，忽然一激动，从昔阳学大寨会议上，调来了吉林省委二把手阮泊生。她先对《创业》作者骂了一通，捎带责备吉林省委不重视路线斗争。接着发令，要阮给吉林省委打电话，调《创业》组人员到大寨，特别是编剧张天民，一定让他来！”

这时不知谁喊一句：“来了，首长从虎头山拍照回来了！”拥在餐厅里的人都站起来，眼睛齐望门外。门开，江青由警卫、护士，还有于会咏、浩亮一帮簇拥着，旋风般走了进来。她披着上衣，半边镜框里的眼神透出不可一世的威严。不等文化部长介绍，她迫不及待地第一句话便问：“张天民来了没有？张天民呢？”

大家倏然一惊。张天民像是被谁推了一下，冒了出来。他不卑不亢地走近江青，轻声应道：“我是张天民。”江青锐利的目光直盯这位上书人的面孔，她边握手边说：“娃娃，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张天民刷地红了脸，很快又镇定下来。而江青说完把手一甩，径直走到一张餐桌前呼叫：“吃饭，吃饭！”又赶快招手：“王淮湘，成荫，孙谦，都过来！张天民，你也过来！”

被叫的人先后就座，长影人聚在邻桌。江青环视大厅，说道：“今天，请你们来，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撒尿，四听我说话！”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谁也没想到，这种不雅粗言，竟出自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口！接着，她向张天民发难，话劈面而出：“小张，你给主席谎报军情啊！”张天民软声答辩：“我没有谎报，信上写的都是事实。”江青没有听清，指着于会咏、浩亮，唠叨起来：“《创业》样片我还没看，他们就给我吹，片子如何如何好。我看了几次，看不下去，镜头跳跳蹦蹦。张天民，我告诉你，主席说片子没大错，但是没有说你这里没有小错，中错！懂吗？”转而切入要害，“那10条意见不是我的。我只对其中第八条负点责任，是讲艺术处理的。别的，都是那帮蠢材们搞的，和我没关系！”

江青对长影人说：“你们的片子太粗，对话多，构思不讲究。今晚我要给你们看一部影片《康贝尔王国》，学学人家怎么写石油……”她说着转向张天民，“娃娃，你概括能力差，我给你找个合作伙伴——孙谦，认识吗？”张天民立刻回应：“熟人，我的老师！”江青高兴了：“好啊！我看

江青与长影、北影剧组人员合影

道："小张呀，昨天我说要教训你，那是开玩笑。今天咱们平心静气地来同志式的谈话，好不好？"张天民有点出乎意料，马上说："我听首长指示。"江青话奔主题："当初，我让你们写大庆题材，是要你们照《中国文学》那篇文章搞（指《王铁人的故事》）。那个故事你看过吧？它主要是围绕王铁人来表现的。可你写的那个油娃呢（指周挺杉）？什么会战部署，前线指挥，写了一堆，你把主要人物的成长给丢了，石油史也没写清楚。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超越，不妨再来个新构思，咱们另拍一部新《创业》！"接着她口若悬河地讲起了她的设想和构思，似乎她的创意已成竹在胸。最后她说："行了，我不替你编了，剩下来是你们的事情了。"在她滔滔不绝的口述中，张天民只是默然静听，没做任何回应。

象征性劳动结束，到下午两点钟，一个特邀长影、北影人员参加的正式座谈会开场，爆出了江青与张天民之间骇人的正面交锋。

会场设在一幢不大的会议厅，我在后排做记录。主角江青一登场，先向《创业》《山花》编导们靠近，营造学术气氛。她张口向北影导演提问："成荫，你看了《康贝尔王国》感受如何？"这部英国影片歌颂了勇于开拓的英雄气概，成荫回答得干脆利索："我看不错。故事简洁，刻画人物主要靠动作。"江青点点头，"嗯，艺术上很有特点，你看它表现主角小康贝尔，一上场病病恹恹，还带有书卷气。争夺石油王国的矛盾一展开，他精神面貌完全变样了！——张天民，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醉翁之意不在酒，江青急速转移箭靶："噢，你感受很好，不讲了。张天民，现在我问你，在你给主席写信前，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张天民一震，回话："没有。我没听到什么消息。"江青眼一瞪，抬高嗓门："没听到？没听到什么就敢写信？你斗胆！"天民说："我是没听到，真没听到什么。"江青突然开诈："你说，你是不是捉刀代笔？"天民

你这部片子就算了，不管它。咱们再搞一个新作品，怎么样啊？"听到这句话，张天民和孙谦对视了一下，嗯嗯两声没接话茬。

唠叨的江青忽又发出责骂声："这个谢铁骊，钱江，没良心！用伊思曼胶片拍低密度曝光，他们开始不懂，是我手把手教他们。可是他们不听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回过头来，因为批评了他们的影片《海霞》，竟不打招呼上书告我们，气死我了！"她骂着吃，吃着训，说："从《共产党宣言》到《国际歌》，再到鲁迅，真正称得上马列经典的文艺著作并不多，而我们的8个样板戏，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

来到大寨第二天，早饭刚罢，便通知我们到礼堂听江青的录音讲话。这个讲话向大寨兜售今天应该像1957年反右派那样，引蛇出洞，放毒草出笼，然后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接着又把话题引到《评〈水浒〉》，声嘶力竭地叫喊："现在，有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不怕还乡团，不怕反攻倒算。现在让他们表演，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进行反击，全面反击！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我们感觉杀气腾腾，不知国家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听完录音，又传来指令，要所有人到田间参加劳动。所谓劳动，就是摘花椒。江青摆手把张天民叫到身旁。苏云厂长预感有重要对话，便暗嘱我凑到跟前，把谈话内容记下。于是，树下就剩下我们三个人，江青开始对张天民故作亲近

愕然，软顶道："捉刀代笔？没有。信就是我自己写的。"江青几乎是在审问："那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写的信？"天民答："7月18号。"江青冷冷一笑，面色冷峻得可怕："看看，你7月18号写的信，主席25号就批了，仅仅7天，背后没有人指点，没人传递，谁信哪？嗯？"

全场霎时阴云密布。所有人屏声息气，在紧张地关注。

江青似乎觉察在众目睽睽之下逼供，有失体面，于是口气变缓地对张天民说："这件事，我知道你不会说。我也不再追问。不过，迟早有一天，你会告诉我的！我再问你，你还给不给主席写信了？"天民答："不写了。"江青大声说："不，你还要写！你要向主席报告，《创业》虽没大错，还有小错，要求重拍一部新《创业》。你还要向主席建议，原影片不要向国外发行。信的抬头，还要写党中央。"江青说完，一阵冷场。

就这样，一场短兵相接的"预审"就此打住。转而再让大家座谈影片时，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了。

批邓阴风的前奏

江青召见的第三天，出现两道景观：明场，由于会咏主持，会聚来大寨的作家、编剧，根据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精神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研究如何抓好创作。这种故作姿态的座谈，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江青为应付毛主席批示的遮羞表演。而暗场，则是江青通过王淮湘给张天民施压，逼他再给毛泽东写信，以形成自打耳光。

我傍晚溜出宾馆见到天民，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王淮湘遵从江青旨意，要我再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创业》没大错，但有小错。要求再拍一部新《创业》。还让我自己提出，影片不要对国外发行。"此话我一听就愣了，问："要干吗？哦，主席说此片无大错，让你说还有小错。主席说建议通过发行，你说不要对外发行。这不是让你来否定毛主席的批示吗？"天民一脸愁容道："开始谈，被我顶回去。刚才，王淮湘又出马，说这是首长意见。而且还说，写信要快，不写只怕离不开大寨！"我眉头一皱，"啊，还威胁？"为减轻天民压力，让他心里有底，我当即把最近听到关于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江青拟出书引发毛泽东震怒的信息向他传递，并和他一起评估分析形势。回去时候，天民一扫低迷情绪，振作地自语："嗯，没什么了不起，我不会让他们满意的！"

召见第四天，夜色朦胧中，驶进大院的高级轿车结队连排，宾客、记者接踵穿过堂阶。幽暗的灯光下，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清华、北大的"梁效"写作班子，参加创作座谈会的作家，昆曲录音组的演员、作曲，还有长影《创业》、北影《山花》组的成员，100多人比肩簇拥着在餐桌前坐下，将聆听江青今天的重要讲话。

江青开腔了："今天，请大家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我们党内，斗争曲曲折折。就在最近，有人把我江某人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还没有经政治局讨论，居然给公开了！"最后一句话，声音特大，几乎是喊出来的。

此时我背身刚要笔录，一声尖叫："不许记！"吓了我一大跳。

江青稳稳神，继续说："外电评论说，我们党内有两派，一个是温和派，另一个是激进派。激进派就是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我！"

这位"左派领袖"逐步把话题点明，她说："最近发表了毛主席的《评〈水浒〉》。《水浒》里的头目宋江，置梁山寨主晁盖于不顾，也不把一百单八将放在眼里，将大名府的卢俊义请上山，想叫他执掌大权。卢俊义是什么人？是大地主大官宦的孝子贤孙，也是屠杀方腊起义军的刽子手！把这种人请上山干什么？就是要让他来造无产阶级的反哪！你们可以看看，他招降纳叛，网络了

原大庆《创业》创作组成员。组长薛涛（后排左1），副组长华克（后排左2），成员门嘉骊（中排左1）、卢泽洲（前排左1）、王基（前排左2）

华克1972年在大庆钻井队深入生活

一些什么人？都哪些乌龟王八蛋进了政府？所以我们说，宋江是投降派。宋江投降，架空晁盖，这就是《评〈水浒〉》的要害。”

她接着说：“同志们，投降派不可怕，我们要通过学习《评〈水浒〉》来揭露他。现在，我们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有起伏，有曲折。有人不是在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些人是还乡团，他们妄想反攻倒算！毛主席交给了我们斗争的武器，那就是丢掉幻想，准备反击！”“我们一定要反击！不然，他们上台，我们就得坐牢，就要掉脑袋。但是我不怕，主席万一百年，或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大不了自杀。不过我还不能死，要跟他们斗！斗争就会有牺牲，所以死也不怕，就怕不死不活折磨我，那还不如挨骂。”“我呀，天天有人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骂，共产党员还能怕挨骂吗？现在，社会上有人造我的谣言，说我自杀了，送到纺织厂劳改去了，真是笑话！在座的，你们听见谣言没有啊？”

大厅里出现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江青不见回应，就直接点名：“成荫，崔嵬，你们听到没有？”北影这两位大帅连连摇头。江青呵斥道：“没听到？谣言你们北影就有！还有东方歌舞团，有个姓王的女人，坏透了，也造我的谣！造文化部的谣！说呀，你们谁听到了？噢，都不吭声，好哇，张永枚，你站起来说，都听见了什么？”

诗人张永枚个儿不高，穿绿色军装，听见点名，当即站起，毕恭毕敬。他毫无惧怯，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慷慨陈辞：“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没有个人的敌人，他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也没有个人的敌人，她有的都是阶级的敌人……”江青不耐烦地把他的话打断：“行了，行了，谁叫你讲这些？我是问你，你听到过什么谣言？”口才流利的张永枚，瞬间张口结舌：“他们说……”江青急不可耐地问：“他们说什么？”诗人吞吞吐吐：“他们说，说……”江青吼叫：“说什么？你说呀，哑巴了？”张永枚被逼不过，只好说：“他们说，说文化部是个‘大行帮’！”

江青大叫：“不对！你没说实话，那天你是怎么说的？啊？”她决然地自我爆料道：“他们骂我是武则天，是吕后！同志们，吕后是什么人哪？她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她聪明能干，有法家头脑，辅佐刘邦，打败项羽，稳固了汉朝政权。我怎么比得了吕后呀？——不过，我是共产党员，在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上，我比她强！”

等我们目送江青离去时，她行至门口，突然转身，扬手发出一声尖叫：“不许挑拨离间！”这神经质式的咆哮，差一点把端盘子的女服务员吓倒。

9月20日一早，我们便依照事先安排乘专列离开大寨。专列驶出娘子关，忽然在距石家庄不远的小站停下。随员通知大家，首长要在这里睡午觉，不许喧哗。专列何时开，要等首长发话。

5天的大寨召见结束了，而围绕江青对《创业》的蓄意反扑，和借《评〈水浒〉》策划的“反击”阴谋，随之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开了批邓的序幕。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迅猛展开。这期间，江青始终对《创业》耿耿于怀，什么“主席7·25批示来路不明”，什么“授意张天民写信的指使人就是邓小平”等等诬言，又把《创业》作者推到了被追查的旋涡中。历经颠簸考验的张天民，不止一次地顶住了江青的打击陷害与复仇反攻。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为拍电影《创业》遭难的人们，才算彻底告别了可怕的梦魇。■

（作者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创业》摄制阶段副导演）

（责任编辑　王彦君）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

——访陈昌浩夫人孟力

○　冯亚光

陈昌浩早年参加革命，曾两次去苏联，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总政委。孟力，从小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她经组织推荐考进人民大学，1952年至1957年先后在人民大学俄语师范翻译系和北京俄语学院学习，正是俄语专业把她和陈昌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她因为深爱自己所学专业而舍不得丢掉它，经组织推荐由中国科学院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从而认识了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1965年7月和陈结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在陈昌浩最后的日子里，她一直伴随在他身边，两人既是伴侣又是难友，共同经历了阴云的恐怖，苦难的折磨。笔者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于2005年10月在北京红霞公寓访问了孟力。她回忆陈昌浩最后的日子，真实可感，令人难忘。

延安，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都可见到有关"密电"问题。造反派就"密电"问题，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无休止地围攻、逼供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三军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在三座门安营扎寨揪"军内走资派"徐向前，财贸系统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揪李先念。造反派对陈昌浩的批斗、逼供就更加残酷。

陈昌浩对孟力说："造反派对'密电'问题穷追不舍，'密电'我和徐向前同志都从未看到过。这是没有的事，怎么能乱承认呢？造反派大喊大叫地批我为他们开脱罪责，'想包庇他们过关，办不到！'"

当时，"密电"问题是完全可以把陈昌浩置于死地的"罪行"。这使孟力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非常想了解真实情况。她直言不讳地问昌浩："张国焘密电问题，到底是什么内容，怎么回事？"

昌浩说："前敌指挥部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既然是张国焘打给我和徐向前的'密电'，为什么我和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呢？'密电'只能是收报本人可以译的电报，我连看都没有看到，别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容呢？"

昌浩接着说："那时是战争时期，我和徐向前同志在前敌总指挥部，朱老总和张国焘在另一个地方，距离前敌总指挥部骑马也有好几天的路程，有事联系非常不便。毛主席和三军团在一处，离我们不远。我和向前同志负责右路军，张国焘在左路军，张国焘想要右路军南下，因此连发两份电报给我和向前，即：1935年9月8日晚上，以朱德、张国焘二人名义发来一份电报，大意

作者、孟力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麻琨在孟力家

是要我们右路军准备南下，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接到这份电报，我马上送给毛主席过目，并请主席指示。由于我们没有即时给张国焘回电，张国焘紧接着在9月9日又来电催促右路军南下，我同样马上将电报送到中央驻地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见到我，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昌浩同志啊，咱们还是一起北上吧！’我很高兴地对主席讲：‘好啊！好啊！我和向前同志就是准备和中央北上嘛，但目前我们正在紧急地为解决过河造船，大约再有三五天就能把河那边的同志们都运过来，即可动身北上了。’

“在我与主席见面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忽然发现和我同屋住的叶剑英参谋长的床是空的，人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也找不着，而且发现作战室里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不见了。我在想，他走的头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同住在一个屋子里，从未发生过矛盾和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不辞而别？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和徐向前正为这事纳闷时，许世友来电话很着急地报告：三军团他们怎么突然走了，而且还对我们放警戒！他非常气愤地请示我们：‘打不打？’我和向前同志都说不能打，徐向前同志大声嚷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我大声命令许世友和王建安不许打，赶快来指挥部开会。许世友可能没有听清楚，还在问打不打。我很恼火，气得连电话都摔了。当时，向前、先念都在场，还有几位警卫员也都在场嘛！

“‘密电’是根本不存在的事，退一万步讲，假设张国焘真打电报要我们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就能听他的吗？如果‘密电’是真的，我们追随张国焘也有叵测之心，你好好想想，在三军团和毛主席离开我们，并对我们放警戒时，我们为什么不打呢？这岂不是实现‘阴谋’的极好机会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完全可以证明事实的真相。还有，长征胜利会师后，在延安彻底清算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但是危害党中央、谋害毛主席这么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如果属实的话，为什么不揭出来清算呢？就这一条也可以给张国焘定上死罪了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和向前两人在大会做检查，主席说：‘主要是张国焘的错误，你和向前同志自己认识一下就行了，不必在大会

陈昌浩

检查了。’

“由于历史上的这些事，年轻人不了解，所以他们把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当作反中央、反毛主席路线的人，使原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受到严重冲击。造反派很想从我嘴里掏出他们需要的材料，我决不能顺从他们的逼供。我告诉他们：‘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同志们，在战场上是勇敢杀敌的好同志和英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

1967年春，一天中午，中国科学院北郊大楼食堂门前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很多人围观。大字报标题：“陈昌浩是西征途中的大逃兵”。孟力震惊了，挤上前去把大字报一口气看完。大字报的大意是：西征途中，在被敌人重兵包围，极端困难的紧要关头，身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不顾广大阶级弟兄的生命安危，弃军逃跑……。

孟力怀着不安和疑惑的心情回到家，急切地想问问昌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天过了晚饭时间，还未见他回来。她非常不安，担心他被

批斗后又犯了心脏病，会不会倒在马路上？陈昌浩1952年经中央批准由苏联回国，并把全部心血贯注在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中。党的八大期间，他组织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把大会文件及时地翻译成各国语言。为了抢时间，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用去了8年的时间卧床治疗。

孟力站在朝向院大门的阳台上，焦急地望着大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晚上9点多钟，昌浩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院里走来，她赶紧跑下楼去扶他，着急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心脏病又犯了吗？咱们马上去医院。"他向她摆手说："不去医院，先回家吧，抽屉里有药，去医院也还是那些药。"他服药后就坐在桌子边一动不动，疲惫不堪，闭着眼睛。他是深思？还是痛苦？她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拍了一张照片，也许是想等他情绪好了之后让他看看自己，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他的最后留影。

昌浩稍事休息，精神有所好转，对她说："造反派莫名其妙地给我罗列了一系列问题，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叛徒问题啦，什么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啦，长征途中的'密电'问题啦，西征途中逃跑啦……"

孟力紧接着他的话说："今天我在单位食堂门前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西征途中逃跑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昌浩声音低沉、非常痛苦，给孟力讲述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那段悲壮的历史。大意是：1936年10月底，我和徐向前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进行宁夏战役，我们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取消了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我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虽有2万多人，但都是与敌人经过激战后还未休整的部队，包括1000多名伤病号和1400多名女战士。河西走廊环境恶劣，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边是沙漠和大山，很少村庄、很少人烟，不好建立根据地，无法扩充兵员。而对我军恨之入骨的马步芳、马步青他们集结了多于西路军数倍的精锐兵力，有精良的武器和很强的骑兵，妄图把西路军消灭在这块土地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西路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并主动出击，共消灭了25000多敌军，当然我军伤亡也是惨重的。

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开始是"打通远方（苏联）取得援助"，后来因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部队，按照军委的多次指示，任务几经变更，因而走走停停，忽东忽西，逐渐丧失战场主动。敌军抓住西路军的弱点，更加疯狂地准备全歼我军，调集更多兵力反复向我军进攻，西路军又经历连续恶战，最后只剩下几千人，被敌军四面团团包围在严寒的雪山上。

昌浩讲到这里，流着泪，哽咽着，说："我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不能让几千英雄儿女在雪山上白白送死嘛！中央命令我们分散突围，可是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突围很难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设法能让同志们冲出重围，想出一个办法来，利用当时敌军急于活捉我和徐向前同志，到处张贴悬赏重金活捉徐向前、陈昌浩的告示，将计就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一是缩小部队目标，二是返回中央向中央汇报。我军乘机分三路突围，由李先念和李卓然等同志指挥的1000多人不仅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且将400多名身经百战的将士带到新疆，经过新疆带回延安。"

昌浩非常沉痛地说："西路军的重大伤亡与失败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作为第一把手负有重要的责任。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我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说着，热泪涌了出来。

孟力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给他倒了杯水，劝他休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67年7月26日，昌浩一进家门就告诉孟力："今天我在回家途中，看见彭德怀和张闻天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呈喷气式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完全像以前斗争恶霸地主一样。这样丑化我们党的干部，太不像话了嘛！这岂不是丑化我们党的形象吗？"

昌浩稍缓一下，激动而沉痛地说："彭德怀和张闻天同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和有贡献的工作，是党内有威望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错误都是做过结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这太残酷无情了吧。"昌浩紧靠在沙发上，流着痛苦的泪水，不断地仰面长叹……。

从昌浩的情绪中孟力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抑着无法言表的悲伤和痛苦。她真为他担心呀，非要陪他去医院。他就是坚决不去，说："我每天得按时去单位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单位，他们会冲到家里来揪斗我，如果我在医院也会从医院揪出来，还会说我装病抵制运动。我只能带点药，有时带着药都无法吃，办公室挤得门都出不去。"

1976年7月29日，是孟力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昌浩手捂着胸口，迈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晃动着身体，走进家门。一看就知道，他刚挨过批斗，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样子。她赶快用身体支撑着他，着急地问："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他告诉她："造反派轮番批斗，拳打脚踢，我恐怕很难支撑了。"他非常低沉而深情地喊着她的名字："孟力，我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吃药也止不住，恐怕是很难好了！"她焦急不安地说："赶快送你去住院治疗。"他摆着手坚决不去，说："我要是住了医院，造反派就会给我扣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深深地喘了几口气又说："医院现在也很乱，如果知道我是被审查批斗的对象，是会被赶出来的。我先吃点药休息休息再看情况吧！"孟力给他服了药，赶紧扶他躺在床上，几次让他吃饭他都不吃。她想，休息一下也许会好一些，就没有再打搅他。

每天早晨5点起床，是昌浩多年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晚过，可这天过了半小时他还没有起床。孟力轻轻地进屋看他，他还在静静地躺着。她走到他的身边，摸摸他的头不发烧，推推他也没有动一下。她叫他，他不答应，她再叫，大声地叫仍不答应。她急得摇动他，他仍一动不动。天哪！昌浩莫非离开我们了吗？她焦急地要送他去医院，可文革以来电梯没有人开了。她赶快求邻居——昌浩的老战友郭述申同志的儿子们帮忙将他抬下楼，送北京医院抢救，但始终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他离她而去了。

陈昌浩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在"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迫害下不幸去世。他带着满腔的悲愤却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悄然离去，离开了他的亲人、战友和同志，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祖国，他含冤而去！

昌浩去世后，孟力和孩子都被株连，家被抄，人被关，把她全家当作苏修特务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孟力，这位延安过来的同志，深信党对昌浩的历史问题会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从1972年至1979年的7年中，她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一方面是向党中央汇报昌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请求中央为昌浩在文革中被强加的不实之词，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平反昭雪。

1979年10月5日，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她亲自带着材料去见耀邦同志，汇报文革中昌浩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并请求党中央为昌浩平反昭雪。

耀邦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她，并耐心地听了她的陈述。耀邦告诉她："孟力同志，你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信都已转到中组部了。你提到关于文革中昌浩的专案问题，中组部会重新审查的，关于昌浩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也一定会开的，你就放心吧！"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孟力看着悼词，流泪了。昌浩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孟力为中共中央编译局退休干部，冯亚光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张仲翰与新疆开发

○ 纪 新

张仲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政委，文革初受迫害入狱，1975年出狱，1979年平反，1980年病逝。

张仲翰

一、张仲翰的功与“罪”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历过三年大饥馑。时值轰轰烈烈“大跃进”之后，忽然间全国粮食供应空前短缺。在城市，粮食定量紧缩，肉油蛋菜难觅，什么都要票，供应越来越少，出现了“二号病”；在农村，“反瞒产”使许多农民失去口粮，在往昔争相“大放卫星”的省份，更出现数以万计的非正常死亡，尤以河南、四川、甘肃、安徽、山东为甚。不过，与历史上的灾荒不同，这一回并没有出现饥民流亡、成群结队、沿街乞讨的画面。那些饿死的人，多是静悄悄死在家里的。他们为什么不出门逃荒？因为有严格的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卡着，并且迅速下达了坚决制止“盲流”的红头文件。没有通行证，绝大多数老实听话的百姓连县城都去不了，只能待在家听天由命。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那时兰新铁路正在甘肃境内修建，有人听亲戚来信说新疆有招工的，也有人瞎闯扒上火车干脆坐到了尽头柳园，发现新建的铁道边搭有帐篷，外面贴着纸条“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招工处”，壮胆进去一问，什么人它都收。嗬！这下可找到活路了！从1959年到1961年，铁路向新疆方向不断延伸，兵团的招工帐篷先后从柳园迁到尾垭，又迁到哈密。在这三年期间，兵团招收的“盲流”职工至少40多万。195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38.4万，1961年达86.8万，整整翻了一番多。

拍板决策这样干的，就是张仲翰。

公然违抗中央红头文件，政治风险之大，自然是不消说。“盲流”，即脱离政府控制的盲目流动人员，从某种意义上无异于危险分子的代名词。此举属于“严重违纪行为”。

为了把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事后兵团采取的措施大致有三：一是对所招收“盲流”进行严格政治审查，到了团场后，每个人均须填表写出简历，然后逐一发函外调；二是严格控制使用，这些人一辈子只能当农工，极个别表现好的可安排当个小学教员、连队统计员之类，连当会计、出纳、保管员都没有可能，因为涉及钱、物，怕出岔子；三是在政治上严加戒备防范，最起码有一条污点他们是怎么也洗不掉的：“经不住‘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表现再好也不能入党。

尽管如此，张仲翰依然是在劫难逃。1966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还没等红卫兵在新疆出现，他就成了新疆首名被打倒的“走资派”。最大的罪名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

为了抹黑张仲翰，某些人把出身“盲流”的兵团农工视为他的“社会基础”，不仅说其中“混进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指责“本地生活困难一些就往外跑，真正的贫下中农是爱土地的”，也就是说，哪怕出身贫下中农也算不得“真正”的了。

时隔半个世纪，回看历史烟云，张仲翰的“罪行”算什么呢？如今再也没有人提起，而他的历史功绩却日益凸显。

第一，此举是张仲翰品格高尚心口如一的思想体现。今天，三年大饥馑造成3755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历史事实已人所共知。人们不解的只是，那些成天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的领导，

1965年7月5日，陪同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接见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

怎会闹出如此天大的失误？为何在长达三年时间内不设法弥补、纠正？他们难道不懂得不能让老百姓饿死是“为人民服务”最起码的底线吗？这场大饥荒，是对各级干部是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考验。在考验面前，只有张仲翰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敢于顶着中央红头文件的巨大压力，伸出手去收留录用“盲流”人员。

第二，此举奠定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的基本格局。1954年兵团组建时仅有43个团场。在张仲翰的主持下，1958年发展到134个团场，1966年达158个，基本形成了兵团延续至今的地理空间分布发展格局。兵团的底子是在那几年打下的。如果没有张仲翰的宏图大略，不是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一旦错失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不可能有今天兵团的偌大规模。而抓住这种机遇赢得兵团的超常规发展，又与吸收大量“盲流”职工直接相关。1958年兵团的团场比初建时增加了两倍多，人口虽比初建时增加1倍，劳力却并未有相应的增长。劳力严重缺乏成为制约兵团发展的瓶颈，不少团场虽搭起了框架，却铺不开摊子，迈不开步子。吸收录用大批“盲流”职工之后，各团场的垦荒规模、耕地面积、产量产值连年迅速攀升，新职工成为兵团基层一线的主要劳力。那是兵团的黄金岁月，至今被“老兵团”津津乐道。

第三，此举直接打造出了新疆的“稳定器”。今天，说兵团是新疆的“稳定器”已成共识。这首先在于它有270万人口的庞大规模。但很少有人知道，“盲流”及其后代占了多大的比例。1954年兵团组建时17.5万人，1957年32.4万人，到1966年，包括起义部队、解放初进疆部队、支边青年、后来的复转军人等各类人员在内，至多不过40余万人，发展到今天至多也不过90万罢了。剩下的180万，即今天兵团人口的2/3是“盲流”及其后代。兵团人口中的“盲流”所占比例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原因之一，兵团录用“盲流”并不限于1959年至1961年，事实上直到文革前从未中断。这些人，多数老实听话，吃苦耐劳，不讲条件，干活卖力，团场里用起来最顺手。口子一旦打开堵上它就很难。如后来当过四川作协副主席的诗人杨牧，就是1964年“盲流”到新疆被兵团农8师148团录用的。原因之二，“盲流”多是20多岁的小伙子，干个一两年，攒上几个钱，一封信寄回老家，就会有“邮票新娘”找来，成家后很快有了孩子，几年间一变为三，甚至更多。原因之三，兵团条件艰苦、劳动繁重人所共知，80年代初支边青年出现返城回流风，其他人也纷纷设法调离兵团，1974年之后的20年间兵团人口出现负增长，但离开兵团的人中来自“盲流”者极少，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们一无背景二无门路，是兵团员工中最稳定的成分，因而使其所占比例进一步提升。

二、壮大兵团的历史意义

张仲翰壮大兵团，迈出了使新疆长治久安的关键性步伐。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汉代已设置西域都护府，唐代设置过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但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历史上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一直是短暂、脆弱的。西汉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至新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统治瓦解，前后仅74年；东汉时“三绝三通”，前后加起来还不到30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设置安西都护府，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置北庭大都护府，至唐德宗贞元年间（8世纪末）统治瓦解，实际控制时间也不过150年左右。此后的近千年间，中央政权长期失去对新疆的控制。清乾隆时中央政府再次控制新疆，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但1864年南疆爆发动乱，迅速蔓延全疆，政府全面失控，前

后统治时间也仅有百年。此后，来自中亚浩罕国具有英国殖民势力背景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不仅全面控制南疆，而且向北占领乌鲁木齐、达坂城一带，俄国则趁机占领伊犁地区。面对新疆实际上已被阿古柏和沙俄全面瓜分的危急局面，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纷纷主张放弃新疆，若不是左宗棠慷慨请命一再坚持挽救，于1876年率部进军新疆，一举摧毁阿古柏政权，并迫使沙俄交还伊犁，今天的新疆便相当于朝鲜、越南、蒙古了。

为什么汉、唐以及清代，中央政权一直不能使新疆长治久安呢？汉、唐两代，中央政府以军事征服建立在新疆的统治，虽也辅以兵屯，但只是自筹军粮的权宜之计。兵屯不是移民，从未扎下过根，更谈不上“历代沿袭”，政权一旦瓦解，兵屯立刻消失。清代新疆的屯田规模虽远远超过汉、唐，形式包括兵屯、户屯、旗屯、犯屯、回屯等多种，兵屯一度达14000多人，民屯曾发展到20万人，但只分布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伊犁一线，由于与内地相距遥远，很难动员更多的人，所以还是没能扎下根来。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如果汉族移民在一个边疆省份不占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在那里真正扎下根，长治久安便只能流于空谈。以云南省为例，明代以前，汉族居民很少，一直处于羁縻状态，经常发生动乱割据。明代初年，朱元璋派沐英率军占领云南，命其率部就地携眷屯垦，同时大量动员附近省份移民前往，使居民结构发生根本改变，从此才达到了长治久安的目的。

新疆的情况与云南相似，只是因为有河西走廊相隔，距内地省份更远，清代无法组织更多移民前往。张仲翰的见识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随着兰新铁路修建，新疆与内地的距离大大拉近，因而已具备了明代开发云南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不失时机抓住大量“盲流”主动投奔来疆的难得机遇，因势利导把他们吸纳进兵团，使之成为最大的一批移民。时隔半个世纪，他的这番良苦用心终于结出硕果。民国初年，新疆人口200万，其中汉族仅占2%，主要是官员、军人和商人，全是没有扎根的；而今天，新疆人口2200万，其中汉族占40%以上，主要是近半世纪来的汉族移民及其后裔，尤其是兵团的270万人，如今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与新疆的土地紧紧结合为一体，在新疆深深扎下了根。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与新疆分割开来。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分裂企图得逞。这是新疆长治久安最根本的保证。

这是张仲翰足堪名垂青史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

“盲流”一词出于当年红头文件，是个充满侮辱性的字眼。张仲翰曾把它稍加改造，叫“自流”，并解释说“一叫盲流就伤人感情了”。他们是兵团最大的构成群体，处在兵团社会的最底层，是生产连队的劳动主力，身处最艰苦的环境，从事最繁重的劳动。不错，他们是“盲流”来的，但在面临饥饿、死亡的严重威胁下，为自己找一条活路难道有错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拥有谋求就业的权利吗？今天，他们中的半数已葬身戈壁荒野，他们已用整整一生的辛劳奉献，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们的名分，我建议叫“自动支边”。事实上，他们与其他支边青年的区别，不过是无须动员、自动投奔，自己掏了车票钱罢了。

三、文革中不跟风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说，文革的矛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知道，从文革开始到各级领导纷纷倒台，前后相隔约有半年时间。但张仲翰与众不同，他是“十六条”刚刚出台便应声落马的。

于今回顾，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都没有闹清楚，文革十年打的自然是一场糊涂仗。但要说张仲翰与毛泽东竭力推行的那一套“对着干”，却似并不冤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仿佛为他量身打造。

毛一再强调要搞“阶级斗争”，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张仲翰却公然说：“为什么要你死我活呢？你也活我也活不是很好吗？”

毛强调要“突出政治”。张仲翰却说：“什么是突出政治？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你把生产搞上去，我看就突出政治了。”

他的这类直言快语，就像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多了，只是以前没有人去揪。

张仲翰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衣食无忧，性格热情开朗，精力充沛，交友广泛，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打球唱戏，样样来得。抗日战争初期，他出于民族大义，毅然揭竿而起，拉起数千人的队伍，被八路军120师收编，在359旅当团长。他性情豪爽，光明磊落，诚恳坦荡，乐于助人，与同僚也相处甚好。1949年进军新疆后，先后任9军政委、22兵团政治部主任，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任副政委，后任第二政委。

纵观张仲翰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与一般人有几个不同之处：一是直到文革之前从未受过挫折，从未经历“运动”磨难，从未领教过挨整的滋味。二是一直担任正职，从未当过副手，在22兵团虽是政治部主任，但这支起义部队的政委由王震兼任，未配副政委，实际工作由他主持。兵团组建后，虽有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赵锡光、程悦长等排在他前面，但陶、赵是起义人员，王主持新疆全面工作在兵团仅为兼职，程悦长因病休养从未到职，所以，张仲翰虽身为副政委排在最后一名，实际上却是兵团的第一把手；后来当了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仍由王恩茂兼。三是多年来上级领导基本没变，他在八路军359旅719团当团长时，旅长兼政委为王震、副政委为王恩茂；进军新疆初，张仲翰任2军6师师长，王震兼任2军军长，王恩茂任2军政委；后来张仲翰任22兵团9军政委、22兵团政治部主任，王震兼任22兵团政委；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张仲翰任副政委，王恩茂兼任兵团政委；王震调离新疆任农垦部部长，在垂直体制上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级领导。张仲翰的顶头上司，始终是王震与王恩茂。

长期在老领导手下工作，彼此相互熟悉，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打肚皮官司，对张仲翰固然是一件幸事，但时间长了，不免也滋生出直言不讳，泼辣有余、谨慎不足的毛病。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上天真得可爱，对曲里拐弯的政治韬略一窍不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毫无防范之心，对政治气候变化缺少敏感，只认定“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却不知道有些老实话是不可说的。文革一来，对这种人内心世界的打击也最沉重。

但他始终是忠诚的共产党人。他反叛官僚地主家庭投身革命，一生没有娶妻生子，从不积攒财产，身后几乎没有积蓄，遗嘱把电视、冰箱、录音机和刚补发的几千元工资送给战友们的孩子，在给组织的信中说：“我的生命已危在旦夕，随时都可能死亡。在我弥留之际，我有一个愿望，恳请中央在百忙中，把我的结论审批一下，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使我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死去。”他心中牵挂的只有这一点。

他是一个务实、开明、温和的实干家，在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年间，不琢磨人光琢磨事儿，一心只想把兵团做大做强。

四、张仲翰其人其事

张仲翰不主张折腾“阶级斗争”，经常说兵团是一个“大熔炉”。他推己及人，既然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的自己能够在革命大熔炉中实现思想的根本改造，为什么别人就做不到呢？他反对“血统论”，坚信即使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绝大多数也都会在兵团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被熔化、锤炼、改造，为兵团建设做出贡献。他更多强调的是团结创业，艰苦奋斗，强调要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强调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强调重在政治表现。能不搞的运动他就不搞。很少有人知道，波及全国各地的反右派运动，在兵团干脆就没有搞。运动后，内地不少“右派分子”被发配来兵团接受改造，他给这些人做报告，开口就是“同志们”，使他们惊喜交加，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已很久没听到过这个称呼了，而且居然出于兵团政委之口！事过半个多世纪，有人还撰文回忆此事。的确，那时兵团条件十分艰苦，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政治上受到的歧视却比其他地方少得多，兵团政治环境宽松，许多人对此都有同感。

对“突出政治”那一套，张仲翰从来毫无兴趣。他是干实事的，知道靠那套花里胡哨的名堂干不成事只能作秀。与其把那些空话套话成天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倒不如认认真真扑下身子多干实事。兵团哪有时间成天耗在开会上呀！一个连队一二百号人种万余亩地，春耕播种夏收秋收连轴转，每天得两头摸黑干十几个小时，常常个把月也休息不了一（**下转第75页**）

九届二中全会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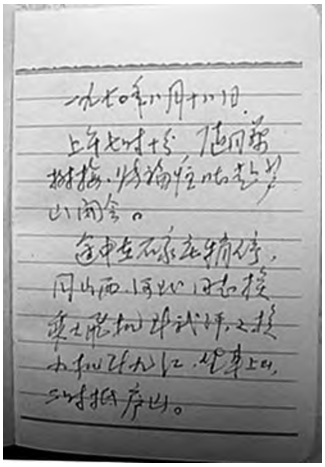
○ 解学恭

整理者按：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等人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订的《论天才》的材料，授意华北组编写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全会“六号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公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会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解学恭是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军区党委常委、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华北组副组长，与李雪峰、吴德一起签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此，解学恭在会议期间做了检讨，并揭发了陈伯达在天津的活动。当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学恭在会上多次检讨。为了贯彻华北会议精神，1971年2月，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天津警备区党委联合召开500余领导干部参加的批陈整风会议，解学恭在会上做检讨，接受与会者批评。笔者作为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整理解学恭日记时，笔者发现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日记，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会议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华北组讨论的详情，是一份比较难得的史料。其中提到的人物以及日记对他们的评价，只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认识。

王 辉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十分 随同蔡
树梅、张福恒同志赴庐
山开会。
途中在石家庄稍停，
同山西、河北同志换
乘大飞机到武汉，又换
小飞机到九江，坐车上山，
二时抵庐山。

解学恭日记影印件（局部）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八日

上午七时十分随同蔡树梅[注1]、张福恒[注2]同志赴庐山开会。

途中在石家庄稍停，同山西、河北同志换乘大飞机到武汉，又换小飞机到九江，坐车上山，二时抵庐山。

八月十九日

游览仙人洞、险峰、花径、鹿苑、含鄱口、植物园，看世界稀有植物水杉。

八月二十日

游览黄龙寺、玉龙潭、三宝树、水电站、圆佛殿、大天池、八卦塔、望江崖。望江崖有阳明山人王守仁字迹刻于石。

晚九时三十分至十一时许，陈伯达同志约谈话，同车去的有赵成章[注3]同志。谈的问题：

一、坨子地[注4]那个富农分子写的变天账印出来了没有，最好能快印。已告排版，尚未印。

二、在天津谈话流传一个十一条不知出自何处。是不是天津出来的。伯达同志给我一份打印十一条看，我说不是天津出来的，天津没有这个十一条。陈要我问余秋里同志，是否他那里出来的。这个十一条是业务组一个工作人员给的，可能是从计委出来的。流传的这个十一条，有些语言错误，编排较乱。秘书已告刘政同志[注5]改正。这个十一条再不要扩散了。

三、关于华北经济协作问题。经济协作很必要，华北条件好可先行一步。你告诉雪峰[注6]、郑维山同志[注7]，在这里可以和华北各省市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告，总理有指示，北京牵头，正在准备。你还是告诉郑、李一下。

四、学习西右营[注8]问题。我反映，学习英雄的西右营口号传出后，干部群众有反映。伯达同志说，要各大队互相学习。突出西右营会帮倒

忙。西右营同反动的政法公社[注9]斗争，是英勇的，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影响，从这点说向英雄的西右营学习是可以的。但这是指西右营的贫下中农。宣传过火了，西右营会垮台的。要注意。

五、在西右营可以试试商业由大队来办。国家办，一个售货员一个月拿三十元，脱离群众，贫下中农有意见。你们可不可以试试？

六、公社干部有的一月一百元工资，太高了，生活同贫下中农悬殊太大，家属又不劳动，这个问题是防修的问题、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应考虑一下，怎么办好。

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七、我说十一条中，天津粮食是要自给，办不到，仅有170万亩粮田，等于一个县，包不起300万人口的城市。陈伯达同志带着批评的口吻说，你们天津落后就是没有雄心壮志；还有国营农场问题。每年国家拿3亿元补贴，这是一个问题。天津的国营场是否可以自力更生，搞集体核算，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八月廿一日

郑维山同志传达：

林副主席要华北把战备问题，在三五日内写个情况送给林副主席办公室。战备怎么搞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经验，今后怎么搞，对全面战备怎么搞。文字不通不要紧，内容不全、材料不全不要紧。是资料性的，阅毕以后还退还你们。

郑要我帮助写。

我向李、郑报告了陈伯达同志要华北同志碰碰头，研究一下，经济协作区问题。李说，不能开。又谈具体组织写战备材料问题，先由两个秘书写，我们再改。

中午，余秋里同志来，我们顺便问十一条是不是你们那里搞出来的，余说根本不知道。下午给伯达写了一封信，反映天津粮食不能自给，请再考虑。

八月廿二日

晚九时半，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总理主持。

总理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

总理说，一、开一个全会，大家都出席。二、全会议程三个：修改宪法，国民经济提纲，战备工作。主席说，廿三日到廿九日时间差不多了，会议可以结束。主席认为第一件事比较容易。第二议题是国民经济计划，当读到执行情况很好时，主席讲，让它超过。因此，计划没有大改。廿三、廿四、廿五日，政治局讨论计划。第三个议题，军委办事组起草了一个文件，送林副主席审阅后再提交政治局。

此外，人大代表名额还要谈一下。中央决定，爱国人士为特邀代表，共104人。

会分六个组，按原来的分组法，政治局的、中央部门的、军队的，分别参加到六个组中去。

主席说，大家关心的是形势，总理讲一下。

康老解释宪法讨论后的修改稿的各要点。

总理说，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做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做国家副主席，这是群众的热望。

主席说，不要设国家主席了，党领导国家，主席是个形式。资产阶级国家也是他那个党做决定、国会通过。接见外宾，规定了不好办，不规定就可以见、可以不见。政协存在不存在，看一看。

又讨论到公民的年龄问题。十六岁小，判断力差，对早婚有影响；在法律上对成年未成年还是有区别的。

汪东兴同志补充传达主席指示：

大家关心的是形势问题。主席指示由总理讲；宪法由康老讲。

林副主席说，主席决定把宪法交给群众讨论，积极性高了。主席说，过去讲企业下放，调动积极性，可是没有摸底就下放了，这次下放有底了。有两年工业下降，这两年又上升了。南粮北运、北煤南运的问题，现在煤逐步解决了。主席说，看依靠谁？靠专家、还是靠群众。林副主席讲，主要是发动全国亿万群众的积极性。

当康老讲到宪法全国讨论了，党委建立问题

要解决。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两个办法都可行。

主席说，整党不是开始了吗？吐故怎么样？吐的不多吧。康老讲挂起来的多，主席说，那就吐故不多了。

总理讲，主席指示下放，一要落实，二不要许愿太多。主席说的两个办法，实际上是两条路线，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的问题。

起草委员会如果同意宪法草稿，可以发到全会同志讨论。

八月廿三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四时三十分至六时，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主席主持会议，林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总理、康老讲了话，伯达未发言。

晚八时至十一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林副主席讲话讲得很深刻，从历史发展阐述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胜利的根本。每到紧要关头，都是毛主席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迷迷糊糊，要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为自觉的思想。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对提高全党的路线觉悟意义深远。

十二时至下午三时，整理林副主席讲话的笔记。

八月廿四日

上午听林副主席报告录音共两遍，边听边核对记录，又加深了印象和理解。

下午三时至六时，小组讨论林副主席报告。中央办公厅通知廿四日、廿五日两天讨论林副主席报告。当日下午陈伯达同志在华北小组发了言。汪东兴同志也发了言。伯达同志的发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译，伯达同志发言，着重阐述林副主席报告中有关毛主席是伟大天才的论述，把天才问题搞得非常高，引证了许多语录，有时加以解释。汪东兴同志发言着重讲国家应当设主席，并且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陈伯达同志为这个问题不时插话，帮助提高。小组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情绪激昂，上纲、上线很多很高。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大意是：现在竟然有这样狂妄的极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阴谋，要揪出来，坚决打倒。我虽是犯错误的人，但我绝对不能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连个狗屁也不敢放！声称我要参加这个战斗，斗到底。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发言也很激动，十分气愤，但基本属于表态性的。对设国家主席问题，会场鼓了几次掌。李雪峰同志主持会议，未发言。

周恩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神情严峻

六时休会，李雪峰留下几个副组长，对秘书说，今天是大事，简报要快出，综合、如实反映。

晚上八时至十一时，小组继续讨论，和下午差不多。晚十二时，夜餐时黄道霞[注10]同志催要简报签发。李签了字。我觉得帽子太多，李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我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一起不好，李、吴说勾出来，我勾了出来，写了一句，其他未动。李说赶快拿去发吧，我签了字，吴德同志也签了字。

八月廿五日

上午阅读文件。

下午继续小组讨论。吴德同志主持会议。我表态发言后即去修改向林副主席报告华北战备情况的材料。

近六时，雪峰同志从政治局开会回来，宣布了小组会立即停止，向几个副组长传达了三条指示：一是会议方向不对；二是那么上纲上线不对，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三是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别的都不准传达。

九时，吴德同志电话传达三点，向骨干说一下：

一、国家不设主席是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意见；

二、有的同志有错误思想，可以批评；

三、不能揪人。

其他的问题，听候中央政

治局统一讲法。

又通知：廿六日休会一天，晚上看电影。

八月廿六日

清晨，中央办公厅王良恩[注11]同志电话传达三点指示，向骨干讲明三点：

一、国家不设主席，这个问题不要再提意见了。

二、林副主席的报告是讲思想的。

三、不许揪人。

八月廿七日

上午八时半，雪峰同志传达国家不设主席的问题，要向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打招呼，做细致的工作，打通思想，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工作要做到一个人不漏，而且要做通。

李雪峰（前排左2）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与参加会议的河北代表在江西庐山合影

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使每个同志提高认识，理解这个报告的精神是讲思想的。

各省市参加会议的同志讨论宪法草案，并修改一本送交大组，大组综合一本送中央。

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小组学习林副主席报告，一致认为：

一、林副主席的报告精神，是使全体同志认清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要清醒，要学习再学习，要代代传下去。要谨慎，上面一股风，下边就可能变样子。

二、报告对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稿，是肯定的、满意的，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宪法产生的方法是体现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都是正确的。

三、报告讲的是思想问题，针对一种思潮讲的，不是指的什么人。针对性是包括自己在内，作为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下午三时至五时半，天津小组对宪法草案提修改意见，共四点：

1、序言中可否加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注12]的第一段。

2、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前加上国家二字。

3、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按林副主席报告，是否可再加上“和领导者”四个字。

4、“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提议改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提法有问题，可以不提）

其他都同意。

八月廿八日

上午休息，到仙人洞，同郑三生同志[注13]、吴德、吴忠[注14]等同志摄影留念。

下午学习。

八月廿九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至十二时半，华北地区小组负责人开会，主要是听汪东兴同志发言检讨。汪东兴同志讲，他请示了主席，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十位同志是主席指定的。他到这个会上来讲，也是主席同意的。汪东兴同志检讨自己的错误，违背了主席教导，犯了错误，完全同意主席对他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一个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的人，犯了这么个错误。

下午四时，雪峰同志召集华北组负责人开会，传达总理指示。大意是，四时半，林副主席要主持一个会，参加人政治局同志及各大组正副组长，主要解决这次会议中发生的问题。听几位同志的发言，统一表态，完全拥护毛主席指示，坚决照办，保证把这次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让毛主席安心，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

四时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七时四十分结束。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发了言。陈伯达、汪东兴、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六个大组组长表了态，春桥同志也表了态。会议空气好，团结胜利的会。决定将这次会议的全部用录音向参加全会的同志传达，并规定不记录，严

格保密。

八月三十日

上午八时半到十二时，小组同志听录音传达。

下午有的同志二次听录音传达，有的同志自学，宣布可以自由选择。

回忆李雪峰同志在传达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时，有几句插话，据说是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时用的：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孙权小儿，想把我置于炉火上烤。”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提起千斤，放下四两。”

“孔夫子打牌，和为贵。”

“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方法不对。”

庐山的这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教训实在深刻。

听主席的话，按主席的指示办。不能只讲，必须坚定地如实地执行，绝对不能含糊。一言一行，要考虑到党、全局、方向、纪律。

要时刻警惕坏人。赞扬就可能是坏事的开始。听到赞扬声，就要警惕自己。

凡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坚决顶，坚决斗，不能有私心杂念。

没有调查、分析，多问几个为什么，就不要随便表态。

什么是谦虚？实事求是态度就是谦虚态度。谦虚与虚伪是排斥的，格格不入的。

领袖与群众是心连心的。对立起来看问题就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是代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主席指示国家不设主席，出发点在此。

陈伯达是个野心家、骗子。欺骗蒙蔽了多少人！教训深切！

八月三十一日

通知可以外出。上午，同北京、天津的同志到五老峰游览。听说五老峰最高，很难上到主峰。我们登至三峰，十分疲劳。心脏有痛的反应，休息了一阵，过午返回。这天到五老峰的人真不少，有华东、东北、西北的许多同志。

九月一日

上午：休息，不外出。

下午四时半至晚十二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三十一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这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字字闪耀着马列主义的光辉。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揭露了陈伯达分裂党的大阴谋和狂妄的野心，使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原形毕露。

九月二日

上午，分省开小组会，讨论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光辉文献。会上我发了言，并揭发了陈在天津的两面派活动事例。

下午三时至四时半，继续讨论。

四时半至七时，林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扩大）。黄总长讲战备情况和战备工作。

晚，八时半至十一时，康老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逐条修改通过宪法草案，一致通过修改意见。

九月三日

上午：继续分省讨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我们重点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个根本区别问题，掌握武器，批判陈伯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下午：三时至七时，华北小组开会，讨论主席指示。总理、康老参加了会议。陈伯达到了会。根据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所谓检讨和一封寥寥数行的“表白”信，进行了批判。这次会上我发了言，主要点：

1、对主席指示的理解，检讨自己上当的教训；

2、批判陈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裂党的罪行；

3、指出陈伯达的检讨，极不深刻，很不像样子，而且埋下了不少翻案的“钉子”，如第五条……；

4、陈伯达态度很坏，不改正就彻底完蛋。这决定于陈自己。

其他同志也发了言。

总理、康老插话、发言。

总理：要读书。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不然就上当。

康老：受骗问题，主席说，第一，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深思一下主

席的话，每句话都闪烁着马列主义的光辉。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这三条为什么就受了骗？

永胜：不学习，就不自觉，就盲目、就受骗。

总理：陈伯达是靠刘怕邓。上过当不要紧，把自己摆进去，学习、提高。

康老：陈在华北组煽风点火，有五大谎言：

一、宪法上写上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你说是反复斗争的结果，这真是弥天大谎。你只参加过两次会，没有讲这个问题，你讲什么两种所有制，不要留尾巴……

二、你说有人说毛主席天才，是一种讽刺，你是害人，用心真恶毒。

三、你煽动说是要否定十一中全会公报，为刘少奇翻案。

四、你说利用“毛主席的谦虚”，你是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造毛主席的谣。

五、你说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谁怀疑？竟然有人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是谁？这完全是煽动！

煽风点火，完全是有组织有准备的。你事先就把造好的语录送给人，并且还给打了电话。

陈伯达有三大罪恶：

一、分裂党，要夺权，为了这个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二、打着假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三、不仅反对毛主席，而且辱骂毛主席。你的话音刚落，陈毅就拥护，而且讲了很恶毒的话，你没有任何表示；你说是起草的人是反革命，听到不设国家主席就手舞足蹈，你把政治局、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都骂成是反革命。

你真是一个一手拿着鸦片烟、一手拿着刀，一面毒害同志，一面要把人送上断头台，你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实际上是大大的“政治家”，搞阴谋的政治家。

你是个假马克思主义。一，你不引马克思的话，恐怕引，又欺骗同志。二，引恩格斯一句话，欺骗同志，恩格斯讲过这句话，但接着说，马克思深刻研究了法国的历史，研究了法国的阶级斗争，收集研究了许多资料，才成为一个天才的著作。而且这部书是马克思34岁时写的，青年时代的著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才写序言的。这点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断章取义，欺骗同志？你引的列宁的五条，列宁是批评蒲鲁东派，说他们的领导人是革命高潮中进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引证全，就会引到自己身上，所以你不敢引全。列宁批评的正像你这样没有改造的旧文人、旧知识分子。陈伯达既然来个突然袭击，我们就不能来个草草收兵。

作为教训，我们要把自己摆进去，接受教训。

总理：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

总理、康老讲话，对自己很受启发和教育。受骗是什么原因，教训是什么？只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在实践中用，时刻用，才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有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才能减少盲目性、不受骗、不上当。

解学恭（左1）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参加讨论，左2为周恩来

九月四日

上午：华北组继续开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批陈伯达反党罪行。

下午三时到六时，晚八时到十一时，小组讨论，揭发批判，发言同志十分热烈。对陈的检讨极不满意，并纷纷提出质问要陈伯达回答，陈态度抵赖，不发言，“想一想”……

雪峰同志传达，小组会到此告一段落，明日有新的安排。

九月五日

上午阅读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李雪峰向小组同志传达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一开始问：会议可以结束了吧？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底细，知道较多的是总理、康老和我。这种事总是会有的，庐山不太平，别的地区就太平了吗？比如陈毅当中央委员，有多少人反对啊，说服就当选了嘛！

会上康老集中反映大家的四条要求：

一是普查陈伯达的历史，过去有人写过检举信；

二是要他彻底交代；

三是要他写出来，免得他赖账、诡辩；

四是不能留在主席身边。

主席说，到别处也是一样，文人难改造。

有人说他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时，主席说，能写些文章还是鲁迅说的那些人。五四运动以来，有的死掉了，有很多人都不行，我就不相信红卫兵那些领导人都行吗？

大家讲到我们党的时候，戴季陶、邵力子发起建党，但很快就退了党，所以我们这个党历来就是复杂的。如一次大会后，就有陈公博、周佛海当了汉奸，并不影响我们党光荣伟大。又如刘仁静，这样的人关他干什么。罗章龙这些人也不要抓他，无非是跑到了土耳其，搞也搞不出什么油水来。苏联的波格丹诺夫、马尔托夫，开始保下来，后来斯大林就杀人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杀了。

当问到陈伯达该怎么处理时，明天开大会他上台不？大家说不要上台。毛主席又问要不要到会？大家说，不要到会，免得大家生气。主席说，如果历史上查不出什么事，我的意见还应保留中央委员。比如陈毅还当中央委员嘛?！这种人不可不有，不可多有。

有的同志说，他回到北京时要限制一下自由，他到处跑，有事找不到他，他行动从来不打招呼。

主席问，公报写得怎么样？主席说，大会是个形式，不可不开，还是小组会能谈些东西。

主席问，怎么传达？总理说，是否可以带回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陈的检讨两件，共三个文件。在核心小组、军区党委常委、军党委常委传达。有人说不好保密。总理又说，保密问题可以谈通，也是可以做到的。主席说，要有步骤，大家议一下，何必那么忙呢？

九月五日下午分小组讨论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指示。五时至八时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宪法草案、全会公报。林副主席主持会议。一一通过，一致通过。

九月六日

上午大组会，通过三个文件。

十一时半，总理、康老召集大组正副组长开会，讲了几个问题：

1、传达范围、内容，规定省市核心小组、省军区、军党委常委、大区常委。内容以“我的一点意见”为准。

2、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一是要保证做到不泄密。所有大小会议的记录，一律交中央封存，个人记录、摘抄等一字不留，全部销毁，所有文件一律收回。

3、团结至为重要。

4、对陈暂不作组织处理。

5、要读几本马列主义书。康老讲：可以读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两个策略、叛徒考茨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

上述内容向小组传达了。个人记录一律由几个秘书登记，集体监督销毁。

下午，五时至六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伟大领袖毛主席出席会议，林副主席主持会议，总理、康老讲话。

一、一致通过三个文件。

二、总理讲话。重点讲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党内发生波折不足为怪。要坚持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康老讲话。主要讲学习问题。要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时要学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只认为马列主义的书是经典著作，贬低毛主席著作；一是只读毛主席的书，认为马列书可以不读了。这两种偏向的共同点，是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都是不对的。讲到受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的教训，没有马列主义认识不行，因此多读一

些书是必需的。

在康老讲话过程中，主席有两次插话。“三十本书是我提倡的，不是什么阴谋，是不是要搞三十本，这不是我搞的，这是他们搞的。我看搞多了一点。要学一点马列书，不学就会受骗。”“炸平庐山，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晚八时，有人送来两个材料，一个是学哲学的情况，一个是要天津查一查帅孟奇[注15]和什么人有联系没有？帅是叛徒，可能同天津的一些人有联系，查清后把情况告他。

九月七日

九时下庐山。十二时由九江起飞，到安庆转机，二时四十分到石家庄。天雨太大，不能再飞，夜宿石家庄。

注释：

注1　蔡树梅（女），原是天津色织四厂工人。1969年至1971年6月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1971年6月至1977年5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副组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注2　张福恒 原是天津第一机床厂工人，后任副厂长、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任，后任市环卫局副局长，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注3　赵成章 时任解学恭的秘书、市革委办事组政研组副组长。

注4　坨子地 天津市南郊区小站镇坨子地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将该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市政协委员姜德玉打成假劳模、富农分子。

注5　刘政 原66军副军长，1969年任军长。

注6　李雪峰 1960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1966年6月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至4月，到天津工作。1968年2月至1970年12月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

注7　郑维山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注8　西右营 天津市南郊区北闸口公社西右营村，陈伯达在“小站四清”中树立的一个典型。

注9　政法公社 天津市公安局文革中的群众组织。1967年2月24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

注10　黄道霞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秘书，时任李雪峰的秘书。

注11　王良恩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注12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主席语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做了修订。林彪于1966年12月16日为再版《毛主席语录》写前言，称毛泽东为“天才”。

注13　郑三生 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4　吴忠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注15　帅孟奇 1926年6月加入中共。1945年出席党的七大，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68年4月，被康生点名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内奸”，被关押7年。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组织部顾问、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者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天津市革委会主任，王辉为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有奖征集民间抗战实物档案

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好地保护散存于民间的抗战档案，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专门新建了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并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有关抗战的实物档案，包括抗战时期的书信、日记、文件、书籍、照片、奖章、证书以及其他实物等。

我局实行有偿有奖征集。对凡征集入馆的抗战实物档案捐献人均给予一定的征集费，并颁发证书；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抗战档案进行评奖，并给予奖励；对征集到的实物档案分类结集编印成书公开出版。

联系方式：023-68863589

张先生、王女士

13996376236　高先生

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2014年10月10日

我和邓力群的交往

○ 于浩成 口述 史义军 整理

2015年2月11日下午,从媒体上获知邓力群已经因病去世,享年百岁。报道中给他加了不少头衔,如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而记得胡耀邦去世后有人曾经希望给胡耀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我现在讲一讲我同邓力群的交往,他又是怎样因权力斗争的需要,由右跳到“左”的。

给邓力群当帮手

我同邓力群相识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他被派到公安部,帮助谢富治总结4年政法工作的教训。当时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长,还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邓力群来公安部以后,部里派了办公厅主任刘复之和研究室主任俞雷,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于浩成帮助邓力群写这篇文章。邓力群一开始听我们汇报,俞雷讲各地发生的案件,尤其是讲到有些地方饿死人的事实后,邓力群受到很大触动。他听后就开始口述总结报告。记得他离开了座位,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边走边说。

他说这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法部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犯了“左”倾的错误,他讲了很多事实,讲的时候从容不迫,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当时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佩服,觉得此人确实不愧是一个大理论家。当时正在召开全国政法会议,各省市三长即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都出席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在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讨论非常热烈。但此时忽然传来,毛主席看到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很不高兴,立即下令会议收回了这份文件。

在此期间,邓力群曾经与我个别谈话,当时他还兼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他跟我讲今后《红旗》有一些什么内部资料可以发给我,群众出版社有什么内部资料也可以跟他交换。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这个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负责,后来增加了邓力群。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陆续从五七干校返回原机关工作。那时,我被公安部下放在葛洲坝,在那里工作了半年之久。当时一块去的还有公安部一局的一位处长,叫白浩。听说他的老婆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搞人事工作。白浩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调到那里去工作呢?我说我认识邓力群。他们就和邓力群谈了这件事,邓力群也同意我去。当时,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邓力群说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考虑调动。

邓力群主持起草了政法部门最好的一份文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78年3月13日,我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讨论法学研究规划的座谈会。邓力群在会上做讲话,提到封建主义残余的严重性,法律同群众运动之关系,等等。那次,似乎是粉碎“四人帮”后同他第一次见面。

后来,邓力群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主要是社科院里边的一些人参加,外面也有些人被邀参加。邓力群邀请我也参加这个会。

1979年6月22日下午,我在双周会上将张志新在死以前曾经被割喉管的事情讲出去了,当时大家都十分气愤,第二天《人民日报》理论部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有这封信的原件:

于浩成同志:

昨天,在社科院双周座谈会上听了你的发言。其中谈到几个重要情况:一、辽宁省公安厅

监狱在枪决人之前切气管的详情(包括怎么搞起来的,切了多少人的气管);二、出卖张志新烈士的告密者的情况(包括现在当了什么官);三、广西南宁市那位教育局负责人打死了人,升了官,而又去主持受害者的追悼会的详情。以上几点,请你分别写成材料,拟在本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加以揭露。不知尊意如何?请考虑。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六月二十三日

随这封信,还有《人民日报》王礼明给我写的一封信,请我为他们写稿。此后,我给《人民日报》写过多篇文章,有的文章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不满,这是后话。

在双周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刘宾雁和严家其,从此,就成为好友。后来,邓力群又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时,为了解决党委不得再审批案件这个问题,他负责给中央起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执行的通知》,后来被称为1979年的64号文件。为了起草这份文件,邓力群约了我和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刘铁年我们4个人,由我来担任组长。

这件事,后来让凌云副部长知道了,他曾经找我谈话,说邓力群叫你去怎么也不通过我们?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说你去吧,有什么事你回来汇报。这份文件起草后,邓力群找胡乔木,找了很多人参加座谈、修改。最后定稿报中央批准。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认为这个文件是政法部门工作以来最好的一份文件。可是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编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看起来,这个问题在党内还是有争论的。我回到部里以后,办公厅副主任席国光找我谈话,说你们起草的这个文件不要党委来审批案件,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我说这是中央通过的文件,恐怕谈不到什么反对党的领导吧。

邓力群私下跟我打招呼,要我多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后在内刊上点名批评我

后来,我因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和一些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注意。

1981年4月7日下午,在纪念邓初民的座谈会上,我和严家其都出席了。在会上,邓力群看到了我们,他就派秘书来告诉我们,散会后留一下,力群同志有话讲。散会后,邓力群对我和严家其讲要多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算是私下给我们打招呼。

4月20日下午,邓力群派人打电话来,叫我去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办公室谈话,胡乔木也在这里办公。邓力群讲,你最近写了一些文章,有的写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话,你虽然说得对,但是中央还没有表态,你就讲了,这是不对的,讲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比中央更高明。在他同我谈话期间,胡乔木来找邓力群。胡乔木见到我就跟我讲,说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并且认识我的父亲董鲁安,说我们的面貌还很像,保留了董鲁安的轮廓。胡乔木说,你的父亲,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在一起,非常好。他也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看起来当时他们是想劝说我,让我回到他们所谓的正确立场上去。后来彼此就渐行渐远了。

1980年,邓力群也搞了一个研究室,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编了一个说文件不像文件,说刊物又不像刊物的《情况通报》,经常点名批评一些人。

1983年11月15日,《情况通报》第335期多次批评我所在单位群众出版社,并点了我的名字,如说有些书宣扬色情、淫乱。“其中公安部下属单位群众出版社出的一书问题尤为突出,全篇都是赤裸裸的性交、性技巧的描写。如果仅仅是供公安部门研究国外间谍活动,加以删节,做参考之用,严格控制,少量印行,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竟印18万册之多,向全国广泛发行,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批评和制止。中宣部早就指出这本书的严重问题,但群众出版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前两年,一些出版社以介绍‘大众化文学’为名,掀起一股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热潮。据统计,两年的时间,全国共出版了100多种这类作品,印3000多万册,仅群众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30余种,印1300余万册。其中,《福尔摩斯

1986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出席群众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站立讲话者为于浩成

探案集》共印了820余万册。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作品，先后出版了30余种，印数百万册。”“对于竞相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问题，中宣部出版局和原国家出版局，曾多次向有关出版社打过招呼，并于1980年3月发出停止出版这类读物的通知。对问题突出而又不听招呼的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于浩成），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宣传动态》对他们进行通报批评；中宣部给公安部党组去信，建议他们检查群众出版社执行出版方针的情况。从而使这股‘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热潮’基本刹住。今年，群众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日本推理小说《追捕》，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出版社出版这一类作品。”此后，我被出版管理部门多次批评，在部里多次检讨。

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发了我的材料，我差点成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

1985年2月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创作自由到学术自由》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我批评：“一些受过去‘左’的思想影响较重的人，往往仍然习惯于以政治斗争为纲，留恋于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处理人们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对于某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中的问题，往往改变不了过去一向采取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点名批判、无限上纲、围攻、撤职……行政手段和过火斗争。”接着我讲道：“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民主讨论的方法，使用粗暴斗争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即使用杀头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个人的头杀掉了，思想还在另外一些人的头脑里装着，你总不能把许多人都斩尽杀绝吧。”最后我讲道：“批评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能只让一些权威人士有任意批评别人的权利，而一般人只有挨批评的份儿，没有申辩的权利。”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一位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人就告诉我说，中宣部有人对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有意见，说文章的前一半是为王若水翻案，而后一半则是攻击胡乔木、邓力群。当时新闻界和理论界几乎尽人皆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因参与撰写并发表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年大会上的讲话而遭到围攻和撤职，而且一直不准发表他为自己辩护的文章。其实我写此文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非针对具体某个人，没想到竟有人“对号入座”。但由此亦可见，我由于一向口没遮拦，毫无顾忌，确实得罪了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并且结怨愈来愈深。

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常把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的言论印发出来，通报有关部门和作者所在单位。记得1985年邓力群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布的自由化分子罪行资料，就把我和李洪林同刊一期，可惜记不住是哪一期了。

后来，我因《镜报》的事件被罢官，事实上同邓力群的这个研究室发给公安部的几份文件大有关系。1985年6月7日，我应邀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讲学，题目是《毛泽东的法律思想》。此时罗大华教授面交给我一信，是香港《镜报》主编林文先生约见，要我讲一下法制建设问题。我意识到此事必须慎重处理，于是在返回社里后在来信上签上“是否在注意保密情况下同他谈一

1988年11月14日于浩成在家中写作

次，请指示"送交主管副部长，后来主管副部长批示同意。

6月11日，经请示公安部领导同意后我接受了香港《镜报》主编林文先生的采访，晚间在家中与林文先生见面并谈话，罗大华教授也在座。

7月10日，香港《镜报》发表了题为《"第三梯队"提法质疑——于浩成谈大陆法制理论与前景》一文，提要为：于浩成建议设立国家监察部，主张现行法律与政策允许公开讨论，认为应该强调人民的知情权，反对"第三梯队"的提法。

该文在刊登我的谈话内容时加上了11个小标题："党政不分的两大问题""经济改革要伴随立法""破除法只管百姓观念""'以法治国'竟引起争论""没有阶级就没有法吗？""律师是国家干部不通""现行法律应允许讨论""从未强调人民知情权""领导人不应害怕舆论""犯罪没有社会原因吗？""反对'第三梯队'的提法"。在"经济改革要伴随立法"这一节中，我批评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说它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口号。对经济体制改革，有些领导人公开讲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这是不行的，我很大胆地讲，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口号。怎么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呢？还是那种边建设边施工的做法，将来出了大问题再返工，损失就更大。这样大的改革，应当有一个总体规划。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外国的经验，总体规划是可以搞出来的。不能心里没数，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什么样子的呢？牵一发动全身。这个改了，那个没改，还是不行的，彼此妨碍呀！我们前几年就是吃的这个亏，比如，物价改革要伴随工资改革，但人事制度和干部制度不改革，工资改革也搞不好。

因为公安部最担心的就是我成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怕吃挂落。所以，当时给了我比较严厉的处分。

胡耀邦下台后，邓力群、胡乔木为了贯彻反自由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名单，由邓小平看过，交付赵紫阳处理。

在1987年暑期的北戴河会议上，王若水、吴祖光被定为劝退，张显扬开除党籍，苏绍智撤销党内外职务。要研究于浩成、戈扬、管惟炎时，据说讨论快到中午饭的时间了。赵紫阳看了看手表，说已经到了吃午饭时间了，会议暂停，下次再谈吧。结果下次的会，根本没有开，因此我们几个算是逃过了一劫。

1987年以后，我和邓力群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我看邓力群的"左"

1987年10月，中共举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爆出的最大新闻是邓力群落选。

这次大会，在选举上有了一点改革，给了选举人一块小小的选择余地，预选时实行差额选举，在175名中央委员的名额之外，多加了10名候选人，共185名。这个差额其实也很可怜，还不到6%。但是这6%的余地果然很有作用，邓力群被选掉了。这样，他就没有资格被列入正式候选名单，自然就当不上中央委员了。

本来筹备十三大的"人事组"给邓力群安排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既然他连中央委员会都进不去，政治局委员也就没有指望了。为了挽救这个局面，邓力群又被安排到顾问委员会去当一名常务委员。顾问委员会由200名委员组成，是等额选举，邓力群算是被选上了。但是到了选举常务委员的时候，居然出了岔子，邓力群只得85票，不够半数，又落选了。

邓力群在十三大遭到惨败的消息不胫而走，知识界许多人额手称庆。这个事实表明，即便党内高层，多数人对于邓力群所代表的"左"倾路线也都讨厌了。

邓力群的落选是他一生最严重的挫折。

邓力群早就没有把胡耀邦放在眼里，在权力角逐中，胡耀邦也的确不是邓力群的对手。不过使邓力群难以接受的是，胡耀邦下台后，上台的竟不是他邓力群，而是一个务实的赵紫阳。

最近几年，邓力群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所以很少有什么活动，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书中点了我和张显扬等人的名字。书中也给他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中央知道后，严令收回，因为中央曾有不准领导干部在外面出书的决定。回忆过去这些事，我也不想用“左”啊、右啊这样的概念来说邓力群。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是一种习惯了。原来邓力群是比较右的，是比较实际的，比如1979年邓力群的《访日归来的思索》确实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门，有些观点至今也不落后。我记忆很深的是他说：

“有的日本人说，你们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今天这样整，明天那样整呢？华国锋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要折腾了，再折腾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要没有希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也常常变。日本政局比较稳定，也有变动，内阁改组，党派斗争，屡见不鲜。可是这种变动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党内、国内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但是应当使这种斗争不是阻碍而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年我还把他的这个讲话编入群众出版社的《学习研究资料》供社内干部学习。再比如关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这件事是我最早提出来的，邓力群也很赞成。否则他也不会找我帮助他起草1979年的64号文件。还有一件事让我很惊讶，在起草这个文件时，他还跟我们讲，即使犯人被关到监狱里，但是他的选举权没有被剥夺，因此，应该设立流动票箱，到监狱去，让那些犯人来投票。当时我说邓力群确实思想还是很先进的。想不到后来搞了那么大的一个转弯，邓力群成了与胡乔木并列的“左王”。

关于他的转变，我想了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是，邓力群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一心想取代胡耀邦成为党的总书记，因此拼命向“左”转，以取得邓小平与陈云的信任。看起来这完全是权力斗争的需要，争取“上位”的需要，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需要。

邓力群去世了，加给他那样一些头衔，给了他那么高的评价，但盖棺不一定论定。作为一位百岁老人和当代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他的事功和言行还是留给未来和历史吧！我愿他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　徐庆全）

（上接第62页）天。夏收小麦虽有康拜因，但种的新乌克兰83号近一人高，遇上风雨后多半倒伏，全得拿镰刀一把一把地割；麦子刚刚割完，玉米又成熟了，得一个棒子一个棒子地掰，一车一车拉到场上，常常玉米还没有收完，一场大雪已撵了上来，只得咬着牙在雪地里干。他们哪有时间搞“突出政治”那一套！

张仲翰一向以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著称。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河北宣传动员群众，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组织起两支数千人的队伍。1946年国共和谈时，他被选任北平军事调处部高级联络员，曾与国民党代表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多次交锋。在兵团多年，无论做什么报告，他从不照本宣科念稿子，绝大多数场合干脆不用讲稿，从不说一句空话套话，总是联系实际，说得实实在在，而且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无论面对什么听众，他总能找到最适合的语言，说得深入浅出。无论什么场合，他说话总是充满热情，富于感染力与鼓舞力。

张仲翰酷爱京剧，少年时曾是票友，与许多京剧演员有交往，工老生行当，尤其对余叔岩的余派唱腔十分推崇，造诣颇深，曾私下以“最好的余派票友”自诩。进军新疆后，身为9军政委的张仲翰依然兴致不减。1950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来新疆，首场演出《汾河湾》，程砚秋扮演柳迎春，张仲翰扮演薛仁贵，扮相潇洒，行腔流畅，名噪一时。兵团组建后，他积极支持组织各种剧团，从北京等地请来不少名角，以至于据说后来戏剧界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上乌鲁木(齐)”之说。当然，文革中这也是他的一大罪状。

张仲翰一生独身，没有娶妻生子。张仲翰对人说过：“我不会因我给任何一个女子带来痛苦。”■

（作者为西安市文史馆原副馆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发生在南阳的“电报事件”

○　赵宗礼

1957年秋的“反右派斗争”中，河南省南阳专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省的“电报事件”。中共南阳地委将事件的组织者打成“右派分子”甚至“极右分子”，严厉处理了在电报上签名的多名党员干部。

事件经过

事情的起因是高征购。当时南阳专区每年公余粮任务是7亿多斤（其中仅“卖余粮”即“统购”任务就3.6亿斤），约占河南全省征购任务的1/5强，而当时河南省有8个和南阳规模差不多的专区，所以南阳地委的机关干部们认为南阳的征购基数过大。1957年春来南阳调查粮食问题的省委工作组持同样看法。由于征购任务过重，从1956年春以来，南阳的粮荒问题一直困扰着地委。尽管每年春向省里要的救济粮款都比别的专区多得多，然而农民外出逃荒要饭的现象又总是比别的专区严重得多。对此，地委领导们总是说，他们也向上级反映了，省里坚持说，南阳是大粮仓，理应多征购。可是地委机关的干部却一致认为：“在粮食问题上，地委领导缺乏力争性。”

就在干部们议论着怎样反映意见要求降低粮食征购指标时，整风开始了。整风运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号召干部们给地委提意见。运动进入鸣放阶段后，甚至规定了鸣放的大字报的张数、提意见的条数。南阳地委机关的党员干部决定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对此一事，1957年6月7日，南阳地委编的《整风简报》第5期做了报道：进入鸣放提意见阶段后运动发展很快，在地委召开的科长会议、专署召开的科局长座谈会上，与会的科局长们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且涉及党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会后，我们征求会上发言同志们的意见时，都说把心里想说的话全都倾倒了出来。为了解决南阳征购过重的问题，由农工部、宣传部党支部发起，地委机关党总支在所属党员中进行了串联。很快达成了共识，决定以地委机关全体党员的名义，直接给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发电报，反映南阳专区因粮食征购过重，造成农民逃荒要饭和大牲畜大批死亡的情况。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中央政治局并请转呈毛主席：河南省委的官僚主义造成南阳专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加之连年受灾，以至于南阳农村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截至5月底，全区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已达28914户计61457人，10万头大牲畜瘦饿而死。望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派人来宛调查处理此事。南阳地委机关全体（246名）党员，1957年6月5日。”

6月5日下午，这封电报从电报局发出。之后，大家又指定专人分头搜集材料，准备迎接检查。同时还做好了以下准备：如果毛主席对此不予回答，即以“毛主席为什么不带头接受意见”为题，再发第二封电报，对毛主席进行批评和质问。

从整风到发报，南阳地委《整风简报》（第5期）还有一大段记述：“在6月6日地委召开的科局长座谈会上，有人就当场质问地委书记林晓，关于电报中提到的南阳专区逃荒要饭的户数、人数和大牲畜死亡的头数，过去是地委的官僚主义真的不知道呢？还是比谁都清楚，就是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呢？问得林晓书记面红耳赤，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其间，共青团地委秘书张用璋的大字报中，除了引用了电报中透露的近3万户近7万人逃荒要饭的人数和10万头大牲畜死亡的数字外，也尖锐批评了地委在粮食工作中不拼力为百姓说话，缺乏群众观点这一问题。地委办公室干部张培连春节期间回农村探亲时，发现了农民们普遍严重缺粮的问题，回来向地委主要领导反映后，即被批评为‘污蔑合作化后的大好形势’受到严厉的批评。地委机关联名签字给中央拍

发关于粮食问题的大字报后，张培连认为在此问题上自己比谁都反映得早，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了委屈，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地委办公室的几位干部也采用大字报的形式，鸣放批评了地委在粮食问题上只向上级反映好的，不反映缺点和问题的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不少干部趁机对地委主要领导在粮食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和不民主作风提出了狠狠的批评。”这份简报不仅可以看出在“鸣放阶段”南阳地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们的民主的热度，也可以见证当时的南阳地委领导是支持，起码是同意向毛主席拍发这封电报的。

时任共青团南阳地委秘书的张用璋（右）在接受作者采访

急转直下

然而，整风运动由开始说的“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一夜之间逆转成了“反右派斗争”。“电报事件”的主要发起者和串联者都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十几个引用此电报内容的鸣放者也被戴上一顶“泄露党的机密错误”的政治帽子，受到了严厉的组织处理。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电报反映下边实情，竟是“犯了泄密错误”，进而被打成右派，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然而这却是真的。

所幸，此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健在时，我分别采访了他们，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地委农工部秘书丁林是“电报事件”主要发起组织者之一，2011年秋，他虽已经83岁高龄，可头脑仍很清楚，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记忆犹新。丁林和农工部的其他干部如沈静宾、王国河、苏继泉和宣传部等人在多次深入农村中，实地了解到农民们缺粮的严重情况，在党小组内达成了共识，一致同意个人出钱拍电报，以农工部党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反映南阳农村实情，请求中央直接派人来南阳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他们同一个党支部的宣传部的党员及支部负责人知道后，提议以党支部的名义发这封电报。丁林认为这样更好，参加的党员越多，越说明反映的问题准确，越能引起中央重视。王国河草拟了一个电文草稿，丁林反复修改并征得支书同意后，赞同者一一在电文下边签字。参与签字的党员们都十分认真和严肃，深知这既是鸣放提意见，更是告御状呀，所有事实一定要经得起调查和历史的检验。那时候，南阳地委机关的干部们大都是单身汉，地委机关餐厅成了各部委交流信息的集散地。农工部、宣传部党支部要给毛主席发电报反映粮食征购过重一事，被地委办公室、组织部支部的党员干部知道了，一致要求加入签名的行列。他们说，如此既帮着党整风又为农民请命的好事，我们党支部的党员们也得参加！工会妇联青年团、报社和新华书店的党员也都强烈要求加入签名行列。地委机关党总支书记何凤德请示地委书记林晓定夺。林晓说，党员给党中央直至中央主席反映情况，这是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民主权利，更何况现在是大民主时期，我们怎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呢？于是何凤德专题召开了地委机关党总支会议，决定以地委机关全体党员（246名）的名义发这封电报，这才平息了为签名引起的争吵。

丁林清楚地记得，发电报得到了时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范广畯、时任地委机关党总支副书记马百川和当事人之一的张用璋等人的赞同或认可。大家以为这件事一定会引起毛主席重视，起码会引起中央书记处重视。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天，他们就叫王国河等人分头搜集材料，以便中央来人时做好汇报事宜；同时密切倾听天上有没

有飞机的声音，一旦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便有人立即骑上自行车飞驰向地处北关的飞机场，察看是不是来了像谭震林这样的高级领导；其间，他们还特别注意从北京或郑州来的电报、信件、电话，或有没有从北京、郑州来的高级小轿车……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是“反右”！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和“合作和优越性”大讨论后，地委领导在“深入反右的会议”上说：“‘电报事件’是一次背着地委领导，借整风运动之机，污蔑大好形势，攻击合作化运动和粮食政策的反党事件。”参与“电报事件”的所有党员（自然地委几个主要领导除外），人人都要交代自己签名的思想动机，写出深刻的检查。每个党员只能违心地承认是自己的“思想问题”；发起组织者当然就是“右派分子”或“右派行为”了（主动“投降”者例外）。积极串联此事后又坚持自己没错的沈静宾、苏继泉及宣传部的邹慧贤等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即“双开”）处理，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多年；丁林是副处级干部，他的右派帽子地委需报省委批准。而主管右派审批的常务副书记杨珏两次来南阳时，都是丁林鞍前马后服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地手下留情，即使如此，也难逃厄运，改划为“中右”，开除党籍，行政降3级，发配到方城县边远农村监视劳动。

1960年底，“民主革命补课”（即“拔钉子运动”）开始后，奇缺整理文件的写手，此时已经饿得下肢浮肿的丁林才有幸重回机关当一名“临时借调人员”，直到1979年才得到“改正”，恢复副处级待遇。帮着党整风和为民请命，不仅使丁林丢掉了党籍、官帽，还差一点丢了性命，直系亲属因他而影响政治前程的有一大串人。1957年8月13日南阳地委上报省委的《关于南阳党员在鸣放和反击右派斗争失泄密现象的报告》中，又把引用电报上数字的鸣放者定为“泄密错误”。该文是这样说的：南阳专署行政办主任葛清轩，在鸣放大字报中批评副专员杨祝三不实事求是地执行粮食政策时写道：据可靠数字，全区到5月底发生逃荒要饭28914户计61457人。同样，地委机关干部刘恒斗、丁士颖、张用璋也在大字报中泄露了上述数字；农工部等部门集体联名以明码电报的形式将区内逃荒要饭、耕牛死亡数字反映给中央，也属于暴露了不该暴露的东西。因为葛清轩在地委座谈会上还说了在粮食问题上“地委打肿脸蛋充胖子，只顾上，不顾下”，1957年春省里同意向南阳发放4000万斤返销粮，80万元救济款。而地委领导们闻讯后说，向省里要那么多的粮款这是否定南阳地委领导救灾工作的成绩，亲自给省委领导打电话说，这仅仅是南阳行署救灾办的意见，不代表地委，要求把返销粮和救济款都各减半发放。因有此段“揭露批判”，后来便借助“电报事件”，把他划为“极右+反革命分子”，“双开”后贬到城郊乡王营养猪场养猪。其结局，一说1960年春饿死，一说死在南阳城里市场街市场交易员位置上。1979年“改正”时，整风反右时强加给葛清轩的所有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翻，受他的影响而被贬到边远山区的6个子女，才得以重回南阳城里工作。团地委秘书张用璋因在大字报中引用了“电文”中的“阴暗面数字”，加之在大字报中有“地委小灶香满口，万家流落在外头”等官民对比的词句及“地委领导在粮食问题上不为民做主”等尖锐批评言论，而且还“顽固不承认错误”，便被划为“极右”，“双开”后发配到内黄县白条河农场和桐柏农场劳动改造多年。地委机关为“电报事件”牵连被打成“极右”、右派、“中右”和受到严厉组织处理的共有18人之多。就连那个曾请示过地委领导，专门召开过机关党总支会议，得到会议授权，具体办理发电报的何凤德，也是靠做“愿打愿挨”的“黄盖”过关的。

饥荒加重

南阳地委对“电报事件”的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不仅在粮食和民生问题上集体失语，也助长了地委领导在粮食统购上的独断专行。直至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全国基层干部的一封信中批评在粮食产量上说大话的行为后，南阳地委的浮夸风才稍有收敛，面对着当年秋季主要是由于“大锅饭”“大呼隆”的生产管理体制，加之当年秋天的旱灾，做出粮食产量比上年秋可能减半的预算。1959年8月底，南阳地委向省委写了一个要求秋季征购任务减半的报告。报告说，如按照原基数完成征购任务，全区将缺粮7270万斤。该报告是地委第一书记林晓陪同主抓粮食

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在省内考察多处后，经史向生授意写成的，原计划9月份赴省开会时正式向省里提出来。可是，1959年9月“批彭”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后，为了显示“三面红旗的优越性，跟彭德怀对着干”，南阳地委不仅不再请求省里减少征购任务，反而主动提出当年秋季的征购任务要超额、超额、再超额。对此“南阳地委常委会记录”是这样记载的：“1959年10月28日晚，南阳地委在传达省委书记处关于粮棉油征购工作的指示时，林晓说：‘现在我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已经超额完成10%了，是否可以再超一点？’地委副书记杨林波说：“‘如果用红薯干代替的话，可以再超一点。’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同意了林晓的意见，决定再多卖红薯干1000万斤。林晓最后表态说：‘就按这个数字卖！比去年秋季卖的总数多不多？’主抓粮食征购的副专员杨祝三说：若再增加1000万斤的话，就比去年秋季净增200万斤。’林晓说：‘今年红薯长得好，同时又比去年收得好。去年虽说大丰收，由于大办钢铁，红薯刨得差，今年春上不少地里还有去年的干红薯。所以我说今秋再多卖1000万斤红薯干，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意见，还可以争取再超额一点。也就是说，除了增加3%外，把超额的1000万斤作为保证数，甚至还可以再超额一点。’”结果，最终超额2500万斤，这样一反一正的结果，等于多征购了近亿斤农民的口粮。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1960年2月16日，南阳大地一片饥荒，绝大多数食堂都揭不开锅，饿死人的现象正在大面积出现，此时此刻的南阳地委却向全区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通知》，批发了地委讲师团总结的《唐河县源潭公社学习毛著的经验》；同时，批转了《关于公社以上党员干部的整风报告》，通报处理了1959年10月以来，在粮食问题和对“三面红旗”认识问题上“有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的干部637人”，大都是撤职或受到党纪处分。在2月21日至2月25日传达省五级干部会议精神的地委扩大会议上，第一书记林晓还在大唱高调：“目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国内形势也很好，人民公社已经巩固，正在持续全面地实现新的跃进。我区食堂停伙的现象已经基本解决，浮肿病现象基本上得到控制。”而实际情况是，用“饿殍遍野”来表达当时的惨状，恰如其分。直到4月15日，南阳地委才发现（或者才敢公开承认）原来谎报的80%以上的“余粮队”，实际上都是缺粮队，才开始“下水救人”。应当说，后来采取的诸多救人措施还是很管用的。但是，“船到江心补漏迟”，南阳高征购的结果造成了当年锐减人口69.7万人，按照公安处内部数字计算更多。这个有史以来一直被称为“大粮仓”的南阳盆地，1960年饿死人的数量仅次于全国第一的信阳专区。

补记：丁林2014年去世，范广畯、马百川、张用璋等知情人还健在，2011年以来我多次采访了他们。本文参照了有关档案。■

（作者为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责任编辑　王彦君）

2015年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文学及小说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游记、通讯等；历史、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②**社科、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③**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行政、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和学术专著；④**美术类书稿：**画册、书法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08-8708　　传真：010－6573503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牛萍萍、文馨、王双(编辑)
约稿详情、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zuojiaba.com
投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座515　编辑中心收(邮编：100024)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业作家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品以图书、光盘、摄影集、视频等形式发行；● 咨询热线：400-608-8708　　邮箱：bookzj@126.com

★咨询即有精美新书赠送(有限量)！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胡耀邦在陕西的新政及其结局

——读李大斌《1965:胡耀邦早春行》

○ 吕克军

李大斌先生的新书《1965:胡耀邦早春行》(以下简称《早春行》)记录了胡耀邦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执政时很短的一次“新政”,并为此遭到批判和整肃。该书对当时的复杂斗争记载之详尽,为其他著作所鲜见。

一

1964年11月6日,由于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胡耀邦被中央任命为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曾长期在刘少奇、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刘少奇的矛盾渐渐发展,经“四清”运动,两人的分歧日趋激化,呈胶着状。刘澜涛长期作为刘少奇的下属,自然倾向于刘少奇的各项措施。

胡耀邦的接任显然是一直赏识他的毛泽东起了主要作用,但这也同样让准备接任者大失所望,因此在胡耀邦到西安的当天,他反而到咸阳去了。

《早春行》记载:临别之前,耀邦去拜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深知他敢说敢为的秉性,劝告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真是意味深长。

但胡耀邦似乎没有听进去,在12月3日的省委常委会和之后的座谈会上,他大谈陕西“领导生产因循保守、小手小脚”,“陕西有一股保守势力,压制一切新鲜事物”。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日刘澜涛和胡耀邦的谈话。刘谈了几个问题,分别是:西北地区封建地方主义严重,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训练干部;三线建设;少数民族问题。点出了胡耀邦到陕西的工作重点。

12月1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社教工作会议,刘澜涛、胡耀邦都参加了。在20日的会议上,毛认为“四清”中主要矛盾是“当权派”,“就是要搞大的”。刘少奇则认为“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刘澜涛附和刘少奇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一些地区市县领导烂掉或基本烂掉的占45%。之后的会上,两位主席发生了严重冲突,毛甚至拿着《党章》向刘要言论自由。

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23日,胡耀邦和刘澜涛谈的还是陕西农业如何提高的问题。第二天,他又写了9000多字的《走马到职报陕情》上报中央,写道:“全省已经清洗(即双开)了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西北实行的“民主补课”、补划漏划地富成分的问题,他提出“土改时确系地富成分,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庭已经一般,本人老老实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他还指出“这几年陕西的农业相当的落后了”,“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同志对组织和领导集体生产有保守思想”。

胡耀邦还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向周总理反映陕西的困难,把陕西征购的任务减了下来。

这些,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1965年1月9日,胡耀邦在《陕情简报》上的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得显著成效》文章上批示:“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做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

有？”“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暂停一下？”

22日，胡耀邦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一、“社教”有5个缺点。“双开”急了一些，多了一些；打击面广；斗争的面、打击的面偏严、偏宽；对广大群众伤了感情；我们发动群众不够，政策交代得不好，还死了一点人。

二、三个暂停。抓人上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

三、“四清”怎么搞？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要把政策交给他们，交给群众、交给干部，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实劳动的，没有做坏事情的，不要补划了”。

1965年冬，胡耀邦与警卫员谢方武在陕西

四、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文教、财经，搞点乐观主义。增产14亿。一个抓粮食，一个抓棉花。号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

二

胡耀邦的安康之行就是他为实行“施政纲领”而进行的一次“新政之旅”。为什么首选安康？《早春行》中提道：1965年1月5日，省民政厅给省委报送了一份《关于当前生产救灾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称“去年我省夏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1059万人，秋季成灾地区的人口有745万人，灾情较重的县有33个，其中以安康、宝鸡、商洛3个专区的一些县比较严重”。这可能是胡耀邦首选安康视察的原因之一。在安康，他分别调研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白河、平利6县和安康市。一路走来，谈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发展生产，唯独没有当时的“主课”——阶级斗争。

农历正月初五，胡耀邦轻车简从，不顾一路雪霜，奔往宁陕县。他对县领导说：第一要抓粮食，第二要抓山货特产。还指出：商业工作没有打开局面。搞社会主义价格政策不对头，生产就上不去。短暂的时间里，他还上街看了“市面”，看到躲躲藏藏地卖东西的百姓，他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他讲了之后，老百姓便开始进城卖菜、卖柴了。

在石泉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说：“社教”上“和稀泥”，“该斗的还是要斗，不该斗的就不斗，叫我说不斗，我不敢讲这话。”“以后你们要不要斗呢？那不一定，你们要看该斗不该斗。”对于生产，胡耀邦则大胆地修改了毛主席的“以粮为纲”，讲：“我的意见，以后提生产方针，以粮为纲，农林并举。”讲到动情处，他大声说：“把生产搞上去为了谁？为了13万人民翻身。”

在汉阴县委扩大会议上胡耀邦直奔主题，说：你们县上抓了8个人，开除了40个，今天我们来个政治民主，大家来讨论，看他们有没有错误，处分重不重，结果冷场，没人敢发言。胡耀邦说“二十三条”第十五条讲的就是给出路，反右严重错误的干部，可以不再当干部，不再当党员，可以当社员。他还没忘了补充“给出路，这是毛主席说的”。

几天之后，判刑20年的凤亭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被释放。

旬阳县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商品流通受到限制，当地有一种龙须草历史上一直销往湖北，但在当时必须有专区的批准手续才能运出。胡耀邦听

后大发脾气:这是蠢!死官僚!我对商业工作的意见大。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我们的商业在一些地区流转上太不负责任了。

在旬阳,他鼓励发展山货土特产,指出山货土特产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加工问题,一是商业价格问题。

在白河县,他除了讲发展生产、解放干部外,还着重讲了当时的在西北风行的“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当时西北地区在“左”的政策下,大量补划地主、富农成分,一时人心惶惶。他问县委书记梁湛山:你们白河土改时划的地富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几?

梁回答:占百分之六七。

胡耀邦讲:地富占百分之六七,比例不小嘛,土改时规定,地富成分一般占总户数的比例是5%~7%,现在就不要再多划地主、富农了。对个别的要划,但也要对表现好的摘些帽子,要收支平衡嘛。摘帽子,应在5%~15%左右。划也不要多划,这些都要经过群众讨论。如摘帽子有200户,戴帽子100户。白河的民主革命是彻底的。今后机关、学校不要查成分,学校不要提依靠贫下中农,文化馆也不要提依靠贫下中农。

在平利县,胡耀邦试图用包工包产的方法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他说:一个生产队种两亩棉花,包本不包产,包工到组,减产不赔,超产奖励。这时他自然不敢讲“包产到户”,只能隐晦地提出“包工到组”,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风雨如磐的形势下,这是需要大勇气的。

在安康专区,他连续参加了安康县扩大干部会议、专区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安康专区机关干部和安康县干部会议,反复宣讲提到解放思想、解放人、发展生产的精神。

讲话振奋人心,迅速在群众中传播,一潭死水被搅动起来。

13日晚至14日凌晨,胡耀邦彻夜未眠,口述了5条紧急《电话通讯》,这是一篇珍贵的史料,节录如下:

现在是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采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那么,今年的生产计划就要落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省委和地委派到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必须立即同县委一起,共同负责地对县的社教工作做出肯定的估计,说清楚哪些问题做对了,哪些问题有缺点,并且明确向大会宣布,以便统一思想。只要大多数同志同意,即使将来证明某些问题说得不尽恰当,也一概不追究责任。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二十三条”中关于干部问题的政策,应该向到会同志明确宣布:(1)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2)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做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学习和讨论“二十三条”要抓住精神实质,要明确和解决几个主要思想问题,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搞烦琐哲学。学习和讨论到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转到讨论今年的生产问题上去。

今年我省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

要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我们沿路看到一些城镇冷冷清清,手工业不兴旺,没有就业的人不少。必须认真加以解决。解决的主要办法是:(1)活跃集市贸易;(2)发展人力畜力的短途运输;(3)切实解决手工业的原料供应;(4)改进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关于集市贸易问题,要明确告诉大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业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

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算大账,抓关键,向前看。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不开阔,在政治思想方面抠得过碎,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过窄。应该号召大家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放得大一些,在领导生产方面想得宽一些。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放得大一些,主要是:(1)不要着重历史问题,而要着重现在的表现;(2)不要着重“洗手洗澡”中

已经交代出的问题，而要着重今后的问题，着重“将功补过”；(3)不要着重枝节问题，而要着重注意大的关键问题，注意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

这正是胡耀邦到安康一路走来的所思所讲，其政策内容着重点是解放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扭转到生产上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两手抓，大力发展集市贸易，解决商业、交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看来他在安康点起一把火后，准备将其推向全省了。

1982年10月，胡耀邦与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

三

出乎耀邦的预料，这时一场黑雾已经迷漫。第二天，胡耀邦的“老朋友”，时任陕西省委文教书记的舒同和汉中地委就发生了争论，舒同坚持认为陕西“民主补课”很有必要。

2月16日晚，刘澜涛与杨尚昆通了电话，认为胡耀邦《电话通讯》有不当之处。

刘澜涛很快就把胡耀邦的“问题”上报给了中央。第二天，他与彭真通电话，就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内容交换意见，认为“干部4条”处理办法不妥当，会引起翻案风。彭真问为何不请示西北局？

接着，刘澜涛同在汉中的胡耀邦通电话，告诉他《电话通讯》内容里有些不妥当的地方，会使下面产生混乱。胡耀邦表示，“不会吧，可以注意”。

这时的胡耀邦还在汉中、宝鸡宣讲《电话通讯》的内容，汉中和宝鸡地委都非常同意。

但到22日，他视察咸阳时，咸阳地委书记当面向他提出反对意见。而胡耀邦仍未发觉一场对他的“围剿”已经悄然开始。

23日，刘澜涛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警告“‘干部4条’可能引起翻案风”。

27日下午，刘澜涛又接到彭真电话，彭真通知了刘关于中央、主席对胡耀邦同志《电话通讯》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同意西北局的意见，并由西北局讨论。原来，13日胡耀邦起草的《电话通讯》下发陕西各地执行后，西北局就上报了中办，中办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后说：除了“干部4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毛、刘两边都不待见，胡耀邦注定会陷入窘境。

有了中央两个主席和彭真的批评，刘澜涛立刻在西北局开展了对胡耀邦的批判。

27日当天，刘澜涛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说“干部4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23日的“可能”此时变成了“肯定”。

28日，胡耀邦被迫写出检讨信。3月2日，刘澜涛回信，说道：“工作中出了一些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手法纯熟，“安慰”中确定胡耀邦犯了“错误”。

到了3月7日，西北局就召开了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胡耀邦的批判。第二天下午，刘澜涛和胡耀邦谈话，指出4条缺点：省委1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电话通讯》中的“干部4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已是一副对胡耀邦“清算”的姿态了。之后几天，西北局连续对胡耀邦批评，11日，胡耀邦被迫做了检讨。3月16日，陕西省委宣布停止执行《电话通讯》中对干部处理的4条意见。

18日，胡耀邦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进了医院。但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当月，舒同到下面调研，发现“胡耀邦的错误严重，立即加以制

止，同时写信向省委反映情况及提出纠正措施”。刘澜涛还和有关人员谈话，“指出对有错误的干部要有耐心帮助”。并于30日把胡耀邦的检讨信和自己的复信分送邓小平、彭真，在给小平的信中说：“耀邦同志到陕西后，热情很高，急于想把工作做好，出了一些毛病。经过中央指示，西北局开会讨论，耀邦同志认识了错误，提出了改正办法，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请中央勿念。”当晚，西北局就召开会议讨论胡耀邦的检讨。第二天，西北局书记处的批胡会上，杨尚昆居中调停，总结情况，说：“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

如果与人为善的话，此事应该就过去了，但事态还在发展。

5月24日，刘澜涛到丈八沟招待所与杨尚昆畅谈，共进午餐，在谈话中对胡耀邦的思想状况很感不当。26日，让王甫转告胡耀邦彭真同志2月27日意见，说过去忘记告诉胡。

于是，从5月30日至6月18日召开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又开始对胡的批判。这是批胡的第二个阶段。会上，舒同做了长篇发言《我们必须分裂》，抨击胡耀邦对抗西北局的批评。舒同后来回忆：“胡(耀邦)、赵(守一)企图蒙混过关，我曾单独促使赵守一召开一次常委会议，由我首先揭发胡的错误(讲了半个钟头)，使胡不得不抛出他的8条(总暴露)，为以后展开全面批判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个8条就是胡耀邦6月11日在陕西省委常委会上做的一个包括8个问题的辩驳。胡耀邦认为：“三个暂停”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如此；对社教并没有夸大缺点；不同意说光抓生产没抓革命，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革命；不同意少征购，向中央要点化肥就是“物质刺激”。

这时，省委副秘书长林牧等几位忧心时局的干部看不下去，分别于5月28日和6月18日写了两封反映情况的信，通过田家英报送中央，但并未得到支持。

关键时刻，叶帅和张爱萍将军来到西安，张爱萍讲：“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叶帅了解情况后，于6月20日带耀邦返回北京。

由于第二阶段的会议没有达到目的，西北局又召集第三阶段的会议，从7月13日至8月4日，史称“兰州会议”。这次的会终于开出了一个大“成果”。7月31日，舒同在会议上揭发了胡耀邦对刘少奇的“错误言论”。事情的缘由是：胡耀邦在第一次被批判后病重住院，当时舒同也在住院，两人闲谈。胡对这位“老朋友”讲了毛、刘在“四清”上的分歧。1964年11月刘少奇批转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的“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舒同据此认为“四清”中要反右；胡耀邦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舒同揭露了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演变成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

7月27日，杨尚昆给刘澜涛打电话，之后转来了胡耀邦给邓小平、彭真的两封“告状”信。

8月2日，刘澜涛将“兰州会议”上一些人揭发胡耀邦的材料报送中央，并给小平、彭真写信：舒同同志1965年7月31日在西北局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值得重视，先送中央同志参考。舒同同志发言中揭露出胡耀邦同志的许多错误事实，其中不少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其中讲的“错误事实”便是胡耀邦议论少奇同志的那句话。

9月16日，邓小平在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后约谈刘澜涛，彭真、杨尚昆参加，明确胡耀邦不再回陕西工作。10月2日，中央免去胡耀邦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霍士廉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6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找胡耀邦开会，对胡耀邦说：“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耀邦说：“中央能否给我做一个结论？”邓说：“没有必要。它是一级党委，中央又不能解散它。”

10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中毛问陕西生产总上不去原因何在。刘澜涛解释为关键是革命不彻底，革命不彻底的关键是省委少数领导人的错误。并对胡耀邦所犯错误做了说明。毛泽东讲：胡不革命如何回去？是谁主谋、出谋划策？刘澜涛无言以对。

毛对这里面的微妙之处心知肚明，在耀邦生病住院时还专门从北京派人到西安为他治病；“胡不革命如何回去？”直奔主题；又问“是谁主谋、出谋划策”，一语双关，难怪刘澜涛当时没有回答。

但刘澜涛回西北后，对胡耀邦的批判并未停止，一直持续到1966年3月，在邓小平的过问下才停止。而此时距文革爆发已不足百日。 （接下页）

我读过曾彦修的“三万言书”

○　邓伟志

我与曾彦修可算是两代人，彼此有距离。他在上海编书时，我认识他，他可能不记得我。

1978年，他是大百科总社的领导成员，我是大百科上海分社非领导成员，接触很少，只是一起开过几次会。他是杂文大家，我是杂文不成家。他指导我写杂文，大概有两次，一次在杭州，另一次在北京。可是，他到人民出版社以后的1984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办别的事，因而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曾老。当时他命我坐下来看他写给胡乔木的将近三万字的申辩书，还谦虚地叫我给他提意见。

我捧起他即将上送的厚厚的打印稿，开本好像是八开，有两本并列的《炎黄春秋》那么大。读完之后，佩服之至。我深感这才是学者应有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具体的情况《炎黄春秋》2015年第4期上张惠卿的文章中已经写到。我仅就记忆所及，补充一点。在“反自由化”风刮起时，胡乔木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批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曾彦修写道(大意)：“这套书是文革前就已经定下来出版的，并且已经出了一部分。”看到这里时，我急不可耐地对曾老说：“这套书我文革前就看过。我们称其为‘灰皮书’。”曾老说：“你继续往下看。改革开放的今天，怎能比文革前还‘左’呢！”接下来，申辩书写道：“在这次出版前，我们出版社向你、向中宣部请示过，你批示‘同意’。”这一真相的披露把胡乔木的批评动机打了个大问号。好像曾老还用了“出尔反尔”一词来批评胡乔木。

接下来，曾老写道(大意)：“请不要动不动就给我们这些老家伙扣大帽子。我们对党、对国家是忠诚的。”后边述说了他在延安与胡乔木相处的日子。意思是：我们彼此都是知根知底，不要轻易怀疑。曾老又写道：“我是抓紧工作，想在有生之年赶快为国家做点事情。”下面一句是：“我常常是在深夜一边啃冷馒头，一边看稿子。”我看到这里泪如泉涌。我们中青年真应该好好向老同志学习！

申辩书中，曾老还提了一笔，他最近化验有个什么细胞怀疑。只因我缺乏医药知识，不懂得，也记不住那细胞的名称，但我猜想是癌细胞，便不忍心多问。曾老反而问我：“你看这句话写不写？”后面大部分是曾老对意识形态工作发表的宏论。

过了一些日子，我问曾老：“申辩书送上去以后有什么反应？”他说：“胡乔木让他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只这么一句。”至于张惠卿文中讲，胡乔木“基本接受”，也许是再过些日子的事情。

曾彦修的“三万言书”想必还在，盼知情人对我的上述回忆指谬。如果这份申辩书能发表出来，那更是对历史负责。■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十年浩劫中，无论被整者还是整人者，都被押上了批斗台。胡耀邦被批斗，下放“五七干校”之后赋闲在家；刘澜涛被斗并再次入狱，一段时期内竟失去语言能力，夫人惨死；舒同先是被揪到山东，后又被抓到西安，关在监护管理所。

1972年10月17日，为父亲平反的事，舒同的女儿舒均均到耀邦家中，当时耀邦正接待客人，心情忐忑的舒均均没等他忙完便悄悄离开。几天后胡耀邦给她写信，其中写道：

你既然下定决心来找我聊聊，为什么不再下决心等我一下呢？你把你爸爸和我的关系问题放在心上，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即使我们双方(注：指他和舒同)之间还不相互了解，这同你们做儿女的，毫无一点牵连。我们这一代老了，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比你们更年小的下一代，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斗争，大世面，知识和经验很难比你们更丰富，更深刻。你们这一代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加倍学习，加倍动脑子，千万不可被暂时的困难迷失方向，随波逐流！

待其如故人之子，情谊跃然纸上。文革后，胡耀邦不失赤子之心，拨乱反正，为包括刘澜涛、舒同在内的历次运动受害者平反。■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芬兰政府这样管理高等教育

○ 阎忻民

一个面积不大而教育领先的西方国家

一个地处北欧，面积不大的国家，201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刚刚公布，在对65个国家的中学生的3项测试中（阅读、数学和科学），它的学生综合成绩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中名列第三。自从2000年首次使用PISA考试，在这项每3年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学生做的测试中，这个国家连续4次拔得头筹。这里的教育全部免费，每个学生都有经济补贴，政府财政支持高等院校的教学和科研，但是决不干涉其学术活动。

它就是芬兰。一个近年以科技创新引起世界关注的北欧国家。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分别占GDP和政府开支的6%和10%以上，政府对公民的教育开支年人均在2300欧元以上。他们提供同质教育，是世界上同一国家内，地区间教育质量和学生间成绩差异最小的。

高投入产出了高质量人才。据芬兰统计局报告，1991年，每千个芬兰人中有29人从事研发工作，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77人。如此高比重的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论坛撰写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在全球竞争力综合指数排行榜上，芬兰名列全球第五，在高等教育和培训以及创新力指数上，芬兰名列全球第一！

赫尔辛基大学的凯萨图书馆　摄影师：Atte TannerOKM

所有这些都归功于芬兰教育的成功。最近几年，到芬兰取经的教育工作者、学者纷至沓来，即使像高等教育世界排名第一位的美国，也对此给予了强烈的关注，从联合国发展署的国际组织，到大学研究机构、新闻媒体，无不将芬兰的教育体制和实施方法视为成功典范。

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其实，60年前芬兰的现代教育体系还未形成。1945年二战结束后，芬兰国土12%被割让给苏联，45万芬兰人被迫移居。苏联驻军在芬兰半岛，对芬兰政坛和制度的暗中影响无时不在。当时的芬兰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全国60%的地区为农村，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反映在教育上则是，没有9年义务教育，多数人只完成了小学6年教育，只有25%的适龄学生能进入中学；公立学校数量严重不足，只有1/3的中学是公立学校；城乡差距大，绝大多数中高等教育学校分布在城市；学校教育不是以儿童为本，偏重记忆式教学。

基于此，1945年，芬兰政府开始改革教育体系，先从小学授课内容入手，之后是中学，最后着手改革学校体系，扭转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低下的局面。虽然实施中间有挫折，但是至1977年，基本废除了所有私立学校，在全境内建立了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私立学校即使存在

阿尔托大学的学生正在做核子共振的脑部实验
图片提供:阿尔托大学

也是附属于宗教或者其他团体,同样享受政府全额拨款,同样遵循不分背景的平等教育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实行公立教育并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变化,而是为了体现芬兰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即教育是培养文明公民的途径,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不是为精英服务,好学校不是只为好学生准备的。

在建立高等教育体系上,芬兰借鉴了他国的先进经验。1917年独立前,模仿较多的是瑞典和俄罗斯的做法,独立后又借用了德国的方式,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又学习了美、日、丹麦等国的经验。从1640年第一所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创立开始,经过近400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截止到2014年,芬兰共有14所研究型大学,24所应用技术大学,6个大学中心和3所特别大学(阿兰德应用科学大学,警察学院和国防大学),加上芬兰科学院等各类科研机构,教学和科研体系十分完善。据芬兰教育部2014年的统计,2013年,芬兰20岁至29岁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是40%,2011年,全国从事研发工作的人数达到54526人,占总人口的1%,就业人口的3.3%。

芬兰教育从学前开始直到高等教育(至博士生)阶段,全部免费,全部由政府财政承担。除不收取学费外,9年义务教育期间,政府免费提供午餐和书本费;高等教育期间,政府提供食宿补贴和低息学生贷款。

人人拥有平等的教育权利,这是让芬兰人最引以为豪的一点;而政府资助、高校自治、学术自由、全面的助学保障体系,是芬兰高等教育区别于他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1. 政治不能干预教育

芬兰地处北欧,东临俄罗斯,西毗瑞典。从1323年瑞典诺夫哥罗德协议到1917年从俄罗斯管辖区独立建国,芬兰被俄罗斯和瑞典占领统治近600年。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政治地位,芬兰一直夹在东西方之间,二次大战采取的反苏和亲德立场让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战后的芬兰政府对如何重建国家、振兴经济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芬兰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政府也认识到,国家经济发展取决于国民教育水平,因此教育发展应优先。基于这个认识,各政党达成一致意见:教育政策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成为政党轮替的牺牲品。正是这个英明理念保证了芬兰教育政策在战后70年的连贯性,即使在执政党更替、政治倾向有差异的情况下,优先发展教育的政策始终未受影响。

从1945年教育体制改革开始,芬兰政府持续稳定地发展了一套有芬兰特色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让每个芬兰公民完成教育。完成教育,不是简单地指接受教育,而是意味着每一个出身(社会地位)不同、背景(宗教信仰)不同、财富不同、资质(智商天赋)不同的人都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9年义务教育。教育部门缩小先天条件不同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如提供特别教育的老师,事前干预学生的心智发展。

连贯的教育政策保证了芬兰人才数量的储备和质量的提升。据芬兰教育部2014年的报告,在25岁至49岁年龄段的人口中33%完成了大学教育。2009年至2012年间,芬兰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欧洲第二,仅次于瑞士。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芬兰经济腾飞,令世人刮目相看,出现了如诺基亚、Vertu、松拓(SUUNTO)、通力(KONE)等众多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品牌。而创造出风靡全球的“愤怒的小鸟”动漫形象的ROVIO公司,2003年成立,雇员人数仅有800人,则代表了芬兰未来发展的另一方向——创新产业。这些成功不能不归结于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出的高质量人才。

2. 法制保证，信息透明

目标的实现不是仅靠心愿和政策完成，管理上，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和依据。对高等教育任何方面的改变都必须通过高等教育立法、国家教育科研发展计划、基于质量给予的财政支持、业绩认可协议和质量保证措施办法等实现。

从1866年的第一部《基本教育法》开始，150年间，芬兰议会制定和通过了百余个有关教育的法案和法令，涵盖了教育的各个方面。针对教育的不同阶段：学前教育、小初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有《基本教育法》《中等教育通法》《职业教育和培训法》；针对高等教育类型，有《应用技术大学法》《大学法》；针对教育政策的执行者——教育部、教委、考试委员会、评估委员会，有《教育财政法》《教育评估法令》；针对教育主体各方——校长、教师、学生等，有《学生申请学校法令》《国家专业资格认定法》。此外，《公司法》《会计法》《审计法》等基本法也适用于教育管理。

在所有法律中，对芬兰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大学法》《教育财政法》《教师资格法》和《学生财务资助法》。这几部法律就政府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高校的职责、政府预算拨款、大学自治地位、学生权益和教师资质做了明确的法律表述。

芬兰法律要求政府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任何人都可以在政府或者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查到所有法律条文、政策规定以及财务报表。在网站上可以轻松查到历年全国全部科研经费的来源和支出去向，每所大学获得的政府财政和开支金额。此外，独立的评估机构和审计部门会定期到接受政府拨款的大学和机构，检查拨款使用、财政资助效果和效率，拨款金额公开，评估和审计信息透明。

阿尔托大学建筑与园林系的学生正在与指导教师讨论设计作品　图片提供：阿尔托大学

3. 政府放权，学校自主

芬兰管理高等教育的政府部门结构简单，分工明确。既有中央控制，又有放权自治。

2009年芬兰议会通过了《2009新大学法案》。这是自1967年颁布第一部《大学法》以来变革高等教育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法案，它在未来若干年内对芬兰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该法案首次要求大学改变国有身份，获得独立法人地位，首次从法律上明确给予了大学自治权力，即享有高等学术和人文教育的自由，以及对内部事务做出决策的权力。

法案规定，自2010年1月开始，所有芬兰大学脱离政府公务体系，成为独立法人。学校机构由校董会、校长和执委会组成，三者责任不同，权力互相制约。校董会由执委会选出，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财务预算、学校发展等事务。校长由校董会任命，负责学校的日常事务。执委会由教授、讲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组成，负责学术事务。每个职务都有任期。新法案出台的主旨是让高校脱离政府，获得独立法人地位，使学术独立的地位不受任何影响。法案从法律上保证了大学的学术地位独立，不受政府和其他行政机构干预。

调查表明，政府的改革得到了高校的认可。2015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委托第三方机构Technopolis Group编写的《奔向芬兰未来的高等教育与科研体系》报告，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14所大学对2010年教改的意见。在“你认为教改最成功的是什么？”的问题下，6所大学选择了“更多的管理自治”，4所大学选择了“获得独立法人地位。”

4. 效率和公平同样重要

提供公平教育机会是芬兰教育的基本原则，而追求效率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的保证。

2013年,芬兰政府的教育投入为131亿欧元,占GDP的6.5%,占政府总开支的11.2%。2015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达到惊人的27亿欧元,占总开支的4.2%,政府给大学的科研经费达5.8亿欧元,是总科研经费的28.9%。因此,如何提高公共教育开支效率,实现从理论研究到科研开发成果,成为摆在芬兰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2009年前,芬兰共有48所大学,每百万芬兰人拥有6.9所大学,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院校多,同类科目重复开设,耗费公共教育开支。根据新法案,2014年前,20所理论研究型大学合并成14所,28所应用技术类型的大学减少到24所。大学合并,同类院系减少,降低了公共财政支出。

通常,政府直接拨款占大学总预算的64%。为了保证更好地实现宏观教育目标,有效使用拨款,教育部要求每所大学签订一个为期3年的业绩协议,规定政府财政拨款的标准以及大学要实现的数量和质量目标。芬兰教育评估署负责评估业绩,评估指标包括毕业率、进入就业市场的速度、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质量是否有提高等。由评估结果决定下一轮拨款的金额。

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另一方面就是公共财政的人均教育投入和产出比。据统计,2011年政府对高等教育在校生的人均投入为16000欧元。与此同时,学生在校的平均时间是6.5年。高补贴造成许多学生宁愿继续第二学历学习,不愿就业。在20岁至29岁年龄段的人口中,超过40%的人处在受教育阶段,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25%的平均值。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教育部提出了“减少一年”的目标,鼓励学生尽快完成学业,加速高等人才从教育到就业的过程。教育部联合社会保险局修改了《学生贷款条例》,规定如果一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学位,社会保险局将为该生偿还最多40%的贷款。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毕业的学生,不能继续获得资助。如欲读取第二学位,需自付学费。

5. 全面的助学保障体系

芬兰政府不仅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还对在校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财政支持,如助学金、住房补贴、政府担保的学生贷款等,补助时间为正常学业完成时间加5个月。此外,政府还向校园内的学生餐厅提供补贴,学生可以享受低于社会价格的餐饮服务。

从17岁开始,每个芬兰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多数学生均可申请成功,每人每月55欧元到301欧元不等。

此外,在校生可申请学生贷款,政府是贷款的担保人,学生无须提供任何抵押或父母资产证明即可获得贷款,贷款额一般是每人每月400欧元,如果是在海外留学,则为700欧元。偿还时间是在两倍的学业时间之后,利率低于商业贷款利率。

根据《芬兰2025年教育、培训与劳动力需求报告》预计,到2025年前,芬兰20岁至24岁年龄段中,超过90%的人完成中等教育,88%完成高等教育;30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将有1.1%的人拥有博士学位;为让年轻人完成学业后无就业后顾之忧,展望计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保证项目,从2013年起,每一个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及30岁以下的新毕业生,在失业后3个月内,都可获得政府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

结论:公平、效率创造财富

以平等、质量、效率作为追求目标和衡量标准,从教育立法和机构变革入手,通过提供免费高等教育、全面助学保障等手段,芬兰用70年的时间创造了教育领域的芬兰模式,世界典范。芬兰也在20世纪90年代转变为知识经济型国家。芬兰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经合组织2011年评选芬兰为成员国中创新产业投资和成绩最好的国家。

2006年,芬兰高科技产值是360亿欧元,到了2013年,仅生物经济一项创造的产值就达到了600亿欧元,占GDP总值的3%,出口额的26%。预计2025年,这一数字将升到1000亿欧元,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

芬兰以自己特有的务实精神、扎实作风和诚实态度,通过教育提高国民文明和幸福指数,实现了增加财富、提升国力的目标。二战后,他们坚信教育可以改变一切,今天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体育文化工作者)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一场改变美国历史的游行

○ 李南央

在2015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美国黑人女导演艾娃·杜瓦奈执导的电影《萨尔玛》获最佳影片提名和最佳原创歌曲奖。这部电影记述了发生在1965年3月的美国人权大游行，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总统约翰逊当年8月6日正式签发1965年投票权法案，明确规定美国各州在选举中不得有种族歧视，不得设置任何登记障碍，为黑人参选开启了大门。2015年是人权大游行50周年纪念，3月7日，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家人飞到阿拉巴马州的萨尔玛市，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盛大的公众纪念集会。

自美国建国始，选举权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宪法没有明确什么人拥有选举权，什么人不能参加选举，而将这个权利交给各州政府自行决定。建国初期，各州普遍规定只有拥有一定数额资产的白人男性可以参选。南北战争之后，白人男性在南北各州无论贫富，实际上都拥有了选举权，女性公民在北方的个别州也获得了选举权。但是，有色人种仍然被排斥在外，获得自由的奴隶也不能参加选举。电影《萨尔玛》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一位黑人妇女到萨尔玛市政厅登记选举，白人登记官问她美国宪法第×条的内容是什么，她全文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登记官又问她阿拉巴马州有多少郡县，她回答出正确的数目；登记官再让她逐一背出每个郡县的名字和长官的名字，她卡壳了。登记官一脸轻蔑地看了看这位黑人妇女，举起印章，在她递交的登记表上狠狠地盖上：“不予登记”。

20世纪50年代初，在密西西比州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县，一位叫乔治·李的富有的黑人牧师，成为美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通过选举登记的黑人。他在自己的教堂讲道时，鼓动更多的黑人去登记：“不要为你们升入天堂的父母祷告，要祈祷自己走出人生的困顿。”白人官员劝诫这位人权斗士：“你最好放弃参选，我们担保你的安全。”李牧师拒绝了。1955年5月7日午夜，一辆汽车从李牧师的车旁驶过，有人从车中向他开了三枪，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

马丁·路德·金博士是美国人权运动的重要领导者，1964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翌年3月，便开始以萨尔玛市为中心，策划争取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得知马丁·路德·金的选举权运动行动在即，约翰逊总统约见了他，对他说：“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穷人问题，这也包括了你们黑人。请你给我时间，让我把这件事做了，再来考虑你的选举权问题。”金博士回答：“那么多的黑人被杀害，白人凶手从未得到法律的惩判，就是因为黑人无法登记选举，因而无法在政府就职，不能做陪审团员。尊敬的总统先生，你还要让我看着多少同伴死去？我们已经等待得足够长久，必须开始行动。”约翰逊无言以对。金博士对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还需要鼓动更多的黑人参加因而反对立即行动的黑人伙伴说：“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号召黑人，更重要的是要唤起白人的良知。”他策划的第一个行动，是从萨尔玛市到蒙哥马利市的人权大游行。

这个大游行一共进行了三次，计划路途都是从萨尔玛市行至蒙哥马利市，全程约50英里。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3月7日，由550名黑人组成的队伍自萨尔玛市出发，行至埃德蒙佩特斯公路桥头，遭到州长瓦勒斯派出的州骑兵队和县自卫队用警棍和催泪弹的疯狂阻拦。现场的电视记者在挥舞的警棍和催泪弹的烟雾之下，勇敢地向全国实况转播了镇压场景，举国震惊。这一天被国人称为“血腥星期天”。许多人，包括很多白人，义愤填膺，纷纷从外州赶来。马丁·路德·金博士决定在3月9日举行第二次游行，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领游行者前行。

1965年3月9日举行的游行中，马丁·路德·金博士（前排中）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3月9日清晨，游行队伍从萨尔玛市再次出发，走在第一排的是肤色不同、教义不同的神职人员。队伍行至埃德蒙佩特斯桥，州武装已经虎视眈眈地等在桥的另一头。游行队伍停住了脚步，双方开始了对峙。相持中，出乎意料地，州警察长命令骑兵和警察为游行队伍让开道路。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金博士一时无法做出判断，踟蹰稍许，慢慢地单腿跪下垂下了头。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几千人的游行队伍，几百人的州武装肃然无声地等待着、等待着……，只有警骑被缰绳勒住，原地踏着步、打着响鼻。终于，金博士慢慢起身，毅然掉转身向来路返回。神职人员们跟着他，人群闪开了一条通道，后排的人原地等着前一排的人走过，然后跟上他们向回走去。人们的脸上写着困惑、不解、愤懑，但是没有人走出队伍，秩序井然，只听见衣襟摩擦的瑟瑟声、嚓嚓的脚步声。游行队伍返回教堂后，人们的怨愤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金博士对着一张张涨红的脸、一张张喷出怒吼的嘴，沉静地解释说："我不知道那是否是个陷阱，过桥之后是否有更大的埋伏在等待着我们。我宁肯让你们指责我懦弱，而不愿因我的错误决定，让跟随我的你们流血。"那天晚上，从波士顿来参加游行的一位白人牧师詹姆斯·瑞勃正走在街头，被一群当地白人追上一顿拳打脚踢，当场暴毙。媒体立即进行了报道。血腥星期天和这位白人的被杀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3月15日，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电视对他的讲话进行了现场直播。总统敦促两院通过对萨尔玛市游行进行保护，通过新的联邦选举法案，明确赋予黑人选举的权利，不得对他们登记选举进行任何骚扰。乘此东风，大游行委托律师，将游行活动提交州法院请法官裁决它的合法性。法庭上，一方是代表了游行民众的律师，一方是代表了州政府态度的州长瓦勒斯。州首席法官听取双方的证词后宣判：萨尔玛—蒙哥马利人权大游行合法，批准举行，但是限定了游行路线和游行期限。

3月21日，游行队伍第三次从萨尔玛市出发，州长拒绝派军队保护，约翰逊发出总统令，命2000名国家陆军士兵和1900名阿拉巴马州国民卫队队员沿途驻扎，众多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联邦执法人员加入了游行队伍，确保民众的安全。游行队伍以每天16公里的速度，沿80号国家公路行进，沿途居民自发地在公路两旁，设立了水站、食品站，不断有人加入行进的行列。3月24日当游行队伍顺利抵达蒙哥马利市州政府大楼前的广场时，已是25000人之众。马丁·路德·金在广场发表了游行结束演说："今天，我要告诉萨尔玛市；今天，我要对阿拉巴马州说，我要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说，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步伐，我们要继续前行。"

2015年1月19日，我和先生开车途径阿拉巴马州时，特意行至蒙哥马利市，停车在金博士当年发表演说的广场，参观了紧邻广场，为纪念1954年至1968年这一历史阶段，为争取人权而失去生命的40位个人而设立的人权纪念中心。美国人将争取人权的运动称为"人民的运动"，与美国开国是由一群充满历史责任感和智慧的富人奠定了它的宪政基础不同，美国人权运动的英雄主体不是运动的领导者和策划者，而是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是他们非凡的勇气和坚信公正必胜的信念，使人权运动在美国一步步取得成

功。中心这样阐述它的主题："非暴力遇到的常常是暴力，太多的人在为了改变国家现状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我馆特在这里纪念自1954年到1968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失去生命的个人。"美国人并不认为人权运动是美国独有的，自己的运动只不过是全世界争取人权运动的一部分。中心的最后一个大厅是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一张大屏幕"宽容之墙"。屏幕上记录着所有到这里参观后，宣誓加入为争取平等权利继续前行行列的人的名字。我在这面大墙下的触摸键盘上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瞬间，"Nanyang Li"耀眼地显现在屏幕正中，字体是那样的大，被人名海洋的波涛衬映着，那一刻，我感受到热血沸腾。一分钟后，我的名字缩小下去，渐渐没入人名的海洋，消失在屏幕的底部。我凝视着那闪烁着一个又一个名字的大墙，不期然，看到我的名字小小地，又出现在屏幕的另一个位置上，心中不觉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跟我们同时参观的一位白人，也将自己的名字输入键盘，我看见他高昂着头，肃立在那里，炯炯注视着屏幕正中自己的名字，眼中闪着泪光。

走出纪念中心大门，我和先生驻足在人权纪念碑前，它的设计师是美籍华人林璎——华盛顿国家广场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纪念碑是一张略略倾斜的大理石椎盘，顶部的圆面上刻写着人权中心所纪念的那40位黑人、白人，包括妇女、儿童的名字。清清的水流从盘中心的孔洞涓涓地淌出，轻拂过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润泽着那些逝去的生命，这些生命换来了国家的进步。它寓意着金博士的名言："直到公平似水流淌，直到正义汇成巨流。"

细细思考，发生在1965年3月的美国人权大游行获得成功的因素很多：它的发起者金博士的理性和智慧，参加者不但意志坚毅，且具纪律性，媒体人的自由和勇敢，州首席法官独立于政府的权力，约翰逊总统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尊崇和对其得主的敬重，以及他审时度势、顺应民意的果敢和决断。

我将指尖轻轻滑过圆盘上的最后一行刻字："马丁·路德·金博士，1968年4月4日被暗杀于田纳西州曼菲斯。"感受着水流从指缝间溢出的温暖与柔韧。马丁·路德·金只活了39岁，但他的梦想和追求却生生不息，不会死去。美国从黑人不能参选，到选出第一任黑人总统，经历了43年。也许，这只是人类政治文明发育的漫漫长途中的一小步，却注定会对后世产生长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丁　东）

关于《"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一文的补充说明

本刊今年第4期刊出《"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后，文中第一部分"直接参与组织的几件重大策反工作"中述及的原青浦朱家角镇镇长蔡用之先生的儿子向文章作者反映，1982年1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布"（82）沪中刑审字第490号"《刑事判决书》，撤销原江苏省松江行政区人民法院1950年11月9日的刑事判决，蔡用之按起义人员对待。此后的1985年8月14日，南京军区向蔡用之家属颁发了"南字第0016254号""起义人员证明书"。因此，"蔡用之错杀冤案"已获平反。此外，其父名字亦有误，应为：名蔡其懃，字用之。特此说明。

更　正

本刊2015年第5期第8页右栏第2行"保安县"应为"宝安县"；第24页第15行"1994年12月1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应为"2004年12月1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同页第35行"15天后"应为"19天后"；第28页第19行"国务院决定，把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和哲里木盟三个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应为"国务院决定，把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三个盟分别划给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第66页左栏第一行"2月12日"应为"2月10日"；

第82页"更正"的内容均为2015年第4期刊发文章的部分更正。

谁是《毛泽东论鲁迅》的记录、整理者?

○　汪大波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所刊曾彦修的《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提到了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论鲁迅》。但在记述毛泽东此文的发现上，存在差错。

该文写道："很巧，1980年前后，我有机会遇见写这篇报道（笔者注：指《毛泽东论鲁迅》）的人，场合是在当时北京城内沙滩北大旧址前饭摊之中。时由张黎群召数友人饮于此。我于座间请教萧泽宽，萧告诉我说，他当时在陕北公学，不久就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把毛的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呈与《新华日报》潘梓年，潘说《新华日报》不敢用，因不是中央交下来的正式稿件，叫他投与胡风的《七月》。潘并说，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延安出来的，因此就在《七月》发表了。"

这段文字告诉读者，记录、整理、投稿发表《毛泽东论鲁迅》的是萧泽宽。但这是不正确的。真实情况是，记录并投稿发表者是我的胞弟汪大漠。

汪大漠，重庆市长寿区云集乡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6月去陕西参加红军，同年入陕北公学，为第一期学员。在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作为学员的汪大漠未经任何人安排，完整地笔录了毛泽东关于鲁迅精神的演讲并加以保存。1938年春，他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工作分配的时候，又把笔记整理成文稿，投给武汉《新华日报》。因为是毛泽东的文章，未经审阅不便发表，稿件被退回。他又寄给了武汉《七月》杂志，《毛泽东论鲁迅》终于得以发表。但在正文中，记录、整理者的名字"大漠"却被误印为"大汉"。封面目录则署名"大漠"。《毛泽东论鲁迅》几经报刊转载，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然而笔录者"大汉"（大漠）是谁，却成了谜。汪大漠发表此文的本意是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历史的责任感，而非为了出名。而且当时他已离开武汉被调往新四军。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汪大漠跟随张爱萍将军，参与接管国民党海军和组建中国人民海军的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委员（张爱萍为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华东海军后勤部政委、人民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他也无暇去考虑当年那篇文章的署名问题。1966年夏，他转业到交通部工作，随即文革开始，他作为"走资派"被剥夺工作十年，在批斗中，他的右眼被打残，左手指被打骨折。文革结束后，恢复工作，在交通部离休。1994年7月病逝于北京。

令人欣慰的是，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唐天然的《〈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198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当年《七月》杂志主编胡风的《一点回忆》，终于澄清了汪大漠记录整理和发表《毛泽东论鲁迅》一文的历史事实。《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头版头条还刊载了由新华社发出的《论鲁迅》一文，作者署名"毛泽东"，随后，正式编入《毛泽东文集》。至此，几十年间毛泽东这篇文稿的记录整理者之谜得到破解。

当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关于鲁迅精神的演讲，没有稿子，汪大漠笔录整理成文之后，自己拟定标题为《毛泽东论鲁迅》，并在该文前加写"小引"说："这是鲁迅周年忌日，毛泽东先生在陕公的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当时是由我记录下来的。记录稿一直搁到现在，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在刊物上发表过。毛先生对鲁迅是颇有研究的，他读过鲁迅不少的著作。这篇演讲是精辟独到的作家论，而且，对于每个正在艰苦斗争着的民族解放战士，都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此，在现在发表也许并不过时，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如果有遗漏或出入的地方，当然由记录者负责。"当年的汪大漠还是只有22岁的青年作家，刚刚入伍的红军战士，他主动地记录、整理成文，并投给《七月》杂志发表出来，为研究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历史文献，为保留毛泽东唯一的一篇对鲁迅的专论，做出了贡献。■

（作者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工宣队在清华还干了什么?

○ 朱祖成

《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刊登的《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一文,写了工宣队进驻和撤走的过程。工宣队在清华的罪恶还有很多,他们进校后搞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强迫去五七干校“改造”,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

1968年12月26日工宣队以“给知识分子出路”为名,在大礼堂前草坪开全校大会,宣读了一个由毛泽东签发的文件,将众多教职员工分为几种类型:

1. 反动学术权威。指留洋归来的老专家、老教授。还特别以力学专家钱××为例,让他上台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过去,会后又组织“小分队”陪他一起到北京特钢厂劳动改造。

2. 白专道路。以物理教研组中年教师赵××为例,被说成闭门读书、成名成家的典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3.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指家庭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的人,要求他们与家庭划清界限,一刀两断,才会有出路。

4. 叛国投敌分子。指思想反动,散布“反动言论”,想出逃的人。以时××为例,说他思想一贯反动,怕日后算账,文革期间逃到边境地区,妄想偷渡国境、叛国投敌,后慑于边防军的威力才未得逞。被宣布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

工宣队称这种会为“宽严大会”,让知识分子分类“对号入座”,实质上还是基于对17年的“两个估计”,将新老知识分子全都推到敌我矛盾上去。一个工宣队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说:“要万箭齐发,射到谁就是谁!”会后,让各单位的群众背靠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仅水利系就有三位教授“畏罪自杀”。著名水力学专家李××身亡后还要被批判,叫“自绝于人民”。

“整党”是搞党员人人过关。在班组会上,有党员迫于压力痛哭流涕狠批自己过去的17年,以求过关。

迟群、谢静宜上台后变本加厉迫害知识分子,将清华3000多教职工强迫下放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据说选址时原来还挑选了另外两处,但迟群认为“条件太好,不利于改造”,偏偏就选了关劳改犯的地方。他们明知当地是血吸虫病重灾区,却存心将知识分子往火坑里推。迟群还美其名曰“风口浪尖炼红心”“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写入文章到处吹嘘。结果,1000多人患病,仅我们单位就有5人先后病死。去过鲤鱼洲的人,个个谈虎色变。当地严酷的气候、艰难的生活条件以及繁重的体力劳动,是对知识分子的惩罚。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自动化系教授也被押送到了农场,他不愿干那些农活,受尽迫害甚至不给饭吃,不久就因精神分裂症而悬梁自尽。

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实质上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手段,想从精神上、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思想意识。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不听话的人首先被送到干校改造。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开批判会,比二战时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连吃奶的婴儿也不放过,在战备疏散的“一号令”下,有一家全家老少一起押送到农场,孩子也得了血吸虫病,受害终生。

清华大学工宣队中,工厂来的人数少,大多数听命于军宣队。而其他部队来的军人又被“8341”的政治光环所震慑,后来就完全被迟群、谢静宜控制,很快就投靠到“四人帮”门下,有人鼓动清华的人向江青写“效忠信”。派出工宣队、军宣队毁坏高等学校,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

(作者为清华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平生六记	曾彦修	35.00	6.00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格雷弗·弗著 马维先译	89.00	9.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邓　野	38.00	7.00
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0	8.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苏联的最后一年	罗伊·麦德维杰夫	39.0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叛逆者——塑造美国自由制度的小人物们	[美]撒迪厄斯·拉赛尔	39.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的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赫鲁晓夫这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苏共二十大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无论在苏联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划时代的事件。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雷弗·弗博士,通过对大量文献证据、历史事实,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的研究,在本书中奉献给读者一个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结论:这个“秘密报告”是由谎言拼凑而成的。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演讲”竟是欺世之作?本书重新解读这份“秘密报告”。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林彪之子林立果,借林彪的光环,短时间内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自命不凡的他在自己周围拉起一伙人马“小舰队”,自命“康曼德”。

在林彪和毛泽东发生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林彪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林立果欲和毛泽东拼个你死我活。他策划的谋杀毛泽东、发动政变的阴谋因南巡的毛泽东突然返京而化为泡影。他继而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又因周恩来的查问、封存林彪专机而胎死腹中。情急之下,林彪、叶群、林立果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这次出逃,林彪是被欺骗绑架?还是共商同谋呢?

本书直面争议,首次完整揭底真相。

《大元帅斯大林》:斯大林是二十世纪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人物,生前他的功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被视为“神”一样的伟大英明领袖;死后,与他有关的一切又变得“声名狼籍”和“威信扫地”。一些著作中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各族人民的父亲、英明的国务活动家,而另一些著作中他是嗜血成性的恶棍、有妄想狂心理的罪犯。对斯大林的这些评论,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党性立场和派别信念。作为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作者在收集、分析和研究了大量有关斯大林资料的基础上,以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阐述了斯大林生前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该书曾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历史文学奖”。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 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 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23540　57273435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五十本起定制出版文集、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纪念册

礼失求诸野，修史在民间！2008年10月，本机构首倡“三千元五十本起定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服务模式，六年来定制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史家谱近五千种，使老人出书、家族出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

为了展示出版成果与接待各地作者，公司在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定期举办“姓氏、家族文化讲座”与“家谱传记编写培训”。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及中国周刊、凤凰周刊、等中外媒体都做了专题报道。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6252 5116

地址： 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5年第6期

《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中

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

陈昌浩最后的日子

我和邓力群的交往

亲历各党各派争取宪政的斗争

发生在南阳的“电报事件”

ISSN 1003-1170
06>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